

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杂文作坊

邵燕祥 著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1 号
CHENGDUCHUBANSHE

杂文作坊

著 者：邵燕祥
责任编辑：谭继和 濮禾章
封面题字：周明安
封面设计：张光明
技术设计：盛奇萍
责任校对：陈光星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 7765072 7783841
经 销：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排 版：四川三达计算机公司
印 刷：成都市文化用品厂
版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1/32
印 张：6.25
字 数：110 千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7—80575—706—2/I·152
定 价：5.4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突然出现杂文鼎盛的局面。不仅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且有专门的杂文报刊，杂文辞典，杂文专集的出版。各地杂文学会也应运而生了。听说还有省委领导自写杂文提倡杂文之说。嗟吁盛哉，杂文之兴起也！这大概又证明一个道理，凡是杂文命运不济的时候，也是国步维艰的时候，凡是杂文兴盛的时候，也是国运走向兴隆，思想比较解放的时候。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这恐怕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时代。

我们正在改革前进，盛世有望。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不在泥泞中前进，然而我们的前面却已光明在望。这是一个奇异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与困难，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秩序与混乱，欢乐与眼泪，歌颂与诅咒，庄严工作与荒唐糊涂，杂然纷然然而充满着生气的大转变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然而前进不易，旧意识趋于消逝然而垂死挣扎。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教条，失去了



权威的光辉，许多认为不可更改的观念，突然变成可笑的符咒。一些被人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的偶像，忽然坍塌下来。一些多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异端邪说，突然时新起来，并被化为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起来，并取得意外的好效果，把人民从水火之中拔于衽席之上。许多被踩在脚下衣食不周的凡夫俗子，突然抬起头来，西装革履，昂然走进豪华的酒店，登上呼风唤雨的总经理的指挥台，指挥千军万马，从事高新技术的大生产。凡此种种，一些人在欢呼，一些人在得意，一些人在创造，大多数的人在大步前进。然而也还有人在怀疑，在摇头，在叹息，在引经据典地辩论，甚至有的人在时代暴风雨的面前向隅而泣，在咒骂和贬损。

这样的时代，五光十色，瞬息万变，在生活的快节奏中，人们不耐烦等待精心刻划历史的鸿篇巨制，也不能满足于道理深奥的长篇大论。人们需要赞颂，需要欢呼，需要呐喊，需要马前卒为他们鸣锣开道，需要清道夫举起匕首和投枪，为他们清除阻碍历史前进的一切腐朽的体制、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习俗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人们需要匕首和投枪，人们需要杂文。

于是杂文应运而生了。于是出现了一新耳目的杂文作品。于是出现了当行出色的杂文作家。于是出现了杂文的鼎盛时代。

既然叫做杂文，看起来似乎是杂的，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经国大业，茶余酒后，是非得失，世道人心，青萍之末，一叶之落，无不可议，无



不可谈的了。其实杂文是杂而不杂的。杂文，特别是鲁迅式的杂文，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正如鲁迅说的，它“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杂文和现实生活总是贴近的，和人民脉搏的律动总是息息相关的。总是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之中见是非。它要发人之欲发而未发，言人之欲言而未言者，是写众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这和那种吃饱了打着饱嗝，剔着牙齿，闲侃神聊，插科打诨，言不及义的侃文，或远离尘世，闲情逸致，无病呻吟的闲文是不同的。

因此杂文即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艺术的魅力，具有历史的思辩性和艺术的感染力。没有对于新社会诚挚的政治热情和厚实文学功底是办不到的。因此一个好的杂文作家，如果严格要求起来，就要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家的洞察世事的能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具有理论家的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分析事物的能力，具有学术家博览群书的渊博知识，具有散文家的汪洋恣肆，斐然成章的文字功夫，还要具有诗人的烈火般的热情和一往直前的无畏勇气。要像鲁迅那样做到这一步，或接近这一步，杂文作家要作毕生的努力。

正因为这样，杂文作家在专制的旧社会里，是注定要忍受“窃火者”的痛苦和灾难的，就是在思想解放、杂文勃兴的时代里，杂文作家也是顶风冒雨的人，披荆斩棘的人，注定要在风雨中讨生活，在荆棘中寻路而行。他们可能在泥泞的荆



棘中仆倒，可能受到某些视杂文如眼中钉的人的嫉恨。这倒没有什么，因为那些人的某些行径，正是杂文鞭笞的对象，受到他们的嫉恨，正是杂文的光荣。但是也有时，或由于有些人囿于一种传统偏见，以为杂文“偏激”、“片面”，或由于杂文作家在使用这个锋利武器的时候，疏于把握，偶尔失手，误忤新政，也是有的。至于偶批逆鳞，为忌讳者“对号入座”，于是兴师动众，打上门来，大张挞伐，以至“对簿公堂”，甚至“捉将官里去”，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想，作为一个满腔热忱热爱祖国，决心以血作墨，以笔作枪，甘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俯首甘为马前卒，横眉冷对，做精神垃圾的清道夫，就要有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勇气。同时，我想，当前的决策者们是开明的，有远见的，一个聪明的指挥员知道那些在硝烟弹雨中打冲锋的战士，偶尔失手，是难免的。而且作家的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已经写进宪法，还有什么人想呼风唤雨，祭起什么法宝来，在杂文作家的身上，施展过去的身手，冀望点什么，大抵是很难的了。

当然，我想一个杂文作家，自然是具有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于改革开放寄以真诚的希望，对于阻碍历史前进的势力深恶痛绝，对于事理有充分的理解，对于敌友泾渭分明。因此，行文是会实事求是，真以指事，诚以对人，形在江湖，心存汉阙，针砭固取典型，臧否更有分寸的。这样，庶几可以无过乎。

杂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艺术形式，



它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动人，使读者从中获得艺术享受，这就要求杂文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形式和风格上力求多样化。那么除坚持“二为”方向外，“双百”方针就永远是杂文的指导方针。

全国各家报刊刊登的杂文已经不少，散出的杂文专集也很多，但是选出若干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著名杂文作家，各人自选一本杂文，成系统地出版，尚不多见。成都出版社有志于此，我颇赞成。他们已经得到若干不同风格的杂文作家的支持，才使《当代名家杂文系列》第一辑得以问世。在雅文学出版陷入困境之际，他们有胆有识，做了这么一件大功德事，令人鼓舞。他们的工作是严肃的，选本是认真的，编印是出色的，货真价实，决没骗人。正如鲁迅在他的杂文集出版时说过的，“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砾。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的用处的东西。”我相信读者也可以从这套《当代名家杂文系列》里，读到合于自己口味的文章。

我故乐为之序。



杂文作坊

——代序

五年前，我和蓝翎、舒展一起在《钟山》上开了一个专栏，叫《杂文作坊》。我不大愿意设专栏，因为疏懒，怕受催逼，后来说是双月刊，我就答应了。当时写过几句话，说：“谨遵刊期，每两月打开我的杂文作坊，把各色长短大小方圆不一的成品半成品，思想材料，文字部件，以至下脚料，公开展览，任凭自取……不是值钱货，更不是祖传秘宝，虽无大用，但也不算百分之百的废品，扪心自问，只求童叟无欺耳。”

这就是我关于杂文的想法。那个专栏开过四期就因故停了^①，可我这些想法没有变。

我不研究杂文理论，我对理论文章中常见的，所谓杂文是匕首和投枪的说法，总觉得有点过甚其词。我的杂文作坊可是只出杂文，不出军火，也从没出产过匕首、投枪这些叫人毛骨悚然的玩艺儿。而杂文，不过是一种通俗的，根据常情常理常识发议论、讲道理的文字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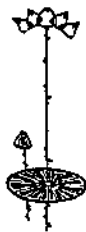
① 这一专栏中我的四篇杂文均已收入拙著《自己的酒杯》一书（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为什么叫作坊？取其手工作业、个体小户的意思。我被打发出去劳动的年月，在一个舞台工作队的木工房干过，也算个小作坊吧，除了干活，这儿人际关系极好，闲下聊天，沏壶茶，闹袋烟，天上地下，大小事情，无所不谈，真心相见。许多话题，回想起来，若笔之于书，便是随笔、小品，或许也是杂文——我弄不清这三者的确切定义，——我以为杂文作者和杂文读者就是该在这种场合见面。杂文应该是民间的往来和馈赠；杂文应该是自由的对话和抒发。

有时“立等可取”，不暇精雕细刻，甚至是半成品，得到大家体谅，因为匾上是作坊不是精品屋。遇到有些精品生产经销者面露鄙夷之色，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传诸永久，我就劝我的同行们不要心理不平衡：“舆夫之论”，本来就属街谈巷议，不是高档文玩，针砭时弊的杂文倘得与时弊一同“速朽”，不正是杂文生产者的初衷吗？

最要紧的是“童叟无欺”。即使是“永夜角声悲自语”，写出来也是给别人看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更是跟读者商量；况且有时候索性就是替读者立言，把读者想说的话代为说出罢了。如果不说真话——真心话，就是不尊重读者；说套话废话至少是浪费读者的时间；说假话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读者，像一个笑话，把“童叟无欺”倒念成“欺无童叟”，老少不分都要骗，那简直可以说是伤天害理了。

我的这些想法，端出来向读者请教，但绝不



想强加于人，我也没有强加于人的权力。在我自己，长期形成，一时也不会改变：我常常感到奇怪的是，有些人观点改变得那个快，好像随气候增减衣服，可从来不作任何声明；不过转念一想，气象预报有之，每个人换什么衣服穿原本是无须预报的，也便释然了。

1994年5月12日



序 二

杂
文
作
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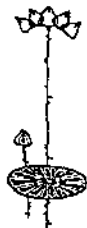
五年多以前，我为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写的前言里，曾经说到当时为诗为文的一些情况：

近年诗是写得少了。但不甘寂寞，有时技痒，不免“打油”。正统的诗作者，无论是旧体诗的正统或新诗的正统的维护者，好像都不以打油诗为然。然而，黄苗子诗云：“思到无邪可打油”，乃知打油亦非人人可为，事非经过不知难也。

人民日报办“风华杂文征文”，我写了几则《大题小做》，不意颇有反响。见诸版面的有公刘《正题歪做》唱和于前，又有马识途《小题反做》呼应于后。马识途是小说家，《清江壮歌》、《夜谭十记》作者，近来颇发“杂兴”。我于是寄呈打油诗一首：

歌罢清江气尚粗，夜谭反做见功夫。
岂因墙角猫扑鼠，勘破人间鬼画符。
领导未闻曾闹事，群氓难得不糊涂。
杂文已是无多用，何况街谈巷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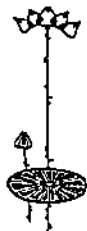
谈笑间已到1988年底。我把这些杂文辑集起来，略一回顾，发现我把杂文引入诗歌，倒是有打油诗为证；但想把诗引入杂文，套



用一句名言，却收效甚微。

听说那本杂文集，题名《神·鬼·人》，因故没有能出版。根据校样抄下这一段话，无非表明我对自己的东西的不满，自审不过是街谈巷议的水平。街谈巷议，特点在于日常性和情绪性，多是即兴的，琐碎的，就事论事的，甚至会失于片面的，自无法与政策文件或政策解释相比，也无从与经过系统研究、深思熟虑的理论著作相提并论。重之者可以把街谈巷议叫作舆论——舆夫之论，引车卖浆者之论，也就是平头百姓，普通劳动者的想法和说法；因此以为格外值得重视。这其实乃是对国情不甚了了的书生之见。况且，真正的舆论，虽说显然不是从上面下那么统一起来的，但也决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可以冒称、可以包办，可以自命为代言人的；必然是有普遍趋同的倾向，广泛深入的影响的。街谈巷议式的杂文，不过是作者的一得之愚，一孔之见，一篇两篇乃至十本八本，充其量也只是舆论之流中的点点滴滴，也还要待实践检验，证明那立论无愧于舆论的主流，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心理才行。街谈巷议式的杂文，并不就等于一般的街谈巷议；言责自负，文责自负嘛。

然而我不满足于街谈巷议了。此集所收，都是近五年来写的，逛大街、串胡同少了，接触真正的街谈巷议也少，斗室中随便翻翻书，抄抄书，于是有了“夜读抄”，不过读的是人所常见书，抄的有时还是报上的社会新闻，终于成不了流沙河兄说的“书斋杂文”。人间烟火气渐少，书卷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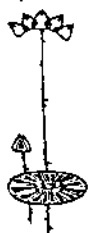


不见多；我自己仍然是不满意的。

自己不满意，为什么还拿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的”；我以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也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此其一。其二，我注意到有些莫名其妙的议论，也还要挂起杂文的招牌。我的杂文至少可以向读者提供一份比较与鉴别的参照。我希望以我的杂文——我的心与读者对话，寻找知音，寻找共鸣，寻找矫正或补充。

邵燕祥

1994年6月6日



序 时代还需要杂文·····	马识途 (1)
杂文作坊	
——代序·····	(1)
序二·····	(4)
东车站·····	(1)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3)
卞之琳的政见·····	(6)
疑难问题·····	(8)
凌梅志的回忆录·····	(11)
国会街忆旧·····	(13)
凌史（外一则）·····	(16)
读《大清洗的日子》·····	(20)
宣誓三题·····	(23)
写一本集会结社史·····	(27)
历史的遗憾和遗憾的历史·····	(30)
赵超构话延安·····	(32)
人形与人事·····	(37)
萧·肖·潇·····	(39)
语言之流·····	(41)
滥杀无辜·····	(43)
筵席二首·····	(45)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47)



说永远	(52)
夜读随笔三则	(55)
责任与感情	(58)
送寒衣	(60)
陈寅恪的史识	(62)
论“只剩一个人”	(64)
马克思讽刺小拿破仑	(68)
那末，嫖客呢？	(73)
罪与非罪	(75)
姓什么好	(77)
桃花与血	(79)
怪圈	(82)
笑谈之余	(85)
发噱之余	(88)
一首奇怪的儿歌	(90)
说舞弊	(92)
关于黎庶昌二题	(96)
说好说坏	(100)
李连英有所畏	(103)
从“囚”说到法	(105)
读报一感	(109)
吃货	(111)
预言	(114)
债与法	(117)
说依附	(119)
巩固猜想	(122)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125)
曹操·能臣·奸雄	(129)



目	当局者，还是旁观者？	(132)
录	迟于死亡	(135)
	黄河旧事	(137)
	女沙皇和大学者	(140)
	王国藩式的“名誉”	(148)
	转让题材	(151)
	钱与权与法	(155)
	“黑帮”小考	(158)
	哑人深致	(162)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164)
	说自律	(170)
	官场心态	(173)
	入党动机	(176)
	画薔小集	(178)



东 车 站

东
车
站

三十多年前在北京，一说东车站，人人知道那是指的前门外东侧的北京东站。现在，这座在高楼与闹市夹峙中显得不起眼的半西式建筑物，挂着“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小牌子，已经成为一个“古迹”。无复昔日的繁华与辉煌。

这个火车站曾经一片喧嚣紧迫景象，日夜吞吐着出入古都的各色旅客们。那时，外地人凡乘火车到过北京的，可以没逛过香山，甚至没逛过故宫，但没有不记得这个火车站的。

这个火车站，像北京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历尽沧桑，兴亡过眼。它迎来了自愿与被迫而来的游子，也迎来了它欢迎或不欢迎的权力者。

二十岁的沈从文从湖南辗转来到北京的时候，走出车站，在站前的广场上站了一会，他该首先看到规整的箭楼，彩绘剥落的正阳门楼，心慑于一种深沉与庄严的美丽，他想没想到康梁是在一种森严的网罗下登车远遁，仓忙中不遑回首留恋这帝城的凤阙飞檐？

那年七月芦沟桥炮响，从北平到天津的铁路恢复通车后，第一趟车就有“四千赤色分子逃亡来津”，天津报纸这样说。这车上的旅客走进东车站，踏上逃亡的路，他们之中有没有人预想到自



己“生还偶然遂”之后，到了1958年，会再次狼
狈地告别北京站，把命运交给生死未卜的征途？

最近翻看了柳萌《雨天的记忆》，写1958年
4月集体发配北大荒那个下雨天，下雨天的月台，
下雨天的列车；他故作平静地回忆着，说仿佛这
记忆也被哗哗啦啦的雨给淋湿了，柳萌当时年纪
轻，但同行的上了年纪的落难知识分子，想必每
人都有自己的更早的“当时”。

低头踏上雨天的路，这是远行者。每一扇窗
都在流泪，这是雨中怀远的人。

而1949年3月，郭沫若跟其他民主人士一起
抵达北京东车站时，受到隆重的礼遇，流的是欢
乐的眼泪，他当时成诗一首：“多少人民血，换来
此尊荣。思之涕欲坠，欢笑不成声。”——不知为
什么，这首诗他后来所有的诗集都没有收。

北京东车站的月台，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中，
是一个日夜轮流开演的舞台，不管在台角弹压的
是北洋军阀的军警、日本宪兵、国民党的特务、还
是“人民交警”。但因为几乎人人在这里“表演”
过，至少走过过场，反倒把它淡忘了。文学作品
都把它一笔带过，只有张恨水《金粉世家》末尾
给了一个镜头。遗留下的这座建筑也还够不上一个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北京的古迹太多了，
一百年的玩艺儿算什么古董？

今天也将成为历史。而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
将成为历史的见证。

1989年9月13日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记不起是谁，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拟之于《桃花扇》：头破血流，那溅出的血迹，点染作桃花。

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同被压迫的妇女，包括风尘女子，命运上有相通之处。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仅可以从唐宋传奇、元明杂剧中写妇女坎坷际遇、悲惨生活的篇章中，听到执笔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嗟叹、呻吟和呼喊，而且，从一些题为“闺怨”以至“宫怨”的绝句，抒写妇女命运的歌行当中，分明感到诗人那呼之欲出的怨望、怨对、怨怒。《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就是“是夕始觉有迁谪意”的诗人放下代言和叙事者的身份，站出来直剖胸臆了吗！

这是从屈原辞赋开始的“美人香草”的传统之余绪。

单说香草，两千年来兰蕙就不再是幽谷中的草花，而成了有德的君子的代词。谁若是就花吟花，就草吟草，在讲究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寄托”的论者那里，就成了“嘲风月，弄花草”的下品。

谢灵运和王维诗中，花就是花，草就是草，山



就是山，水就是水，而且是此时此地此人心目中的此花此草此山此水；自然物以其本来面目进入诗人的审美创造，而不是作为社会性的符号了。于是我们才得以读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来自第一手观察、体验、感悟的诗境。

当然，能摆脱“寄托”的寥白、发挥自然的诗人，不止于这两位，但这两位诗人的山水诗，数量大而且题材集中，可为代表。

沿袭着“美人香草”的兴寄传统，运用自然物为社会性符号，来表达忧国用世之情的历代诗人们，自也有艺术手段高下之别。那些足称高手者，绝不满足于重复和依傍，他们借用前人的语言材料，长期积淀的典故联想，也仍然能够充分写出自己独有的感受，以此同滥调套语相区别。

这都是就创作而言的。在对文学艺术进行政治性检查干预的过程中，例如历代的文字狱，则针对“寄托”大搞“索隐”，连并无寄托，纯是描摹风景、抒写性灵的诗句，也往往捕风捉影，目为影射，仿佛诗人写的不是诗，却都是寓言、谜语似的，这种现象，不知道在国外譬如欧洲可曾有过。

寄托云云，与隐语有联系又有区别。拿古民歌谚语说，用隐语处，大体说来，无非一是涉及男女之私，一是涉及政治违碍，有不便明言者，民众和他们的代言人遂以语言的智慧另辟蹊径。这样看来，希腊的《伊索寓言》与我们的优孟优旃



倒也颇有类似之处。诗人们并不擅滑稽，也不得不来这一套，孔丘之徒早就给订下“怨而不怒”的界限，不过后来是怒而不可，怨亦不戚，才发生了一宗宗诗案。

其实，“多谈风月”，来一点写真山真水真花真草、寄情自然的作品，大是好事，这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学史上都是偏于薄弱的冷门。但自然，还得有免于“非主旋律”的指责的文化环境才行。

“人生实难”、中国的诗人、作家、知识分子尤难。

1989年9月13日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卞之琳的政见

卞之琳为湖南“诗苑译林”版《徐志摩译诗集》所写的序（1989年2月17日），有一段说到志摩的局限：

徐志摩从译诗到写诗，在现代化上碰壁，一方面固然有他个人气质的问题，一方面也有直到今日诗界都有所表现的优良的民族传统的发扬与恶劣的习惯势力的羁绊之间的矛盾的问题。现代化仅得其形未得其神，也正是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遇到的困难。

从这里我们看到卞先生的极其严肃的思考：

一、他指出“现代化仅得其形未得其神”，是“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遇到的困难”。这一思想并未充分展开，但我们可以随手为它撷拾具体的例证。

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他指出，是由于“优良的民族传统的发扬与恶劣的习惯势力的羁绊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徐志摩的译诗和写诗上，在“直到今日诗界都有所表现”的创作上，以至在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

三、卞先生在序文后面又说，“徐志摩……尽可以从我国悠久的旧体诗传统里吸取一切在今日



还不用韵诗艺，决不会赞同今人放弃他所谓‘新开辟’的途径，对于译诗是如此，对于写诗当然也是如此。”卞先生又一次举一反三，“他（徐志摩）自然也会估计到困难，正如我们今日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会遭遇到的困难。”

总之，卞之琳念念不忘我们整个社会在实行现代化的全局，不忘这个现代化所遇到的困难，他认为这个困难源于如何对待传统——它既有优良的民族传统——在今日还有用的东西。又有恶劣的习惯势力的羁绊，——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应该说既包含实际利益的方面，也包含文化心理的方面），现代化必将“仅得其形未得其神”。卞先生以谈诗之笔偶涉时事，发人深思。

1985年10月4日



疑 难 问 题

从王得后的书评得读关于人类面临困境的一段引文，引自意大利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一书。文云：

只要大致回顾一下其中的某些问题，人们就能很容易发现使他们联结起来的种种问题，并可以想象还有更多的问题是我们肯定看不见的：无控制的人口增长、社会的鸿沟和分裂、社会的不公正、饥饿和营养不良、普遍的贫困、失业、增长狂热、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匮乏、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瓦解、保护主义、文盲和落后于时代的教育、青年人的反抗、异化、无法控制的城市扩展和衰败、犯罪和贩毒、在新形式下的警察暴行下的暴力行动激增、严刑和恐怖主义、藐视法律和秩序、核恶毒行为、社会机构的僵化或无能、政治腐败、官僚主义化、环境退化、道德价值下降、失去信心、不稳定感——以及对这些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缺乏了解。这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难以解决的困难就是罗马俱乐部所称的疑难问题。这是典型的人类意识和忧患意识。和这相似



的，我想起何搏传的《山坳上的中国》，那里也开列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的几乎所有疑难问题，除了完全不能涉及的问题以外。

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以至一千年前，两千年前，当时人们面临着当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各种问题，物质的和精神的。其中有些今天已经解决，有些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强度出现，而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则甚至是古人所难想象的。人类生活，就全世界范围来说，若干年来究竟有了多大的进步？

有多少问题我们正坐失解决的良机？有多少问题我们在处理时只顾眼前的短期效应而不顾贻害将来的严重后果？还有多少问题我们是养痍贻患，以致积重难返的？

提出问题不等于做出了阐释，但它提醒我们注意，避免明知故犯或纵容姑息。大部分实际问题，都不是古人所能提出的，更不是他们所能阐明或指出解决途径的。有某些问题是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或若干年前已露端倪的，前人可能曾有所预见，但也只能预见一个模糊的轮廓；可能曾有所阐释，但也只能就当时经验来立论。时至今日，我们已不能设想有一门自然哲学那样囊括一切的体系，包容了对宇宙万物的描述和答案。自然哲学早已在一百多年前结束了，如同中国的经学一样，不可能在实践的意义复活转来。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哲人，不是万世师表。”我深然之。古今中外许多称得上一代哲人的，也都应作如是观。



一个学者，尽管是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他的生命只存在于他的言论、著作和行为实践中，而不是在后人的解释中。伟大学者的后人，也只是一个个的个体，其中述而不作的，属于拾先人遗唾原地踏步，能不歪曲原意就算“好学生”，有的则能进一步，由注疏而发挥，针对后来的生活和思想实际问题，做出阐释，有所创见，则这样的学生也就卓然自立，是出于门墙的桃李，不必视为教师的附庸了。朱熹语录中那些超出孔丘语录的思想，无论功过，都不必再记在孔夫子的帐上。各人应对各自的言论负责。

作为后人，如果不能越先人思想的雷池一步，那就叫作没有出息。先人的结论再好，是就当时当地而作；后人哪怕还只是发现和提出问题，尚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出发和归宿于此时此地的实际，也远胜于停步在先人的结论和答案。

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其所以伟大，就在于献出了他们的思想成果。思想之为思想，是有生命的，运动的，而不是僵化的，它从变动不定的生活中取得自己的内容，探寻自己的流向，显示自己的力量。

想到这一点，才从因人类面临困境而对人类长期有无进步这个可疑问题的的恼人思索中摆脱出来，才从沮丧和悲伤中自救出来——至少是部分地自救出来。

1989年10月23日



读梅志的回忆录

梅志在1985年胡风去世后，两三年间写成了回忆胡风失去自由的24年生活的文字，30余万言，分为《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三册出版。

从1973年末至1979年初出狱，梅志陪同胡风住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内一个独门独院，为时六年。这种与世隔绝的羁囚，曾使梅志怀念起在劳改农场与刑事犯共处的日子。

胡风在1965年从秦城监狱出来见到梅志，谈到那间密封的独身房，曾经黯然神伤地说：“坐自己的牢可真难受呀！不但见不着一个人，连一只小动物都见不着，除了蚊子！”

不过当时胡风虽已关押十年，却还保持了她的沉着坚强。后来重新坐牢，在大监与刑事犯一起。等到1973年梅志重新见到他，已经成了一个肉体和精神都被摧残得时时在惶惶然中的老汉。《在高墙内》用很大篇幅写了梅志战战兢兢地护理胡风，生怕稍一不慎，触到痛处，引发他重犯恐怖症。即使这样，他还是多次发病，严重时陷入幻听，从“空中的声音”获得“启示”，于无人处同“中央派来的专案组”对话……细绎致病的原因，除了强加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并迫令交代



虚构的“罪行”以外，还有就是同监内的犯人的凌辱，不但有奉命的批斗、“总结”（亦即揭发和围攻），而且连穿四个袋的上衣也要遭到奚落，因为据说“四个袋”是“干部服”规格，与犯人身份不称；至于吃了什么，吃得多些，都是与犯人身份不称，不一而足！

关于这些，梅志只一笔带过，没有多写。梅志自己在苗溪茶场，也遇到有人“不友好”的相待。我们从前几年写“大墙”的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里，已经熟知监狱和劳改场所中常利用刑事犯管理、控制政治犯，这就是政治犯的劫数！

有人发表读后感，说作为政治犯，不知到底是单独关押好，还是同刑事犯一起关押好。听到这样茫然的发问，使人愕然，惨然，复不禁哑然失笑，只有默之曰：政府已一再昭告，中国没有政治犯了！

1989年11月18日



国会街忆旧

国会街忆旧

读杨纤如《北方左联会址》(12月4日人民日报副刊),才知道1930年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是在民国国会会堂召开的。这再一次证实我说过的,北京每条街、每条胡同,每个四合院或每座老建筑都有自己一段故实。

这个国会会堂以曹锟贿选的闹剧而著名;北京有一句歇后语:议员飞墨盒——不赞成”,就是出在此地。

会堂座落在今宣武门西大街路北新华社院内。宣武门西大街,在拆掉城墙修地下铁道之前,是城墙脚下的一条街,就叫国会街。1946——1949年这个以建于1915年的国会会堂为主建筑的大院,为北京大学第四院,简称四院,是大学一年级教室和宿舍所在地。1948年7月24日北京大学入学考试,有一个考场就设在国会会堂。

我所以记得这么清晰,因为那一天我就是到这里来应考的,上午第一节考数学,我迟到了半小时。那时候我住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要走到东单乘(有轨)电车,西行经过整条的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到西单下车。周定一先生从云南“复员”到古城不久,他形容坐电车缓缓地穿城而过,说“像到外县去似的”。车慢,车少,行车也



不正常，宿雨初晴，我在晨凉中出门，心情很好，没想到在东单左等右等，车也不来。好心情化为一片焦急，又化为无可奈何。再想学鲁迅先生步行，根本来不及了。终于登上车，到西单下车，赶进考场，脸上发烧，额头冒汗。数学大概考了零分，不过这怨不得电车，即使不迟到也会考零分的。

在这以前，我已经不止一次到过国会街四院。有一回好像是看《兄妹开荒》，国会会堂亮了秧歌舞台，二十多年间有此变化，确是预告着一次大翻地覆的活剧了。

记得清的是几次到四院来找周定一先生。他经手在沈从文和他所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周刊上发表了我最初的诗习作。我为了说明一篇散文的依据，把地下印刷的一本解放区报告文学小册子送给了周先生去看；《窗花》中打狼的情节就是从其中的《一个村长打狼的故事》所铺陈的。周先生的家口都还在湖南鄂县，他住在口字楼的宿舍里。有一两次我在星期天下午去拜访，他不在家，我便在院里转转看看，——也就连同“瞻仰”国会会堂的旧址，——星期天的校园里几乎没有人踪；再去敲门，周先生已经买书回来了，我记得其中有文化生活社的《快乐王子集》，王尔德著，巴金的译笔。那是1948年初的一个下午，暖烘烘的明晃晃的，冬末而有春意了，周先生给我看了他的一首新诗，“我打开了今年的第一面南窗……”

每一次从国会街四院走出来，都要停下脚，看半天——大门迎面灰黑城墙上三个顶天立地的白



粉美术字：“反迫害！”每个字有两丈见方，笔触刚劲，具震慑力，你不觉得这是站在墙上的三个字，而是三个大字呼吼着向你扑来，钹若沉雷：“反迫害！”

记得这三个字，一直到北平解放后还历历可见。

新华社和建国初期的新闻总署占用了这个大院。一度常到这里来开会、听报告，也都是在所谓国会会堂。台上台下尽名硕，不及备述。

如果将来有历史题材的电影正面反映1917-1948年古城的学生运动，至少应有一个镜头是国会街森严城墙上那三个大字：“反迫害！”

1989年12月4日



读史（外一则）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引论》中，讲到列宁确实有过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愿，碰壁以后才改行“新经济政策”。随后指出：

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我在1956年写的《青年团员进行曲》，副歌结句是：“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上，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也正是同样的心态。患这种急性病的，当时在中国何止万千。因此，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那许多盲目性的表现，也就不是偶然的，也不能仅仅归咎于少数决策者的一时头脑发热了。

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



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地方（按：指峨嵋山公社，徐水，七里营）三个月当中有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在这里，毛泽东一贯坚持对“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的观点，当然，因为这“广泛的群众运动”是对他的心思的，或根本就是他发动起来的。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如此，以后的“文革”也是如此。按照他的领导方针，则运动初期要防右，矫枉过正亦无妨，而到运动后期或结束，实践已经证明运动中出了不少偏差与纰漏，又须强调“保护积极分子”。

在这里，他承认“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但一则人多势众，属于“不能泼冷水”的群众运动，二则把批评者说的“小资产阶





级狂热性”的帽子拒收，界定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狂热性，则虽是狂热性也可心安理得了。

在这里，比较接近于实际的，是他没有把“消极分子”限在5%以内，他认为对公社化运动持消极态度的“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总人数占到30%，与积极分子那30%旗鼓相当，符合他一贯讲的“两头小，中间大”的规律，但决不能再多，再多就将突破三分之一了。毛泽东在此所指的占30%的消极分子即右派，相对于另外的30%之左派和随大流的40%即中间派。或曰，按照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最后打击5%，那就是30%消极分子中的地、富、反、坏（还有所谓官僚，指的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那么积极以至持批评态度的干部），而还有“中农和部分贫农”，最终是会划入“团结大多数”中去的。但这里透露一个消息，即毛泽东在考虑战略上的力量对比时，并没有迂阔地自认为95%都站在他这一边，所谓95%对5%之比是他所期望的结局和他用来瓦解敌对力量的策略的筹码，除去30%的积极分子和最终一定要打击的5%的消极分子之外，占总人数65%的，包括25%从消极分子“拉”过来的，随大流的中间分子形成一个中间地带，则是毛泽东纵横捭阖、驰骋自如的英雄用武之地；而这命运运动摇不定的人们中间，那最靠近集中力量打击的5%的25%，则是打击面一旦扩大时必将殃及的池鱼。当然，炮火纷飞，流弹叵测，即使左派中也难免要有“误伤”的，那就是事后平反的重点了。

1989年12月10日

深刻的体会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有一节会外漫谈中说：

……上海会议上，主席大讲海瑞精神。乔木说，主席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胡乔木确乎没有白白在毛泽东身边侍从多年，所以他懂得毛引出海瑞话题不在于要呼唤海瑞出世，而是旨在不出海瑞。只有吴晗太书生气了（不知胡乔木动员他写海瑞剧本时是怎么说的）。

海瑞生于十六世纪，先有“嘉靖嘉靖，家家干净”的皇帝而后才有海瑞。毛泽东不是嘉靖皇帝，社会主义中国不是明朝，自然不应出当代的海瑞。倘有人以海瑞自居，或以海瑞精神行诤谏之事，或不自觉地被视作言行类似海瑞，那当然其咎远在所批评之上，因为他犯了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方找错了建言对象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了。

胡乔木善体“圣意”，这可能使他在“文革”中顶多沦入“半打倒”（即登报批评时写作胡××，属半点名）的缘故。近闻京剧《曹操与杨修》演出后有种种议论，如说影射等等，胡乔木曾发言认为不宜如此联系云。



1989年12月10日

读《大清洗的日子》

阿·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主要是写年轻的流刑犯萨沙的遭遇和他的同辈们的生活道路，而以斯大林制造暗杀基洛夫事件作为背景的。到了这部书的姊妹篇《大清洗的日子》里，从篇幅和布局来说，远在流放地的萨沙已经退居后景。前台则仍然是莫斯科了。

也许因为我对苏联肃反的秘密已从一些纪实文字中有所了解，我读这两部分，关注的还是权贵以外的小人物们。

随着萨沙走上流放的道路，我心里一直浮上鲁迅在曹白被捕以后写下的掷地有声的五个字，“这也是生活。”

在加里宁垦区，萨沙想看看一九三〇年从俄罗斯遣送来的特殊移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他们被从老家赶出来，不知道要被放逐到哪里，甚至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被放逐。……人们都干活去了。村子里冷冷清清，一片宁静。河岸也像安加拉其他村落一样，拴着小船和渡船，晾晒着渔网。

他们和所有人一样生活。当然，这指的是那些能活下来的人。斜坡上一大群孩子一闪而过。这也是那些能熬过来而没有冻死的孩子。也许，这



是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

又是平静而浩瀚的河流，蓝色的峭壁，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蓝天上的太阳，这一切都是大自然慷慨而丰盛地为了人的幸福而创造出来的。

这是一九三四年初。在三十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已经死去了一千三百万人。被判流刑三年的萨沙也只是成千上万政治犯中的一个。

萨沙独自一人在荒凉的河岸拉纤走着，去迎接自己的未来。吉凶未卜，所有人都被派定了居留地点，他还不知道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会把他派到哪里去。……一种痛苦的感觉刺痛了他的心，他失去了和他一起走过了头几百公里的难友们。

在城市的喧嚣和恼人的人际关系中，人们可能向往着农村，希望隐遁到与世隔绝的境界里去。然而，在这里，不是到别墅里去休假，萨沙以及与他同命运者被剥夺了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权利，剥夺了作为社会的人的自由，这就是一种刑罚。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来临了。这是萨沙流放后的第二个秋天。牛棚盖完，他就没活干了。等到河面上出现冰凌，本来就十分孤单的他，将完全与世隔绝。秋雨连绵，村子里阒无一人，连狗都藏了起来。萨沙把那些旧报纸和旧杂志读了不知多少遍，简直都能倒背如流了。

此刻，当邮班也已停止时，只有旧报纸和旧杂志是萨沙的慰藉，这是来自人的社会的信息，尽管混杂着谎言，是不确切的信息。然而，想想，还有连这也得不到的所在。



萨沙不仅不写日记，连记事本都不用——那理由是清楚的。从这一点看，他的自由远远比不上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流放地。——是的，就连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流放期也没有超过三年：“他组织武装起义、罢工、游行，出地下报纸，非法偷越国境，就这样加在一起，也只判三年。他从流放地逃跑，把他送回原地后，也只要他流放三年。”这是萨沙的母亲说的，而萨沙判了流放三年，仅仅因为他出版的学校墙报上刊登了一首讽刺诗！……萨沙只盼着能活着度过刑期。

萨沙想象着恢复自由以后怎样生活。对于他来说，只有有了自由，那才能叫作生活。他就在这种对自由的等待中苦捱日子。他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重新审判，除了徒劳地发出给斯大林的信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不过，他还是幸运的，他并没有因为发出这样的信而加刑重判。

没有自由的生活，如果不叫生活的话，叫什么呢？只是生存——一息尚存而已。或者，用鲁迅的话来说，“这也是生活”。

然而读罢此书，合卷一想，萨沙的命运诚然是可悲的，但与他同时和后来的千千万万的人相比，他的处境还不算最恶劣的——我只是说，更多的人处在比他更险恶、更痛苦的状态，并非说他的处境就是可以忍受的。

正是因为人们把自己所遭遇到的无权和不自由的生活，分作了“不可忍受的”和“比较可以忍受的”，因此才常常“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长期陷于忍受的泥沼之中。

1989年12月



宣誓三题

宣
誓
三
题

宣誓无用论

复旦大学一教师在上海“宪法理论讨论会”上建议：国家领导人任职时应举行忠于宪法宣誓仪式，认为这样做有助于这个、有助于那个云。

我认为，这一建议可能被将来的某一届全国人大所接受，这样做除将有助于这个、有助于那个以外，也将有助于建议者认识自己的天真。

宣誓仪式，在当今世界上，各个王国在新内阁就职时有之，各个共和国新任总统上任时有之；至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宣誓”，且以同名影片传诸后世，何等隆重，何等严肃，而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就都已高举右手，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了。然而，正如同一切检讨或表态一样，任何宣誓能否付诸实行，还是要从宣誓者的行动来检验的。

信誓旦旦，听得太多了。指天发誓，也听得不少。说了冠冕堂皇的话就等于干了冠冕堂皇的事吗？我才不信呢。

“宪法理论”的研究，导向了宣誓仪式的建议，这种研究有助于什么？

1989年12月30日 ·



关于宣誓

小时候读《汤誓》，“左持黄钺，右秉白旄以麾”，那是革命的誓师。稍长，读《斯大林传略》，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有长篇的誓词，一句句“我们宣誓”，真是神人共鉴，后来专拍了一部影片就叫《宣誓》。按照党章的要求宣誓入党以后，历经多次运动，太多的检讨和保证，无论出自自我或旁人，自愿或被迫，终于使我感到这些都带着赌咒发誓的味道，而赌咒发誓，溯源追本，恐怕是要从秘密会堂上溯到神道设教的。

最近看到一份回忆录，才知道早在七十多年前有人对此就有异议。1922年6月在巴黎开“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时，周恩来提议宣誓，几乎全体反对：“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向谁宣誓呢？”周恩来解释：这是必要的，而且有大作用的。他举出事实为证：当初孙文辞职，让位于袁世凯时候，要袁世凯就职时宣誓忠于民国，后来袁氏称帝，背弃誓言，大家就有所根据来指责他，所以他终于倒了。周恩来坚持这个意见。主席付表决，结果多数否决了。

当时的多数与会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后来入党宣誓列入党章，成为必经的程序，显然是希望以山盟海誓来约束党员行动；这也未免天真，先前信誓旦旦，日后言而无信甚至背信弃义，又岂止限于薄幸郎君或市井小人呢？

此论有人不以为然，说许多现代国家，总统就职，总理组阁，往往也要向议会宣誓云云。然而恰



恰忘了，这些国家不论政体如何，宗教影响还强烈存在。而社会主义国家，以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政党，原来并不必在这样的仪式问题上向资本主义社会看齐，或以“他们还怎样怎样”来为“我们当然可以（或也要）怎样怎样”来辩护的。

毛泽东似乎不曾反对宣誓，但从他晚年一些话里看，他对这一切却未必相信，可见他仍保持着唯物论者的清醒；只是他“清醒”得有点过头，似乎对谁都不相信了。

1990年4月18日

再谈宣誓

从1966年“文革”开始，一时大兴的题词、口号，都以推崇毛泽东为中心。流传最广的或许就是林彪所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陈伯达所谓“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一文一武，一唱一和，不愧“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发展到1969年四月“九大”前夕，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内容的“表忠心”活动遍及全国。红纸剪“忠”字，葵花向太阳，成为典型，程式，规范，至于行礼如仪的“早请示”、“晚汇报”，更是充满了忠诚宣誓。

这一套到1971年林彪垮台以后稍衰。我们姑



且认为林彪是这一系列全民宣誓的主要倡导者吧,现在人们很难不怀疑林彪对毛泽东的忠诚了,而林彪也似乎是发觉了毛泽东怀疑其忠诚,才心萌异志急不择路的。林彪之不可信也就证明了宣誓之不可信。

然而当时参与过“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人,何止亿万,难道能同林彪相提并论么?当然不能。他们中不少人是怀着近于神圣的“朴素阶级感情”的,但不幸被林彪蒙蔽了利用了,林彪是愚民政策的推行者,相当多的人则沦为愚民政策的对象。

那愚民政策的武器就是关于忠诚的说教和宣誓忠诚的仪式。

这样说,会不会亵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神圣感情呢?亵渎了人民群众感情的,不是今天指出这一事实及其实质的人,而是当时的林彪及其追随者。他们所以号召忠于毛泽东,只是因为毛泽东预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忠于毛泽东也就意味着忠于林彪罢了;等到林彪感到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信任动摇了的时候,他不也就另做打算了吗,忠诚云乎哉?跟着林彪去“忠于”毛泽东,那感情“朴素”固然“朴素”了,神圣云乎哉?

近来书摊上贩卖的一些回忆、纪传,颇有说林彪好话的,似乎事情都坏在叶群那里,林彪还是蛮正派的。如果作者不是“女祸”论者,也是糊涂得可以,感情深处还残留着“神圣的残余吧。

1990年4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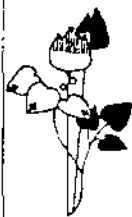


写一本集会结社史

人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生活，结成各种群体。从血缘的、宗法的、同乡的、同学的组织，神道设教的教门，到行业的、利益集团的以至意识形态的、暴力的社团组织。

如果研究中国集会结社的历史，那是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的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涉及政治史，而且涉及社会史、宗教史和文化史，但又都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研究中国现代政党的产生，不能不看到西方社会各种政党的影响，更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秘密会党在组织的形式、归属观念、门约会规等方面的模式的影响。中国的秘密会党，曾经是近代白莲教、捻党、太平天国（尽管它以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为外衣）等农民武装起义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些秘密会党以宗教式的迷信，经济平等要求和江湖义气为凝聚力，从下层社会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破产流民朴素的阶级互助组织发展到具有相当破坏力的军事集团。这与现代社会中多数以议会政治程序角逐执政权的政党是根本不同的。而我们考察中国现代的政党政治时，不能不注意到，两大政党之一的国民党，在建党之前其缔造者就同秘密会党有很深的渊源：



当然，经过孙中山的一再改建和其他现代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国民党本身并不同于旧日的会党。至于中国共产党，它的建设一方面是在苏俄的影响下以布尔什维克为模式，一方面又是长期处在武装斗争、秘密工作状态中，领导方式是党政军一元化的，并且面对着党外广大农民阶级和党内众多农民成份的存在，全社会极端贫穷和文化程度低下的状况，因此不能不带有较多的东方特点。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都是在没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专制政治下产生和活动的。它们的全部争取执政权的努力，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和秘密工作实现的。这样的过程各自曾经历了几十年。因此在几代中国人中间逐渐形成一个观念：任何集会结社都是不安份的不满现实的人们之所为，都是政治性的甚至密谋性的，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为了巩固已经执政的地位，不使统治权易手，不仅要严格防范任何以军事和暴力夺取政权的企图，而且要限制以至杜绝一切非官方的集会结社行动。政党，既是在夺取政权以前的武装夺权的政治集团，又是执政以后依靠武装为支柱来保持政权的政治集团。除了各自的指导思想不同（中共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国民党则标榜三民主义）以外，这种中国式的政党观念是国共两党所一致的。因此，这一类型的政党它作为政治暴力（无论这种暴力的性质被认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集团的性质，超过了它作为意识形态集团的性质，或



者说，作为这一政党的支柱和力量所在，政治暴力第一，意识形态第二。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达党员四千八百万的规模，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政治权力最大的集会结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组织的群体，它左右着中国的命运和大陆上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然而，中国大陆毕竟有十一亿以上的人口。中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人。这些人民群众首先属于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民族群体；他们可以信赖中共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志，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包办一切。中国绝大多数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不能从潜能状态释放出来，中国的事情是办不好的。

中国集会结社的历史（它的最后一章或下编是政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缺口。单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不同时期不同的集会结社，其参与和决裂，破坏与建设，都会提供许多教训与启示。

1990年1月18日



历史的遗憾和遗憾的历史

曾经参与陈毅传记系列写作的女军人钱竹伟，在《我心中的周恩来》长文中，披露她采写周恩来传记过程中搜集的第一手材料。

据说，周恩来临终前，夫妇对话，尚且你心里有话没有告诉我，我心里有话没有告诉你……^①又据说，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曾受叶剑英委托，记录周恩来病床上的每一句话，但警卫战士们最终缴回的是一个空白的笔记本，因为周恩来在病危期间，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讲。

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一九七六年初，半个多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一位目击者和亲历者，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周恩来，出于可以理解的各种考虑，对许多问题采取了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的态度，使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若干篇章纵然不是完全成为疑案，至少缺乏完全的全面材料而使后人存疑。

这是令人遗憾的。然而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



① 邓颖超在悼念文章中说：“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肚子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双方都知道最后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从无信史，那就会释然。

比如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这十年的历史，我们目前在大陆可以见到的，有毛泽东著作和一些教材；有公开内部印行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再就是斯诺当年和索尔兹伯里近年的某些著作。当然，台湾还有官修的和私家的史乘。我们从中可以找到的军事上攻城夺池、政治上纵横进退种种事态变化的轮廓是共同的，趋于一致的；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对背景的阐发和解释那就各树一帜，迥异其趣了。我们要从代表各种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的著作中，窥见那时显时隐或半遮半掩的历史真实。

所以，读现代史，同读古代史是一样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不但个人署名的回忆录，会由于事久失记，主观或客观条件对认识的局限，乃至有意回避或文过饰非，因此必须持一种怀疑的眼光，推敲审视；就是集体的著述，也要放在成书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中加以考察，区别其总体和枝节各具何等可信的程度。

古代史要有史料的考证，现代史亦不能废考证的功夫。观点的正误是第二位的，首先是史料的真伪，真伪难辩的则并存，不要急于做结论。

无端地怀疑是轻狂，轻易地相信也不严肃。面对真实的史料尚且可能强加以偏颇的结论，伪造或篡改的或者仅仅是片面的史料所支持的判断就只能是欺人之谈了。

历史本已多遗憾；治史和读史的人，只有加倍地冷静和慎重，才可免于新的遗憾。

1990年2月7日



赵超构话延安

《延安一月》是赵超构 1944 年 6 月随第一个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活动的结果。现在我手边的南京新民报社作为文艺丛书之六的 1946 年出版的，1949 年以后未见重版。

赵超构在这本访问记中，力求客观地记下所见所闻，间亦发表自己的感想，有些是颇有见地的。他那些政治方面的意见撇开不谈，在分析文艺现象时，例如论证秧歌剧《兄妹开荒》优于“延安人最自负的秧歌剧”《动员起来》，一方面肯定后者“宣传的效果是成功的”，一方面指出《动员起来》只是在破除组织变工队的疑虑，农民观众“已不是欣赏技（艺）术而是在听取变工问题的辩论会。观众此时的感觉只是切身利害的打算，并不是什么美的感受”，“一到了变工问题已告解决，不再被农民所关心时，就不会有再观看的必要”，所说是通达的，并没有鄙视秧歌剧、贬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偏见。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兄妹开荒》的寿命就比《动员起来》为长，还赢得了当时边区以外的观众的喜爱。

赵超构关于鲁迅在延安的际遇，分析也鞭辟入里：

延安有许多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譬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据我个人在延安各书店的观察，文艺书籍中，印得最多的，或者说销得最好的是秧歌，以及其他通俗读物，其次，有高尔基的小说集（两种），还有介绍高尔基的书（也有两种）；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

但我要说几句公道话，延安文艺界并非不尊崇鲁迅。我见到他们的作家，谈起鲁迅都是很尊敬的；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便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这种观点，毛泽东先生的文艺谈话中似乎也曾提到过。这就决定了延安文坛对鲁迅的态度，不免有点“敬而远之”。除了有一个“鲁迅艺术学院”纪念鲁迅之外，除了在高岗先生的书架上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求的话，那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



这虽是小事一端，却很可以显示延安文艺政策的一种趋势。

赵超构还访问过范文澜和吕振羽两位历史学家。他论到延安的史学研究和著作时说：

……中古以下的历史，则大都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改编。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了。因为这样，所以越写到近代就越难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节，正集合许多专家来研究。

近百年的历史，也是按照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这一结论性判断而写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捻军等都是失败了的英雄。因为对封建社会“一分为二”，除了一方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和政治代表即官方以外，剩下的一方就是被统治阶级亦即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所形成的民间，因此一切破坏封建社会现行秩序、不利于官方统治的行为和行爲者，都赋有革命的意义，其在不同规模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过去所谓的绿林好汉、剪径英雄，占山为王、揭竿而起的各路队伍，就都成了农民的政治代表，以农民暴动、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名义纳入重要的史册了。这些在封建社会中起破坏作用的社会力量，过去历史上统称为匪为寇，自然是昧于偏见，但统统溢为革命或进步。



甚至简单地目为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也不符合事实，是缺少分析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之论。鲁迅对张献忠、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态度就不是全无保留的，这是鲁迅的崇实和深刻之处。

由于从大革命失败后，即从事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和组织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始终依靠农民群众，遂引伸到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直至扩大到任何自发的农民，甚至个人的反抗行动为同道，这种从政治需要出发的阶级同情，也从总体上影响了史学研究和著作中的爱憎取舍褒贬隐扬，就未必是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了。

自然，“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把农民队伍和他们的头目人物扶上正统，指出历代君相作为地主阶级头目的阶级本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一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之道。但是在对后者的研究中，特别是按照有关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则，评述所谓英明君主从秦始皇到康熙、乾隆皇帝的功绩时，怕又偏于肯定他们的大业，有时难免忘记他们软硬兼施对付当时人民的血腥的“治绩”了。

离开了史料的坚实基础的史观，是先验的，武断的，天马行空的，然而也是不坚牢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进行中的历史，对现实的观察、判断，如果从概念到概念，即使一时符合预定的理论框架，终究经不起大量的实证材料的冲击和检验。

《延安一月》似走马看花，但毕竟保留下一篇



实录。现在和未来的治史者会提供给读者四角端方的纪传志表，然而读史者也还需要过来人的笔记、回忆录来作补充的。可惜延安时期接待的中外记者人次太少，时间不长，访问记之类无多，然而在延安今健在且能执笔的人还是不少的，延安如生活过至此，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个事件，也无不如此。

1990年3月6日



人形与人事

冯至 1944 年写于昆明的《忆平乐》一文中，说到“朋友们常常因为对于自己的民族期望过殷，转爱为憎，而怨恨我们的缺点。”这一句话解释了胡适的“自责”论，解释了柏杨的“丑陋”论，自然也解释了鲁迅对时弊和国民性的种种剖析抨击。

冯至说：“在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没有变，农夫依旧春种秋收，没有一个农夫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业者依旧做出人间的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真正变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政客把政治弄得不成政治，有些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

冯至当年的激愤完全可以理解。他说的“不成人形”，也就是鲁迅之所谓“人面东西”吧。人形不成人形，所为也就不成人事了。他认为“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把政治弄得不成政治”，“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是因为他心目中自有一个学校、政治、军队应该办成什么样子的样子在（就如他心目中有粮食、桌子、衣服的样子），而



他对“有些教育家”、“有些政客”、“有些军官”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倘认清这些人也只能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办得学校不成其为你期望的学校，政治不成其为你期望的政治，军队不成其为你期望的军队，那才正符合这些人的行为的本质。那末，就会见怪不怪了。

不过，那是1944年，抗战仍殷，还不应该提倡见怪不怪，心安理得；那时还要唤醒人们，祛除麻木，因为人们的麻木只能有利于把中国弄得国将不国的那些人的统治，让反动统治者坐稳了江山，中国社会就不会变好，而只会往坏里变下去，直到许多似乎不会变的事物也会变，变得黑白颠倒，优劣错位，真假混淆，更不用说其他了。

1990年3月22日



萧·肖·潇

萧·肖·潇

萧三是我很尊敬的长辈，无论从年龄、革命经历和文学经历来说都是如此。1956年夏天，以偶然的機會，随同艾青、李季、袁水拍三位到麻线胡同萧三家拜访。记得那天谈到刚刚传来的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作家法捷耶夫自杀的消息，萧三与他是老朋友，说起他酒精中毒很严重，没有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

另外一个印象较深的话题，是说起简化字，萧三认为他姓氏的萧，不应简化为肖字，旁及潇湘，他说如果相应地简化成“消湘”，不是一点意蕴、韵味都没有了吗？

从五十年代匆匆过到八十年代初，萧三饱经坎坷归来，有一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诗选，是件好事，但封面上印了“肖三诗选”四个大字，老人一定感到美中不足吧。

最近屡从人们的回忆文字（如郑超麟的回忆、胡秋原的传记）读到有关萧三早年在苏联活动的“爱弥·萧”时代的一鳞半爪。其中引述萧三曾经说过“中国文字要不得，非拉丁化不可”这样的话。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后来的观点是有变的。

钱玄同主张过“国语罗马化”和简体字，那是在共产党外。瞿秋白提倡“拉丁化”和“大众



语”则是在党内有影响的一派意见；1949年后周恩来、吴玉章等通过文字改革委员会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我以为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这方面，推广普通话是百分之百应该的，可惜由于教学受到“文革”干扰、师资不足及社会上的诸多原因，三十多年来成长的两三代青少年中普通话尚未达到应有的普及面，似反不如台湾推行“国语”之见成效，有待继续努力。

而简化汉字，“文革”后期颁布过一批“董”简化为“荃”之类的简化字表，不久又宣布撤销，从此暂停。看来对简化方案举棋不定，出现回升。新任的官员们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在题词时多用繁体字。我以为关于简化汉字问题应当首先作为一项学术问题提出来进行公开讨论了。

1990年5月30日



语 言 之 流

语
言
之
流

胡天风散文《在那穷乡僻壤的地方》记在幕阜山区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琐事。因交通不便，距最近的火车站有一百二十里，年纪大一点的山民尤其是妇女，一辈子没出过十里方圆，语言方面保留了一些古汉语词汇或古音的情况就不奇怪了。

据说，我们说“看”，他们说“观”；我们说“回”，他们说“归”；我们说“养”（猪）或喂，他们说“饲”；我们说“熬”（猪油）或“炼”，“煨”，他们说“炙”；我们说“穿”（衣、鞋），他们说“着”；我们说“说”，他们说“话”（读音为“哇”）……等等。

这种情况，我在一些别处的农村也遇见过。如晋南把“背”（负物）说成“荷”。河北沧县把“实在（确实）”说成“诚”（“诚然”的“诚”），有一些字眼，我们原以为只是书面语言所有，其实在古代是口语，在那些交通比较闭塞的地方至今还活在人们的交往中。

近读张俊峰短文引莱登英文辞典主编莱斯诺的话说，今日英语可用的四十五万字里，莎士比亚只认得二十五万个字而已。这意味着如莎氏时代的字数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话，那末至少有二



十万个字在这四个世纪里被淘汰和更新。当今世界的语言周转率已比以往加快了三倍。

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可怕，毋宁说是正常的。常用字（词汇）表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不该无限制地扩大，但文学语言、书面语言可以也应该不受常用字表的限制。

语词的淘汰和更新，是个自发的过程，它受社会总体文化水平的制约，尤其受知识界的导向（意识行为和非意识行为）的影响。我们已经依照约定俗成的原则（包括权威人物的权威所至），接受了“莫明（名）其妙”和“固（故）步自封”。不过，报纸文章和广播电视中以“不尽人意”代“不尽如人意”，以“名不经传”（chúan）代“名不见经传（zhuàn）”，以“有疏有致”代“疏密有致”之类，我还是接受不了的。不知语言文字工作者能否从更高的历史角度对语文的健康发展施加一些什么积极的影响。

1990年8月21日



滥杀无辜

滥
杀
无
辜

这一向，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在伊拉克。观其所为，仿佛地球又转回到半个世纪之前，希特勒出兵波兰、奥地利，以及苏芬战争的历史时刻。

外国的事情不甚了了，我们多年没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著译，据说近来翻译过来几本，我又来不及阅读。但今昔比较的思路，虽是读历史不多者，亦所难免。从伊拉克把西方侨民扣作人质，我忽然想到最近偶然看到一则史话，引阿拉伯作家阿布在德的《东游记》，谓黄巢起义攻广州时，曾杀12万回教徒、犹太人、火祆教徒和基督教徒。

我不知道这一数字是否确切，有无夸大，也不知道黄巢当时杀这些人的口实，但相信不是凭空捏造。因为起义一称暴动，动用暴力必然刀锋饮血。黄巢之前和黄巢之后，都是如此；对国人如此，又怎么能要求当时乱兵之中，对异域异教的人秋毫无犯；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队伍，有在先进思想指导下制订的政策和策略，尚且会在战争环境（甚至不止于战争环境）中错杀无辜，又怎么能苛求黄巢的部队呢？

皇权时代的官吏和野史，于农民起义凡未能



夺取政权开立新朝者，多写其烧杀掳掠，一无是处，固然是阶级偏见；但我们的历史小册子，在肯定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前提下，对它的破坏性包括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文物典籍的损害讳莫如深，也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片面性。

在这一点上不能不佩服鲁迅，他对张献忠绝无好感，大有微词，似乎不在借起义坐了天下的朱元璋之下。即在被称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的后期的杂文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鲁迅毫不含糊的态度，同他早斯作品转述关于“长毛”的传说时的态度，其实一脉相承。因为鲁迅立足于历史的真实，立足于人民群众，也可以说立足于人之常情，他从《蜀雪》说到张献忠的活剥人皮，并没有为站稳什么立场而曲为辩解的意思。当然，他对明永乐帝的活剥人皮，也同样加以挞伐。可见，如不矫情，则不但对于滥杀无辜不会举手赞成，对一切非法的，“合法的”滥施酷刑也会不以为然的。这才是维护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应有的态度。

1990年8月28日



筵席二首

筵
席
二
首

肖复兴《并非游戏》一文，为“饭不怕贵，公款就行；酒不怕醉，请客就灵”的拟《陋室铭》妙文作注，说“公款请客一事，消耗几亿人民币”，在这里肖兄一下就暴露了穷文人本色，以为几亿元公款付诸吃喝是个大数了，殊不知据统计去年全国用于吃喝旅游的公款达一千亿元！

人说《红楼梦》从头到尾吃喝一以贯之，那么《西游记》就从国内旅游到国外了，文人眼里看成巨著，比起大巫实为小巫。试想花钱如流水的一千亿元，滔滔者抵得多少部当代《红楼梦》，当代《西游记》！至于“当代《金瓶梅》”，已在某家长篇大作广告词中作为专利的别称，这里不去说它。

读董桥文引18世纪英国詹姆斯·翰威的话，骂修路工人偷闲喝茶，算出100万名工人一年工作280天、每人每12个工作小时扣掉一小时冲茶喝茶，英国国库每年亏损达58万英镑！云云，全是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原则的演绎和折算落实。看来茶叶还是工人自备，并非国库开支，除了显出论者的鼠肚鸡肠、锱铢计较以外，也露了英伦三岛国库空虚的底。怪不得19世纪中就得兴辟让天朝给它若干万两白银的“补贴”！



时至今日，虽说英镑比人民币“值钱”，区区 58 万英镑，按牌价不过折合人民币 500 万元左右，才抵得泱泱华夏几处筵席！

记得曾作打油诗《筵席二首》并跋，自惭诗艺，弃之纸堆。检出看看，是 1990 年 10 月 4 日写的，大约是在亚运会期间。过了三年，似乎还不过时。

诗二首并跋抄录于后，偶用旧典，不算生僻；偶用僻字，一查便知。不加注了，谅之谅之！

其 一

中华文化在烹调，
摆了三餐摆夜宵。
为爱横行高餐价，
小碟小吃上天桥。
寡人好色兼香味，
夫子闻韶佐酒肴。
十首秦吟千载后，
脂膏吮尽骨犹馐。

其 二

又闻文化在厨房，
鼎鼎调和调有方。
鱼肉折腾刀俎上，
醇醪屏兑掌觥觞。
沙锅待破何禁问，
末座叨陪但吐刚。
药膳养元能不老，
官家付款醉无妨！

泱泱华夏，历史辉煌。连皇家带孔府，同献佳肴美酒；付理论于实践，共做经济文章。观光客愿者上钩，东道主欣然沾光。于是重开不散的盛筵，正乃方兴未艾；为有大吃不完之公款，愈加扬厉铺张。口头流誉叫饮食文化，箸下堪称为源远流长。岂可无诗，聊以揄扬。只咏吃喝，稍涉报帐，不关乎杯盘以外，更无碍于醉月飞觥。是为跋。

1993 年夏写于北京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在大破“知识私有制”的时候，为了让我们这些自命知识分子的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要自恃有知识，以知识为资本与党抗衡，是组织大家学习过不少文件的。其中有一些反复读过多遍，如说知识分子从小学读到大，只有书本上的知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会杀猪不会种田，脚上没有牛屎，“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纷纷自惭形秽。不过每个知识分子毕竟有些“体己”，高级的所谓“术业有专攻”也好，一般的房前屋后一分半分地上有所收获也好，些许知识积累是赖以自慰的。这时却遇到一个看似新提出的说法，“他们的有些知识是无用的”，这就比说他们“比较地最无知识”更加命中要害，彻底地摧毁了知识分子希望以自己的知识“用世”，即为社会服务、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并因此产生的自信和自尊。

古来中国的读书人，除了“绝圣弃智”的一派以外，都是想要“经世致用”的，虽然所谓经世致用未必真的有助于国计民生和世道人心。不过没有人认为自己的知识是无用的，即使写游戏文字，也还是以为这点知识技能有游戏之用吧。



倒是在一部分主张“经世致用”的人那里，认定诗词歌赋无用，至少不如时文八股有用。有什么用呢？是走上仕途的唯一门径。二十世纪以来都说八股文没用了，那是因为废了科举。

学校，是求知识的场所，也是走向社会的中介和准备。家长自然是以为在这里可以学到有用的知识才把孩子送来的。学生如果不认为知识有朝一日会有用，就不可能从小学课堂耐心地坐到大学。然而知识有什么用，对谁有用，怎样实现它的有用，却各有各的看法。学习自然科学，有的是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有的是为了将来找个饭碗，饭碗打破时也还可以造肥皂、变魔术。至于男生读经济系，女生读家政系，当然更明显地为了“有用”。

一般地谈论知识有用或知识无用，是没有意义的。所谓“有些知识是无用的”一说，看似新鲜，其实就是毛泽东关于知识的定义的推衍，毛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后来的实践就是照这个思路办事的。政治学、社会学的课程和学科，50年代初就在第一次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取消了，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研究社会和政治的，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外的社会学、政治学还不都是资产阶级的吗？那些知



识不仅无用，甚至有害。哲学也是一样。“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这就够了，全国只在北京大学保留一个哲学系即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真正的真理”，是从事于各种专业的人都必须学习的，不限于哲学系的师生也。“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无怪有身居高位的人直接指出考古专业为无用，也无怪有一段时间里连小学课程中也把历史、地理通通“精简”掉了。

“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则分明文科教的都是无用的知识。理工科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又是怎样学习呢？据说“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一切重在实用，也就是立竿见影的操作，基础理论自然也是无用的了。“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指的当然是唯物辩证法，也属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通百通的法宝。

准此，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知识分子，首先是通过“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的主课，而阶级斗争知识原来不消从书本中获取，更多是在“干中学”，在阶级斗争中学会阶级斗争。其次有关生产斗争的知识，也是强调从实践中来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又会参加工农业生产出成





果，又会参加阶级斗争出战果，就证明具备了两门知识，比一般所谓知识分子高明多了。至于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是“真正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根本用不着去读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原著，“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只要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著作、讲话以及政策、甚至只有语录一编在手，就“够用一个历史时期的了”。总之，能干活增殖物质财富，又能“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搞阶级斗争，就可谓是具备有用的知识，也才是理想的有用之材。

因之所谓“有些知识是无用的”，也就是说有些知识分子是无用的——他们所掌握的其实是无用的知识。首先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后来加上几乎所有的文科知识分子，再加上搞自然科学中基础理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阶级斗争知识方面还不如那些投身阶级斗争实践“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生产斗争知识方面还不如掌握某些基本生产技能和经验的工农。说无用已是客气，倘再不规规矩矩，还要“指手划脚”，便是有害。这些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理应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再教育。

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再教育，一半是经由工农分子来执行，即“接受工军宣队，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生产劳动”等等；一半是经由一些可能是在阶段斗争的实践中有了“完全的”知识的知识分子来执行，也就是“大批判”。

这是“有用”的知识对“无用”的以至“有害”的知识的斗争，也是“有用”的知识分子对“无用”的以至“有害”的知识分子的斗争。

所以，知识有用和无用，不可不辨。最有用的莫过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即使连马克思主义ABC也没有读通的人，只要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竿来，就足以把“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无用之人打翻在地。『得？』

1990年11月18日



说 永 远

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永远的吗？

国际风云，变幻无常，昨天对垒交战的，今天握手言欢了，曾经结盟的战友，忽然怒目相向了，真是不断地动荡，不断地排列组合，应了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国与国间的关系如此，那末一国之内、一党之内呢？

1966年异口同声地祝林彪“永远健康”，1971年林彪坠机殒命。只“健康”了五年，没有永远。

1968年据说一致通过地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80年又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只“开除”了12年，没有永远。

一部分人希望永远这样，另一部分希望不永远这样或永远不这样。

一部分人希望永远不这样，另一部分人希望不要永远不这样。

于是等待。于是斗争。于是力量消长。于是变了一个样。

这样，就没有了永远如此的事情。

秦嬴政自命为始皇帝，要把秦王朝二世、三世……世世代代永远不断地传下去，然而没有如愿。秦亡了。



秦始皇还曾想求长生不老之药，使自己永远永远活下去（不知道是永远作始皇帝，让同样活着繁衍着的皇子皇孙永远眼巴巴不得继位呢，还是退位当太上皇，永远活着垂帘听一代一代子孙的政），然而没有如愿，人死了。

然而他的愿望，虽平常人也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使平常人，也希望永远交好运，永远保持自己认为好的境遇和事物，而叹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世间有多少“千古恨”啊！

这和对永远的祈求，也常常表现为善良的祝愿。祝愿芳龄永继，祝愿青春永驻，希望世界上的事情凝固在美好的一刻。不过这么一来，生命也就终止了。美人不会到白头，于是又成了另一种遗憾。

看来，世界上一切的圆满、美满、完满，如同十五的满月一样，都是相对的、稍纵即逝的，变化无常或周而复始的，在万事万物如转轮的过程中；而只有——遗憾，不可弥补的遗憾，才是永远的。

曾经山盟海誓，永结同心的，不是难免半途分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吗？当然，这一份终天之恨，是由迷离惆怅的诗笔刻意美化了的。

报载一个什么小厂的厂长（抑或党委书记）40多岁，患了绝症，他提醒妻子，当年有过“永远在一起”的誓词，强挽着一起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这现代的殉情大约引不起今天诗人的灵感了。因为今天已不是古代，人们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



更不是永远不变的。就是对古代如《长恨歌》的故事，今人也要用不同的眼光重新审视了。

因此就有了翻案文章。尽管我不是主张为做翻案文章而做翻案文章的。

一代人的共识，尚且不能强加给下一代人；则在一代人中，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强加给多数人的，无论名与实，都不可能永远岿然不动。

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唯物辩证法的常识。根据这个常识，连大家高呼万岁的共产党也是要消亡的。

时间无限，但有什么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东西是万岁千秋永存而不变的？

空间无限，但毛泽东却批评过“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谰词。他说，光焰是有际的。

毛泽东到了晚年也不失其清醒。他晚年的错误也是清醒地犯下的。

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在此时此地，真理就是真理，谬误就是谬误；正义就是正义，不义就是不义；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有客观标准的，是不容混淆的。但“永远正确”之类的话，只是成人的神话而已。

1991年2月1日



说谎者之碑

在琉璃厂邂逅友人常江，他是楹联专家，得知他除了编辑楹联以外，还出版了一本墓志铭集。中华多墓，墓志墓铭，可以说不计其数了，只不知他苦心搜求以后，怎样定取舍，想是以可读性为原则，于公式化的文字有所突破的才能入选吧。

归来，从1月6日《大公报》的世界珍闻版上，看到印尼加里曼丹岛上为说谎者立碑的事。据说岛上有塔椰克人，素以诚实著称，他们最灰恨的是说谎的人，谁撒了芝麻大的小谎，都会受到鄙视，而如果撒了大谎，就要在他死后立碑，大书某人何时何地撒了什么谎，这是不伤皮肉只触灵魂的惩罚，而且是在人死以后——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

这倒的确是一种别致的做法。中国无之。有的，是碑上充满了谀墓的谎言。然而，现实教给人许多事要颠倒来看，那些碑上大谎难圆，撒谎撒得出格的墓主，岂不就是一抓一个准儿的诈伪之徒么？



1991年2月9日

一个旧观念

人们拆穿一些拙劣的谎话，说：“把我们当作小孩子骗！”

这个古已有之，所谓视作三尺童子、黄口小儿。然而这个观念陈旧了。

一、似乎骗小孩子是理所当然的，像骗小孩子那样骗成年人才不合理，或骗错了对象。

二、似乎小孩子就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实际上二尺以下的婴幼儿或许好骗，十来岁以上的学龄儿童，骗起来怕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请问常与少年儿童打交道的人，不知以为然否？不过，也许不好回答，如果没有骗孩子的经验的话。

1991年5月8日

[附白] 5月11日《人民政协报》纪红《真假新想》一文，从假药假酒假商品说到作假不断，“据说福建某厂出产的皮鞋竟是用硬纸做的。像逗小孩子一样，跟顾客开玩笑。”但不知逗孩子的时候，有谁用硬纸做过“皮”鞋吗？

乱世心理

女作家张爱玲的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有的简直可入《世说新话》，为此张爱玲写有《姑姑语录》。



这位姑姑”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这一则是在“语录”之外的，张爱玲注曰：“乱世的人，得过且过。”

这种以得过且过为核心而表现为只顾一时的“短期行为”，今人常概括为“世纪末心理。”

“世纪末”的毛病好治，再有几年。进入下个世纪初便可；叫作“乱世”心理的就难说了。我这样想。

1990年5月10日



责任与感情

据日本《产经新闻》八月十六日报道，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重弹前首相竹下登下野前的旧调，说对二次大战的评价，“恐怕数十年或数百年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又要赖帐了；这回加上一条论据，说：“战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下未能加以防止一事，所有有关者都要进行反省。所谓有关者，就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云云。

当时未及亲历的人，自然也要对历史进行反思，直到数百年后；然而，在二次大战期间具有行为能力的人，不是首先要反省么？不同的只是反省的结果：被侵略国的人民的反省会不同于本国的掌权者，就是被侵略国的掌权者也会不同于侵略国的掌权者，更不用说被侵略国的人民与侵略国的战争罪犯（以及他们的辩护人）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了。那末，认为每个人都应反省进而每一个人都要对战争的发生负责的“人人有份”的论点，究竟代表着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呢？

我想，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正因为有了反省，才对发生在日本官员中有关二次大战责任的奇谈怪论感到不安，才对日本十二名阁僚在一九九一年八月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姿态表示不安。这些年来，在日本的权势者首先是在任官员中，这方面的表现实在不少了。



自然,我们注意到日本社会中另一种表现,例如日本传媒在今年七月三日首次播出了美国传教士、一九三七年在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麦吉所拍摄并幸存于洛杉矶的一部十分钟纪录片,揭露一九三七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日本静冈市教员和家庭主妇等组成的市民团体,拍摄了根据一百三十名原侵华日本士兵的审讯记录、从军日记等和中国人的手记、证词制作的三十二分钟录像带《消失的一四七七七人——揭开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日本侵华的罪行固然远远不限于南京大屠杀,上述两项即表明了日本人民的反省。

我们由此看到,就是在日本国内,围绕有关日军侵华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也一直存在着两种舆论、两种态度、两种不同的纪念方式。

两种纪念,可能都一样发自衷心,两种舆论,可能都各有影响范围,然而历史事实只有一个,道义是非不容混淆更不容颠倒。侈谈“数百年后”的人须知,历史的无情,表现于历史面前人人平等;也许历史的惩罚来得不够及时,但被侵略者和一切受害者的警惕,则无须待“数百年后”。警惕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感情。

共同社八月十五日报道,由于海部首相刚刚访华归来,考虑到亚洲近邻各国的感情,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如报道属实,海部尚稍明智,因为他懂得要留意近邻各国包括中国人民的感情——尽管这种感情在历史上被侵略国度中某些奴颜婢膝的败类身上是觉察不到的。

1991年8月19日



送 寒 衣

送罢寒衣，骑车归路，分明感到秋风捎来几分寒意。这次寒衣是捐给安徽灾区人民的。听说分批汇集以后，按照分工，汽车直送到县乡。估计没有多少中间环节，不至剋扣，那末好歹送到露宿河堤或高地的受灾同胞手里，穿到他们身上，略蔽风寒，也不枉大家这一份心意。

是不是杞忧呢？不是。从各地来的朋友，没有不谈到基层黑暗的，不是腐败，而是黑暗了。不管哪一级、哪一个部门，所谓领导班子都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矛盾是绝对的”，并且是明朗化即公开露骨的，归根到底一句话，互相争权而已。

争权而不夺利，很难想象。区别只在夺哪些利，大利还是小利，近利还是远利，以及夺的方式。洪涝当头，哀鸿遍野，借河工以中饱，如《老残游记》所写的，清朝有之，民国亦有之，到了五十年代，刘青山、张子善也不例外。干部中当然有好的，但九十九个好干部胼手胝足的劳绩，也弥补不了一个坏家伙的恶行。以灾前即日常制造“人祸”的所谓干部们的巧取豪夺来看，不借“天灾”之机发国难财以“殃民”才怪。不过，些许寒衣或不至被贪污，那是因为半旧的衣服不上



眼哭了。

对于灾民，一粥一饭，一丝一缕，还是雪中送炭的事。因为他们挣扎在生命线上，所求唯温饱，所虑首在饥寒，回到了最起码的存在要求上。

前不久柯灵先生和什么人在晚报上讨论“砧杵”的实况。杜甫《秋兴》：“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这是中国千古以来的诗情，日暮风寒，使人问御寒的衣裳剪裁也未？到了阴历“十月一，送寒衣”，就是指给故去的家人祖先“置办冬装”了。可见生者死者，温饱都是第一要务。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也总不过在饥寒与小获温饱间浮动。剥夺者们在这样的人民头上榨取，益见其不人道。这些，有的形诸歌咏，有的却少见于文字。真到啼饥号寒，或被敲骨吸髓，就只有啼号呻吟，没有诗歌与文学了。

1991年9月13日



陈寅恪的史识

卞僧慧《试述陈寅恪先生治学特点（上）》（见《文史知识》1991年6期）有云：“先生拟撰的《中国历史的教训》惜未成书，论述颇散见于先生著作中”，举了陈氏文集（三）129--130页论西晋之乱亡一段为例：“

西晋之统治阶级，虽以儒家大儒为其主体，然既杂有一小部分之寒族投机者于其中，则两种不同之集团混合，其优点难于摹仿，而劣点极易传染。斯固古今通例也。如礼法为儒家大儒之优点，奢侈为其劣点；节俭为法家寒族之优点，奢侈为其劣点（慧按：原有注，均略）。若西晋惠帝贾皇后南风者，法家寒族贾充之女也，与儒家大族司马家儿之惠帝相配偶，不但绝无礼法、节俭之美德，且更为放荡、奢侈之恶行，斯其明显之一例也。故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

这使人想起萧伯纳的那个笑话，所谓一个女演员说：“以你的聪明和我的漂亮，生出来的孩子多么理想”，反过来他说：“以我的丑陋和你的愚蠢，生出孩子来又当如何”，这大家都听说过的。



按照遗传规律，两者的机率该是一半对一半吧。

可是在社会历史上，两种不同的集团之间，优点难于摹仿，劣点互相传染，陈寅恪说是“古今通例”，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确是令人悲观的。

事涉治乱兴亡，问题太大，姑且存而不论，好在它也只供负责大事的人借鉴。然而，用以看一些生拉硬拽的结合，确是不无道理。比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结果是既有所谓现实主义的拘泥刻板，又有所谓浪漫主义的虚夸浮泛；又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非驴非马的双轨并行，为一些弊端（直到倒卖“批条”）提供了可乘之隙。问题绝不是轻易地把两者信口纳入“结合”的语词结构那么理想。此意曾在1985年写入《“结合”质疑》一文，其中说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几句话，被编者删去了。那删去的一段原文是：“最近在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有关国运民命的问题上，也看到关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提法。我这个外行人望文生义，‘水乳交融’该是‘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了，然则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竟是打碎泥人，重捏两个那样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吗？”

1991年9月14日



论“只剩下一个人”

1952年纪念包括维克多·雨果在内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赶着出版了闻家骅先生译的《雨果诗选》。篇幅不大，其中就有《最后的话》，读后不空。最近通读「沈宝基先生译的《雨果诗选》（诗苑译林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收诗百首，这首诗题译为《我最后的话》，注云：1852年12月，帝国正式成立后，拿破仑第三同意流亡者归国，但必须悔过，并保证日后不作危害政权的举动。对此，雨果写下这首著名的诗，表示自己决不妥协的决心。

1851年，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在血泊中建立第二帝国。雨果是在同社会民主派一起反抗失败后被迫去国，成为“伟大的流囚”的，当时他已五十岁。1853年12月2日写于大西洋中英属泽西岛的《我最后的话》，共十六节，最后两节是这样说的：

哪怕没有尽头，我将忍受艰苦的流亡，
我不想知道，也不考虑
原以为坚定的人，是否已经屈服，
许多不该走的人，是否也要离去，
如果只剩下一千人，那千人之中有我！



如果只剩下一百人，我还要继续斗争下去；
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第十个；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个！

雨果，这“最后一个”，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他才邂逅魂牵梦萦的法兰西，回到巴黎。他被迫流亡国外十九年，归来已近七十岁，满头霜雪了。

正如诗人晚年在会集总序中所说，一部书有它自己的生命。一首诗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总是反映出作者的面貌。记得初读雨果这首诀绝的诗、“最后的话”时，我就为他那崇高的信念、沉着的悲愤，以及坚定的尊严铸成的人格精神所震撼了。

回顾我所经历的年代，不能不想起硝烟战火中与阵地共存亡，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战士。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敬仰的。

然而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勉励“现在二十一、二岁”的“同学们”“做好准备，像毛泽东所说的，在斗争中，不能被困难压倒，而要压倒困难；不能被敌对势力压倒，而必须把敌对势力压倒，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吗？真使人想起张国焘吓唬工农干部时说的，“马克思说‘无风不起浪’”。妙就妙在“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像孤臣孽子的模样了，然而这是在号召“你们要为党、为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奋斗”，那末，是整个中华民族、全民全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呢，还是整个中华民族、全民和党



都已先于你们”而被“困难”和“敌对势力”压倒，只剩下“你们”了。——而“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则“你们”的“们”亦不复存在，只剩下“你”“一个人”在“坚持”了呢？

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比起预言核大战发生，中国几亿人口死去三分之一或一半还要“彻底”，还要“干净”！请问，这是不是夸大“困难”和“敌对势力”的力量来吓唬我们现在还只有二十二岁的同学们呢？

我们过去是、现在还是以民族的、人民的解放，进而以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理想，并这样勉励年轻人的。如果整个中华民族，十一亿人民，包括五千万共产党员“战斗”到“只剩下一个”（果然，则最后“一个人”也必定会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就是说全人类的五分之一从地球上消灭了，那还侈谈什么民族、人民以至人类的解放呢？假如整个中华民族、全民全党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却只有“你们”在那里孤军作战，“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那究竟说明什么？是你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全民族都后知后觉？是你们为民族为人民为党献身，全民族无情无义作壁上观？还是你们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外别有自己的利益，以致不能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呢？如果在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里，能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何至“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呢？整个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和全党党员，怎么能眼看着“敌对势力”把自己人“压倒”到



“只剩下一个人”呢？这篇文字的作者还用不少篇幅谈“依靠群众”，不过从他立志“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来看，显然，没出息的“群众”也依靠不上了。

先生之言，壮且烈矣，但“现在二十一、二岁”的“同学们”若轻信了这一套，恐怕就会对“人生路上还有五六十年、六七十年”的未来，发生悲观和失望，以为整个中华民族不足恃，人民不足恃，党更不足恃，“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这“一个人”的“底”当然不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底”，那真不知伊于胡底了。

随笔写来，就扯远了。回到雨果的话题上来，雨果虽在特定情况下作过“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个”之语，但他绝然不会同意百多年后某个人要年轻人立志“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因为雨果有信念，有理想、有对暴君的憎恨，也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愛，虽然他并不自诩为“坚定的革命者”，但他相信“尽管那些统治者在国内用暴力，在国外用威胁，什么都干得出来，……为正义与真理而斗争的人，还是有办法圆满完成他的任务。”“恶行的力量虽然无比强大，到头来只是枉费心机，落得一场空。”这是雨果 1853 年在洋西岛为《惩罚集》写的初版序，此集收集了他愤怒声讨拿破仑第三的政治诗，《我最后的话》就在里边。这是很值得大家一读，不限于“现在二十一、二岁”的同学们的。

1992 年 2 月 9 日



马克思讽刺小拿破仑

小拿破仑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后一部著作的书名。马克思倒不曾称之为小拿破仑，他写的一本有关的书叫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最近因读雨果的诗选，特别是其中《惩罚集》部分，这个小拿破仑的影子老是拂之不去。他是拿破仑一世之弟路易·波拿巴的第三子。拿破仑一世死去时他才十三四岁。他的前半生大半在流亡中度过。早年就写小册子宣传只有皇帝才能为法国带来光荣和自由。一八三九年出版《拿破仑思想》一书。他不仅以拿破仑思想的捍卫者自居，而且从一八三二年拿破仑一世的独生子、他的堂弟赖希施塔特公爵死后，他就自认唯有他有权取得法国的王位了。

小拿破仑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用恩格斯的话说，“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身居高位的上流社会的大骗子，而在自己周围又环绕着一群上流社会的大骗子的路易·拿破仑”，得到了军队、僧侣和大部分农民的支持；人数众多的小农，行动迟钝，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抱着旧的传统不放，他们通过普选权把执权力交给了过去的老皇帝的侄子。而小



拿破仑“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依靠农民（在选举的时候），依靠一群专门拉旗呐喊的败类，依靠……军队，同时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等待一逞的时机。

时机到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小拿破仑在法国举行政变——立法议会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在三十二省内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

老拿破仑即拿破仑一世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发动军事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的；小拿破仑的政变完全照抄他的伯父。所以马克思在事变发生后写的这部讽刺和揭露作品就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这一著作写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二年三月。小拿破仑废除共和，改行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还是后来（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的事。然而马克思不仅作了法国阶级斗争特别是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历史总结，而且作了有关法国阶级斗争特别是拿破仑第三的命运的预言。

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理。”而从文章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来鉴赏马克思这部著作，你几乎很难相信这一情词并茂、文采斐然的政论，竟是在“该死的痔疮”弄得作者精疲力尽，而且上衣进了当铺、肉铺不肯赊帐，因而不能出门也无肉可吃的潦倒情境里写出来的。



马克思能对当前的活的历史达到极其透彻的洞察，那是因为他胸中自有丘壑，深知法国的以至欧洲的历史。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自然，“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马克思在历数了法国大革命曾借助于罗马共和国的幽灵，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借用过旧约全书的语言、热情和幻想以后，回到一八四八

一八五一年间的法国，指出这时只有“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而法国人民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去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士兵复活起来。”这大约就是“恶性怀旧”必然的场景。“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十二月十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一八四八经由普选让小拿



仑当了总统；而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就是法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我不懂，法兰西民族为什么该替波拿巴家族“还债”呢？

马克思犀利地指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冒充这个人的人，而他冒充为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拿破仑法典中的一条，“不许追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了二十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怪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马克思写此书的时候，路易·波拿巴还没有正式加冕，但已是事实上的皇帝。政变以前，他曾经把“一部分最堕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组成了一个领取津贴的组织，名字叫做十二月十日会”，政变以后，“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最重要的东西都入了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私囊。“选进宫廷，选进内阁，选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流荡者。”把波拿巴和他的信徒组成的政府叫作流氓政府怎么样呢？马克思说：“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及其朋党拿来跟摄政时期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朝廷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



妍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龟奴的政府’。”

马克思在结束全书的时候说，路易·波拿巴在矛盾的处境中，“作为一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着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侵犯一切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认为不可侵犯的东西，以奠定秩序为名造成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机器变得可厌而又可笑。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据说那是耶稣在受刑时脱下的圣衣）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这把拿破仑崇拜推到极致了。

拿破仑一世的皇袍不知什么样子，小拿破仑加身的皇袍则是朱红线的料子，上面绣着许多蜜蜂。因而在《皇袍》一诗中，召唤这些蜜蜂：“花红的姊妹们，/光明的女儿们，蜜蜂，/你们从皇袍上飞起吧！//……你们一齐去刺这丑类，/让发抖的懦夫感到羞愧，/把这不肖于人的骗子刺瞎，/猛烈地追击，又愤愤地战斗，/但愿飞虫能把它赶走，/既然人都怕他！”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旺多姆圆柱是为了纪念一八〇五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而于一八〇六——一八一〇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用缴获的大炮浇铸的，柱顶有拿破仑的铜像。一八七一年，继小拿破仑的垮台，在巴黎公社运动中，把这个“暴力和虚荣的象征”拆毁了。上距马克思的预言十九年。

1992年2月15日



那末，嫖客呢？

报载某月某日电讯，南方某省“正严厉清除嫖娼、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目前已抓获四百名以上卖淫妇女”，云云。

那末，嫖客呢？

据说，“对抓获的卖淫妇女首先进行教育，然后送到一定的场合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新人”。又说那个省已建立一个专门的教养所收容被抓获的卖淫妇女云云。

嫖娼和卖淫，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措施厚此薄彼，只针对一方呢？卖淫妇女需要教育改造，才能“成为新人”，男性嫖客难道都已是“新人”，不需施以同样的收容改造了，还是只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就够了呢？抑或嫖客多于卖淫妇女，一时建立不起那么多教养所呢？

我不懂法律，不过从上述报道看，这种“收容”、“教养”、“改造”不是根据刑法进行的处分，而是根据政策采取的“措施”。政策贵在区别对待，严于卖淫而宽于嫖娼，严于女而宽于男，这样会有利于清除这一相辅相成的丑恶现象吗？

力求索解，我便苦思这样做的“合理性”。

只追究卖方，而不追究买方？——卖伪劣商品的坑骗消费者，要追究，买假药的受骗者，没有



理由贵之以跟卖假药的一起构成假药市场。然而卖淫妇女出卖的是色相，嫖客能说是受骗上当吗？

卖淫是以此为专业，嫖娼只是“业余活动”？——但如果没有嫖客们这样的“业余”的需要，又何来卖淫这种不正当职业呢？正是嫖客肯出钱“买春”，才有卖淫妇女以“卖春”来挣钱。如果不从更深层去挖掘卖淫现象的根源，至少应该说嫖客存在是卖淫现象的前提。

卖淫妇女无钱无势，好抓好“办”，嫖客就不那么好处理？——看来不失为一条理由，但这理由拿不到桌面上来。嫖客亦多矣，有原来有钱有门路的阔人，有新近有钱有关系的暴发户，或通黄道，或通黑道；甚至有那么一些外国人，诸多棘手之处。然而，在中国的外国客商和观光客并不享受外交豁免权，中国本国的各色人等也不闻享有法外施恩的特权，涉足嫖娼，按说应与卖淫一例看待的。否则，法律的尊严何在？清除社会丑恶现象的严肃性又在哪里呢？

或曰：不是还说“对嫖客和卖淫妇女还要处以数量不等的罚款”吗？这里把嫖客说在前面，看来对“钱烧的”嫖客要课以重于卖淫妇女的罚款了。但是我替卖淫妇女不平，为什么“大爷”、“老爷”们留下一摞钞票，就可以扬长而去，这些女人同样要缴出卖身钱作罚款，却还要收容起来“教育”和“改造”呢？读者当然理解，我这样提出问题，绝不是对于嫖客们的“教育”和“改造”格外关心，对于他们成为“新人”寄托多大希望。只是认为，嫖客不除，卖淫不止。

1992年3月末



罪与非罪

罪
与
非
罪

一份文摘报转载《安徽工人报》3月27日报道：不久前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傻子”创办人年广久宣布：鉴于芜湖人民检察院日前已撤回抗诉，年广久的贪污等经济罪不成立。

我猜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之所以撤回抗诉，使芜湖市人民法院得以宣布年广久的经济罪不成立，怕是今年一二月间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提到了年广久的缘故。

如果邓小平没有提到他呢？

也许只是巧合：当地检察机关不是根据某一领导人的讲话，也不是出于一时一地政策上策略上的需要，而确实坚持“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经过调查研究，决定撤回抗诉的，不过时间恰在邓小平讲话提到年某之后罢了。那就算我瞎猜。

说是瞎猜，因为我没有经过调查；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思路。经验主义不好，经验则属于闻见或经历过的事实，不失为发人深思的材料。

例如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林希翎被划为右派，曾被广泛地公开点名批判，随后又被送往劳改场所，似乎还判了有期徒刑（不知几年）。直到70年代某一天，毛泽东主席偶然想起，不知此人



下落。传达下去，叫作“亲自过问”，这才从监狱里释放，安排到一家小工厂作统计员了。

如果毛泽东没有“亲自过问”呢？

这里所举，都是有权威的大人物“点到为止”地促进了公检法部门依法办事、泽及“罪人”的例子。但如果不是切实地完善法制，严格执法，就难免不在这里那里偏离法律的轨道，错捕错判不易避免，错案发生后也不易及时纠正。有一位领导人无意于以权下法，只是随口问了一句，某某还在家里吗？听话听音的下级错会了意，以为此人不宜再住在家里，便抓起来了。而这个人虽在应予“审查”之列，但按过去“肃反”时政策也属于“可抓可不抓则不抓”的。这不是天方夜谭，据说是曾有的实事。这显然是把领导人的话看得比法律更重的思维定势，把揣摩领导人意图看得比实事求是更重的行为模式在作怪。

看来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首先应该是加强法治意识的教育，而无论法治意识或法律知识，最起码的和最核心的，是弄清罪与非罪；然后才谈得上以法律为武器准确地打击犯罪行为，有力地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

1992年4月15日



姓 什 么 好

姓
什
么
好

姓氏是家族的符号。从文化史甚至政治史的角度看，研究诸牒世系无疑都是一门学问。大姓、小姓，士族、庶族，豪门、寒门，在未脱宗法社会胎记的古代，关系着不同出身的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休咎。

姓之为用大矣。指斥一个人晕头转向，说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就如形容一个人糊涂颠预为“做官把印丢了”一样：区别只在“印”是物质的，姓是抽象的，“印”是后来到手的，姓是先天注定的（自然，“印”也有随姓带来的，而姓也是可以更改的）。

皇帝对宠臣赐姓以示施恩；得罪了朝廷的要隐姓埋名。搞不好难免遭灭门之祸。纣王杀了叔父比干，比干的后人遁迹山林，指物为姓，据说就是今天海内外一切姓林的人的根。阿Q大概不知道大宋朝人称“赵官家”，但他自称跟未庄的赵大爷是本家，招来赵大爷一记耳光：“你怎么配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姓什么原来是个大问题，只是过去人们无权自由选择罢了。

至于“问问姓‘社’还是姓‘资’”，作为一种修辞方式，似是几十年前“天下穷人是一家”这



——宣传的继承和发展——大家都“姓共”、“姓农”、“姓穷”曾经是发动贫苦农民同仇敌忾的有力口号。

然而现在已经不是依靠贫雇农打土豪分田地或进行土改的时期，也不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合营改造的时期了。中国人民从切身的痛苦经验中找到改革开放这条摆脱贫穷落后的道路。那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违情悖理之论，已经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代替了。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国上上社会进步的重大标志，是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人类解放事业所能做的伟大贡献。

这个目标指引下的改革开放是空前的壮举。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究竟会导致普遍贫穷和落后呢，还是能逐步引向富裕文明？这才是民族命运攸关的首要问题。如果一定要问姓的话，还是多问问中国到底要姓“富”还是姓“穷”吧，我以为。

1992年5月20日



桃花与血

桃
花
与
血

去年三月过上海，住在漕溪路，就近上龙华看桃花。来早了，桃花未开。在龙华烈士们的遗照旁边，抄写着那首传诵很广的狱中题壁诗：“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在萧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一九五九年四月初版本里，收入此诗，题作《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说是一九三五年有人被囚于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从墙上看到的，作者佚名。

作者终于找到了。是三十年代一度被关在那里的张恺帆。张恺帆没有死，不然就不会有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的“张恺帆事件”了。

张恺帆一九五九年是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七月四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他感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九日在新民公社工福大队，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当晚就要县委书记予以贯彻。到七月十五日，全县六千多食堂就“一风吹散”了。他还叫县委对公社化前后有关劳动力、生产资料、房屋、干部作风和发病率等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查。

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时候，庐峰会



议正开得紧张。到了八月四日，安徽省委把有关这件事的专门报告送交在庐山开会的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报送毛泽东。八月十日所作批语开头就点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恺帆”。这五百多字的长批，据一位过来说，“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极为深远。”

我在“文革”中传抄的材料里读到过这件批示，初知张恺帆之名。一九七七年在皖南皖北一带，听到许多干部群众传说张恺帆罢官以后的种种。原来他是战争时期就在当地工作的，了解真实情况，解散食堂是为群众办了好事，口碑很好，为此受过，得到广泛的同情和崇敬。

我以为张恺帆得以在三十年代出狱，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这是幸事；尽管他那首题壁诗因此不再收入再版的烈士诗抄，而“墙外桃花墙里血”云云，折射着殉难者的高风，也表现了幸存者的赤诚。我们宁愿少一位被称为烈士的死者，多一名为人民说真话、办实事而同样不怕牺牲的生者。

我由张恺帆而想到许多先后在刑场、战场上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如果由于同志的营救、人民的援手，能够像张恺帆那样活下来，在像一九五九年那样的时刻，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的。

我们常常提起先烈，也许因为时间渐渐地久了，血痕渐渐地淡了，人影渐渐地远逝了，模糊了，先烈二字化成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我们要说他们



依然活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就得调查，这一位烈士或那一位烈士如果活到今天，他在这样那样的重大课题前，会怎么想，又怎么做？

在千千万万的先烈中，也有死于“自己人”之手的。如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夏，王明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央特派员夏曦，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出发，破坏党内民主，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反改组派”斗争。据贺龙的《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追忆，仅在洪湖就错杀了一万多人。其中就有因“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而闻名于身后的红二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还有红二军九师师长段德昌，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第一号）的授予对象。

可设想千千万万英烈包括柳直荀、段德昌等于地下，他们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左”会怎么看？自然，夏曦死在长征途中，早在延安时期也就列名于烈士之林了。他如活到今天，持甚么态度，我们无从想象。不过，如夏曦者总是极少数吧。

1992年5月21日



怪 圈

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海内海外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捧出孔孟之道。有趣的是，一些资深的共产党人和一些资深的反共之士，似乎在这里找到了共同语言。

想一想，就不那么有趣了。在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孔孟之道就拿在反共的人们手里，当作反共的武器的。在长达 28 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新旧军阀则标榜自己是“礼义廉耻”，从孔夫子一直拜到“曾文正公”；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更声称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

孔孟之道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也许真有助于内外统治者推行和巩固他们的秩序。来对付中国人民以至中国共产党吧？

然而孔孟之道的核心和主体，仁政，始终不见实施。

也许不怪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是好的，内外反动派只是打着它的旗号，却并不实行？也许孔孟之道本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宜空谈，而不适于实行？

也许孔孟之道因为是向王者们献的治国救民



之策，自然有可资历代统治者直到近代反共的人们利用的东西？

但是，曾经出入马克思主义武库的一些人要从孔孟之道的武库里取用什么呢？

在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进行总结的过程中，作为孙中山思想的核心和主体部分的三民主义，加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阐释，被称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应该说是一种批判的继承。

那末，孔孟之道呢？有没有可能像“革命的人道主义”区别于一般的人道主义那样，以“革命的仁政”诱出于原来意义上的仁政呢？

毛泽东 1949 年《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论到国家的权力时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能施仁政。”

孔孟两位先生的言论里，固然没有说要把仁政“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但至少没有如毛泽东这样斩钉截铁地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以及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仁政。

所谓“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这之类的话，大概只有迂腐的孔孟之徒或被毛泽东讥笑为蠢猪式的宋襄公一类人才说得出口。依他们，就没有“其势如暴风骤雨”的革命群众运动，就没有“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试想，执政前夺取政权的斗争和胜利后保卫政权的斗争，



能够那么温良恭俭让吗？

谁如果相信了孔孟之道的仁政说，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到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原则的对立面去。

按照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孔孟之道所谓的仁政，是奴隶主——封建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如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一样，不过是掩盖其血腥统治的虚伪的遮羞布罢了。所以什么施仁政云云的提法，基本上是为毛泽东所不取的。

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怪圈：人们今天重提孔孟之道，把它作为传统文化来弘扬，原意是为了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维护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然而检点出孔孟之道的武器，一一细考较去，便会发现其矛头直指毛泽东思想——例如仁与仁政，就跟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针锋相对。不然为什么四十多年前反共的人们就指责“你们不仁”，而毛泽东干脆回答“正是这样”呢？——原来竟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殊途同归，这是以孔孟之道为反自由化武器者始料不及的吧？

连读一些所谓弘扬传统文化，实则鼓吹孔孟之道的文字，不期然发生如上的困惑。草草写出，深望各方贤达有以教我。

1992年5月25日



笑谈之余

笑
谈
之
余

某市委党校出了一道填空题：“我国的权力机关是什么？”据说不少人答是：“市委”或“政府”；校长请教市委宣传部长，也果断作答：“当然是市委。”

《民主与法制》发表署名文章（见5月19日《报刊文摘》）说这是一个大笑话。

可笑吗？

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这样答题就对了。然而不少人直至领导干部认为权力机关理所当然是“市委”和“政府”就错了吗？前一个答案的根据是宪法，后一个答案的根据是实际。

实际是：不仅在发生这个“笑话”的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距离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还远得很。

例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本来仍然属于第一线，但在许多地方变成退居二线的党政干部的荣誉职务；人大常委会同政府的关系本来是国家权力机关同它的执行机关的关系，政府要对人大负责，受它监督，但在许多地方的关系恰恰相反，甚至有些政府负责人还在党内分管人大工作。这样，



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比党委和政府“矮”了一头，难怪有人说“党委决策，政府办事，人大挑刺”，似乎人大不但可有可无，并且碍手碍脚了。

因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人大同政府的关系经常反映为人大与党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党成为执政党特别是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就该由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逐步转变为通过政权组织来进行；党的主张和决议、也只有通过政权形式才能化为对全体人民具有法律意义的行动纲领或准则。然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一转变还没有完成，党组织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的状况，在许多地方还是经常现象，宪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都还有待落实。

就拿宪法规定的，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或决定任免来说：“党管干部”的传统与人大依法行使干部任免权的矛盾，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过去习以为常的做法，是同级党委决定名单，人大开会“保证通过”，这叫“履行法律手续”。个别地方人大没有“保证通过”党委指定的某个人选，就成为“抵制党的领导”的事件或事故。多数是在党委已经批准的情况下，人大即使认为某些人选不称职或人望差，也不再表示不同意见，如果代表们有人在会上会下发表看法，常委会还要“做工作”，说服大家维护党委的决定。

在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问题决定权，行使监督权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情形。党组织提交人



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政策性决定，方案等建议，人大及其常委会除了一致通过以外，提过多少不同意见和修改意见，使之集思广益，更加完善并避免失误呢？对于“有法不依”、“以权压法”这一法制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于党组织的文件或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宪法和法律出现抵触的情况，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行使了监督职权呢？

党组织不是权力机关，政府只是国家政权的执行机关，然而，党委和政府比起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更像权力机关，代行其职权，或凌驾于其上；这是相当普遍的现实。因此，对于反映了这一直接现实的答题者，不要笑他们对宪法的无知或忽视，倒要从呵呵一笑中，引起我们对“落实宪法”的深思呵。

1992年5月



发 噱 之 余

8月3日《新民晚报》二版有一则《小学生使用名片亦喜亦忧》的消息，肩题说：“公关意识低龄化”，大概是可喜的一面，“职务一栏真发噱”，发噱之余，我想就是可忧的一面了。可忧者何？原来有些学生的名片上还印上“中队长”、“大队长”的职务，甚至一位学生的名片上印有“队长助理”四个字。

“官本位”意识也“低龄化”了。

虽然一时还远远做不到——但“官本位”正是成人社会议论纷纷，认为应该通过经济改革以至相应的行政改革，使它逐步缩小影响的东西。成人社会还没摆脱掉的，儿童少年竟抢先捡起来了。

“官本位”真的还要“一代一代往下传”么？

孩子总是在“学样”。学好样，也学坏样。

关键在于教育，这里倒用得上“导向”两个字。

校园真也离不开社会的影响；学生如此，执行一定教学方法的教师也不例外。

为了革所谓“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命，曾经采取多少行政的、组织的措施，甚至借助于暴力，从强调阶级路线到大搞唯成分论，伤害过多少儿童少年的心灵，压抑了多少智力才



情的发展！像“文革”的岁月不必说了，就是直到今天，在例如班主任的工作中，还残留着不少左的烙印，主要是照搬成人社会中不健康的一套，所谓选拔小干部，所谓依靠积极分子，所谓了解情况和帮助同学，竟也制造出小小官场，鼓励告密等等，开始毒化人际关系——而这是在刚刚懂点事又还不太懂事的孩子中间，而有时甚至还打着“思想政治工作”或“德育”的招牌！

小学生名片上的职务云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问题。这不能单纯责怪老师，无论是班主任，教导主任或校长。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问题。

教育搞不好，是对民族、对历史的犯罪！

1992年8月6日



一首奇怪的儿歌

六月间在青海格尔木，有一天傍晚，散步闲谈，不知怎么从目下小孩生活的单调，一下子扯到各自小时候念过的童谣，唱过的儿歌，做过的游戏。

诗人雷霆说起他小时候唱过一支歌：

1 2 3 0 | 1 2 3 0 | 3 5 3 2 | 1 2 3 0 | 2 2 3 2 | 1—||
监牢狱 监牢狱 把你送到 监牢狱 做个好朋友！

他哼过以后，几个旅伴，二三十岁的，四五十岁的，都怔了一下，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当时就这么唱，我也不懂！”

雷霆今年五十多岁，他的童年在济南度过。至少在40年代的济南读小学的朋友，还会有人记得这支儿歌吧。

现在通称监狱了。我记得我小时候，人们口语里也是叫作“监牢狱”的。这个语言上的特点带着时代的烙印。

而这个简单的旋律，奇怪的歌词，在后来青藏公路的旅途中，不时地在我心头掠过。越是不明白它的涵义，越是要想，什么规定情景下唱这支歌？可越想越不明白。

也许这只是旧日一个儿童游戏，就像“官、打、



巡、美”一样。然而“官、打、巡、美”玩的只是这支歌的上半截：“把你送到监牢狱”，并没有“做个好朋友”。

也许是孩子们不知“监牢狱”的厉害，以为就像“跳房子”（或称“跳间”）一样，不过表示有那么一个地方而已，无损于“做个好朋友”的。

究竟是原来就是好朋友，把好朋友送到“监牢狱”去了，却表示还要继续做好朋友呢？还是原先不是好朋友，给送到“监牢狱”去，希望今后交个朋友以至好朋友呢？

这是唱歌的人的愿望吧？被送到“监牢狱”里去的，会不会接受把他送去“监牢狱”的人的好意，愿意“做个好朋友”呢？他们做得成“好朋友”吗？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他们能够“做个好朋友”呢？即使被送到“监牢狱”去的真也乐意跟送他进“监牢狱”的人“做个好朋友”，那么请问，那个“把你送到监牢狱”，又唱着要跟你“做个好朋友”的，到底有几分诚意呢？

这样想着，在缺氧的旅程中，脑细胞仍然在单调的车轮和马达声里活动着。抛锚了，思维中断，不免自嘲：这是以成人之心度儿童之腹了。

不过，历史上的童谣或儿歌，多半不是孩子们自发编成的，往往难免成年人的插手，这才在传播中定型。也许因此才使这短短的似乎信口吟成的儿歌，传达出非儿童所有的世态感：一手把你送入囹圄，一手与你握手言欢，这在杜甫、白居易讽刺人情翻覆的诗句里，也没有表达得如此简练，又仿佛如此习以为常吧。



1992年9月15日

说 舞 弊

深圳股市发生风潮以后，据说当地政府决心解决股市舞弊问题。我读报不多，但也略知一二了。

据《华商时报》8月22日报道清查发售新股认购表过程中的舞弊行为称：

据反映有一家银行分析，共有表格一万五千张。真正公开售出的只有四千张，一万一千张表（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被走了后门；另一家银行，从上午十点售到下午五点半，自始至终以每人买十张、十分钟售完一个人的权慢速度发售，全日只售出表格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的表格亦内部“消化”了。舞弊行为当然是由购股表的高额利润诱发的，在8月9日售表当天，黑市表格立刻被炒到六七百元人民币一张，最高的竟达二千元，至少也不少于三百元人民币。

据中新社9月10日报道，到8月底为止，深圳市民的八百多件投诉中揭发了新股抽签表（按：即上引消息中的“购股表”）舞弊严重，个别部门有关负责人竟私分数千张。部分执勤人员违纪打人现象，也在投诉中占突出地位。



舞弊是个老词儿。学生在考试中“打小抄”，搞小动作，叫作作弊。有权力的人利用职权在高考中为子女亲属谋私，就叫作舞弊。在开科取士的年代，科场舞弊属于大案，不杀头也要褫官流放的。不过刑法再严，弊端长在，舞弊者仍自舞之，就如同“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一样。即使科场清明，主考廉正，考出的人材里，也还总难免有人做了官，在任上舞弊的。这决定于当时的官僚政治制度，不待说的了。

而舞弊这个词儿，不知道始于什么时候，又是什么人所造。“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着一“舞”字，那舞弊者沾沾自喜，飘飘欲仙之态，玩弄袖里机关于从容不迫之中的自我感觉，全都充分地表露出来了。

然而现在还不是光从修辞学角度来分析“舞弊”词语结构的时候。像深圳股市的舞弊行为，不仅损害了股市交易中“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侵犯广大股民的利益，而且直接导致了群众性的股市风潮，危及社会稳定。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

这是有关当局要研究总结的问题。作为一个股市风潮数千里外的局外人，我想的是为什么舞弊也变成“群众性”的呢？是有关人员职业道德的普遍下跌呢，还是法律纪律规章制度（例如会计审计制度、股市监管制度）不完善不健全以至不算数的缘故？是“法不责众”的意识还是“上行下效”的机制，或者交相为用，使得上述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发展成“群众性”的舞弊呢？不过，



舞弊尽管有时成为“群众性”的，那参与舞弊的毕竟还是“小众”，而且其中有主从之别，得利也有大头小头之分；而比起舞弊的“小众”来，受舞弊之害的总是多数，就是“大众”了。

这一次包括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内的、遍及深圳许多售票点的“群众性”舞弊，引发了为数更多的股民的群众性风潮。

没有制度化的监督、制衡力量的切实参与，任何领域都会滋长舞弊之风。当人民群众不是通过民意机构等正常渠道，而是直接实施自己对舞弊行为的监督权力的时候，往往会形成抗议行动，矛盾可能因而激化，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深圳股市的严重舞弊，由于激起了群众风潮而为人们所瞩目。然而，天怒人怨的舞弊难道只有这一件吗？深圳市政府正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别的同样存在舞弊之风的地方和部门呢。

1992年9月15日



关于黎庶昌二题

传薪者和窃火者

· 在黎庶昌国际研究会开幕式上的贺词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在前贤黎庶昌先生身上，我看到许多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感到亲切，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历史是严峻的，它将淘汰一切虚假的卑微的东西，而还一切真实的、崇高的可贵事物以本来面目。

黎庶昌可以说是中国士大夫最后一代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具有中国主体文化传统的本色风格，又带着他那个时代的特点。

黎庶昌积极入世，忧国忧民，这是儒家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以天下为己任的一面的传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上书言事，痛陈时弊，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一点上，他也可以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坚持理想、不惜牺牲的民族脊梁。

而黎庶昌又远远没有局限在中央帝国“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里。他属于第一批睁开眼睛看



世界，并且把世界上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国人的先进者。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海上交通的开辟，来叩中国闭锁国门的，既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也有欧风美雨的另一种文明。在内忧外患和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出现了一代为古老中国在新的世界上寻找位置、探索出路的人们，其中就有黎庶昌。

黎庶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然而他和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心是相通的。有许多他在那个时代做到的事，对今天的我们，还是要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我以为，从黎庶昌和他同时的一代文化精英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

就总体来说，知识分子应该代表本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而且应该站在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的前列。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精神以至道德的最高水平的代表，是能够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使几十年的精神文明得到发展的传薪者，同时又是能够同世界各民族对话和交流的，汲取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的窃火者。这是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我们时时刻刻要检讨的是：我们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了吗？如果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来，那障碍除了来自客观的以外，主观上又是什么问题？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带着这样的问题来到这个会上，向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学习；不是把黎庶昌拔高和神化，而是以历史为鉴，以黎庶昌为鉴，思考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的责任。



祝研究会得到预期的成功。

1992年10月4日于贵阳

谒黎庶昌故居八首

一

楼头书尽鼠窥窗，池堑无踪竹树荒。

犹忆五更山月落，团团击瓦露橙黄。

庶昌忆童年与仲兄夜读，每至月落山寒，窗纸映黄金色，竹露滴沥有声，吟哦未已。庭有古橙，时或黄团下照，大声砉然，击屋瓦皆碎。争启户往拾返，读如初。见《仲兄椒园墓志铭》。

二

诸公默尸朝堂位，贤士空怀畎亩忧。

莫道一鸣缘困蹙，早年奇气蔚琴洲。

庶昌遵义故居，前临乐安江，中有百丈沙洲，形似琵琶，人称琴洲，村名沙滩者以此。

三

西洋杂志志西洋，万里来观议事堂。

独断独行今已矣，改弦颇思得更张。

庶昌著《西洋杂志》，于西方政制民俗，以及物质精神文明，多所介绍。又其《答曾



侯书》谓：“中国君主专制之国，有事则主上独任其忧，臣下不与其祸。”《俄皇遇刺》文中对亚历山大二世“事皆独断专行，又不设立议院，民情不能上达”，颇示不满。

四

嘈杂人声辩若狂，宣言宗派听铃铛。
朝来定议夕退位，民情国事两无伤。

庶昌《法国议政院》文中所记若是。《伯理玺天德辞位》文叙法国总统马克蒙无议会多数支持，被迫辞职：“朝定议，夕已退位矣。巴黎之人，若弗闻也者。”

五

东顾西瞻知不足，可怜一折本醍醐。
书生难得无酸气，阁吏从来尽小儒。

庶昌于光绪十年（1884）三月，上《敬陈管见折》，请“整饬内政”，“酌用西法”，建议七项措施，包括派遣亲贵大臣赴欧美日本游历，“综览全球，虚心访察，必有默然知我内政之不足者。”此折被总理衙门和压退回。李鸿章读后，尝谓“大言炎炎，深切时事，足令小儒咋舌”，“解人难索，可为叹息”云云。

六

败耗频来涕泪零，樱花枝上记嚶鸣。
眈眈日本蓄谋久，遂使先生目不瞑。

庶昌两度使日，与朝野有识之士文酒唱



和，互通友好。甲午战时，庶昌已官川东，闻败绩，忧愤至极，或终日不食，渐成心疾，神志恍惚。终于光绪二十三年末（1898初）郁郁而歿。

七

有之请自嗣同始，如闻罄歎声穿纸。
京门喋血戊戌秋，牂牁春歿黎星使。

八

桐城义法不为藩，半似庐陵半半山。
梨枣逸书二百卷，先生丛稿未重刊。

庶昌在日本注意搜求国内亡佚之唐宋元各代珍本二十六种，并“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镌刻《古逸丛书》二百卷。而先生遗著近年版行者惟《西洋杂志》一种。

1992年10月13日



说好说坏

有位朋友打电话问我：“你在批评深圳了？”

我最近写了两篇小文都提到深圳。一篇说我在深圳“不仅看到了光明面，也看到了阴暗面；几乎同时看得到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接触到资产阶级思想也接触到封建主义思想”。另一篇从股市风潮说到深圳包括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内的、遍及许多售票点的股市舞弊案件，恰像作了一个注脚。

我没有点名只述事实，但所说都有根据。深圳不是《圣经》里的伊甸园，也不是《镜花缘》里的君子国；它发展市场经济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还存在这样那样不能尽如人意的现象，是完全正常的，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要从事物的本质和主流着眼，但对一些支流的现象也不该视而不见。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这位朋友打电话给我，却是出于诚挚关心。1984年初夏，我第一次到深圳参观访问，回来写了一组见闻和随想文字，为特区“垦荒牛”在“特事特办”的方针下走出一条新路子叫好，自信也没有溢美的地方。不久深圳连同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受到非难，风言风语一度从悄悄话变成嗡嗡大声，其中也夹杂着几句对我肯定深圳成就的



议论。那时候，就正是这位朋友提醒我不要满不在乎，他为有些议论中透露的幸灾乐祸感到不平，又为他敏感到的隐隐的杀机而替我担惊受怕。

这一回，朋友又重提旧事，说经过10来年的风风雨雨，创业的艰辛，曲折的道路，深圳特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围绕深圳的争议也仿佛终于划了一个句号。好不容易啊，一切肯定过它的、支持过它的，不仅从而感到欣慰，并且应该加倍地维护它。

“难道指出它的不足，不正是维护它，让它更健康地发展么？”我几乎要大声反问。我懂得我所尊敬的朋友的心，他竭诚拥护改革开放，又确实关怀着我，怕我在全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邓小平视察深圳、再次肯定了深圳的成功经验以后，由于“不识相”，说些不该说的话，犯错误。

不忍辜负朋友的好意，但又不能率尔地苟同。电话说不清，我约好到朋友处面谈。然而面谈什么呢？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这原是鲁迅先生评论文学作品的态度。这话我早就知道，但仔细想想，却长久没有做到。而且不但我没做到。可见要做到也不那么简单。“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我们许多人浸入骨髓的心理定势。这种人主观的爱憎常常压过了客观的求实。于是，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在宣传和辩论时尤其如此。结果对我们所批评的，常会一笔抹杀，而对我们所辩护的，又会遮丑护短。比如大寨从干



部到群众都曾是艰苦卓绝地力图改变家乡面貌的，大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源在当时的路线方针，不能由大寨人负责，然而在树大寨为样板的过程中，大寨无疑吃了“偏饭”，这种“偏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只许说好，不许说坏，长期掩盖矛盾，这既不害了群众，也害了干部吗？

若想把哪一个人、哪一个群体推向没落，推向停滞，推向失误以至不可自拔，那就向他们一味地说好话、献谀词、唱颂歌，而把任何批评和忠言都叫作吹毛求疵或别有用心吧。

深圳所以能当好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排头兵，正是因为深圳人能够清醒地面对现实，面对外部的压力，也面对内部的矛盾。

因此，我以为，对于深圳，对于各个经济特区以及所有别的地方和部门，对于我们所维护的事业，一定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否则，我们不是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陷入片面性和盲目性吗？

1992年10月8日



李连英有所畏

李连英有所畏，所以不敢无法无天。《燕都》今年第四期，有林径先生记李连英的处世之道一文，说李连英的前任（安德海）后任（王俊如）都成了刀下之鬼，他却以戒骄戒矜为座右铭，得以保全首领。“文革”中打开他的墓穴，尸骨完全，关于李墓中有头无身的传说，只是传说而已。

据说清代太监的权势不能跟汉、唐、明相提并论；有清一代，太监没有掌过兵权，也不能左右政局。交泰殿前有钱牌，明谕太监干政夺权属于犯法，凡是“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处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凌迟处死。李连英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决不是戏剧舞台上的刘瑾。

一八八六年，李连英奉旨陪同醇亲王巡阅北洋水师。他只戴个七品小官的金顶子，布衣布鞋，每天手执亲王的长杆烟袋、烟荷包，侍立装烟。他不敢戴二品红顶子，他知道太监授二品顶戴是“违制”（依例太监的最高长官是四品），炫耀“殊劳”，难免招祸；他更知道由于他奉旨陪同亲王巡阅海军，朝野舆论纷纷，恐开太监监军之例，御史们此时正拭目以待。

李连英知道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西太



后的妹丈，权势决不在杀安德海的恭亲王以下。惹出事来，亲王为平息舆论，拿他开刀，也未必手软。他回避一切上门至谒、送礼邀宠的人。他对手下人说：“每年稳稳当当的十万两银子，足够我花的用不着交外官，交外官是有危险的。”

不但随亲王出巡，就是在家也一样，光绪年间曾毓雋调任李连英老家大成县县令，上任前去拜见李连英大总管，竟蒙以客礼相见，口口声声“老父台”。告辞时李送到二门，曾毓雋说：“请总管留步，以后总管家有事，尽管吩咐我。”李连英作色道：“老父台，这可不行，我家的子侄和族人如有什么不轨之行，你要严加管束，否则你我都要被“参”啊，此事我拜托了，请你切记”。据说曾到任后，确实没有发现李家有什么不法之事。这是曾毓雋六十年代初应全国政协之邀到北京小住时，对正在编写《太监》一书的段伯泉说的。

李连英有所畏，当然首先是畏太后，畏太后的近亲，要小心伺候；其次他也畏朝野舆论，畏御史台，怕受人以柄，被人参奏。皇清不是法治国家，金口玉言破例授李连英二品顶戴就是证明；但大面上朝廷国法和“祖宗家法”还是言官的法理根据，多少形成一种制约。李连英在慈禧和光绪之间的宫廷权力角逐中周旋，想要左右逢源、两面讨好，夹缝求荣而不作牺牲，不得不有所收敛。

李连英有所畏好。他个人得保善终，客观上也总归少做几件坏事吧。而御史们似以无所畏惧为好。

1992年10月20日



从“囚”说到法

从「囚」说到法

四面墙里关住一个人，这就是象形字“囚”的本义，1966年8月起我关进一座叫“政训队”的灰楼，不用读《说文解字》，就琢磨透了。

笼统地说是“关”，即不许回家，有人看管，门上并不上锁，不算逮捕收监。即使一旦实行天真学者所建议的冤狱赔偿制度，大约也只赔偿蒙冤坐了正式牢房的；不过“文革”初期陷入冤狱的恐怕也拿不到赔偿，因为一般追诉期为20年，早过了。我这里用“追诉”二字，不知是否符合法律用语的习惯。

虽非坐牢，但又不是软禁。比软禁“硬”一点儿，连上厕所都得先“报告”的。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后来俗称“黑帮队”、“牛棚”就通俗易懂了。而“政训队”云云，其实这是那时一个副部级国家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组建的——一个非法拘禁干部和群众的单位。

当时我在这个机关已十七年，最早在1951年至52年间“三反”运动中，就看到过对有“老虎”嫌疑的人实行“隔离反省”、关门送饭的事，由于“事不关己”，不以为意，轮到自己头上，这才有了“求仁得仁，夫复何言”的自嘲。相对于



法院来说，这是“私设公堂”，但“法人”仍然姓“公”，这就使大家习以为常，甚至觉得在机关单位里接受审讯、拘禁，比起“上法院”还是一种宽贷。如果我记得不差，总是从七八十年代之交，人们的法律意识开始加强了，“私设公堂”、“私刑拷打”这一类事情才成为公开揭露和抨击的对象。虽然这种揭露和抨击不是没有阻力的，因为有关的违法犯罪者多半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权有势的——有权的一呼百应，自然有势，有势者例如称霸一方的地头蛇，也会把有权者纳入关系网。

《工人日报》1月26日载文，提到山西一家私营砖厂主，在抓回一名不堪虐待的民工以后，非法关押在库房里，唆使工头和三名打手轮番殴打致死，把尸体浇上汽油焚烧。此案已由公安部门破获。不知为什么报上不点出罪犯的姓名和厂名、地名，是怕哪个当事人起诉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吗？

跟这个案子相比，北京国贸大厦惠康超级市场认为两位消费者有偷窃行为而施行盘问和检查，北京中日合资皇城快餐有限公司的精品小屋也因丢失戒指而盘查顾客，案情似乎轻得多，但教训却并不轻。如果随便什么工作人员（哪怕是保卫科长，经理，党委书记）都可以任意对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实施检查或搜查，或者强行不让公民脱身，那末还要执法机关干什么，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不是成了废话，而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岂非沦为一纸空文了吗？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个淳妃在自己宫



内私设公堂，把一个宫女“责处致毙”，第二天皇帝就谕令“降封为嫔，小示惩戒”。他说是“从重办理”，不过只是降级，我们觉得偏轻了，但他能这样及时处分，表明他还要维护明文的法纪，也表明他懂得如何善用（也就是节省着使用）自己的威权。这也许就是弘历不失为明白皇帝，乾隆一代还不失为治世的缘故吧。

长远地看，以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逐步健全法制，先得杜绝各种各样的“私设公堂”。

在表达这样的良好愿望时，不能不格外寄希望于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文摘报》有关国贸大厦惠康超级市场对两名顾客非法检查的报道中提到，国贸律师称，国贸中心向原告支付2000元人民币，是一种善意性质的给付，而不是精神损失赔偿或精神抚慰金云云，《南方周末》有关南阳一桩诉讼案的专稿提到，某地法院工作人员来到北京进行调查，下车就被原告一方接走了（？），倒是一点不避嫌疑。读这些报道，我难免将信将疑，总觉得像是外国描写司法黑幕的电视片里的情节或细节，很不像我心目中秉公执法的司法工作者的光辉形象。我宽慰自己，还是要相信大多数，执法犯法的和不够格的法官、律师总是少数，坏不了一锅汤。但我又想，如果不幸面对的事实，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让这样的人影响了诉讼，那就难免出现“公设私堂”的局面——也就是冤假错案、不公正的判决了。即使冤假错案，不公正的判决在比例上只占全部案件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对受害的当事人则是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



之万啊。

当然，要健全法制，提高司法水平，树立公正执法形象，除了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以外，还要真正解决长期干扰法制建设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问题。去年年末新华社报道任建新谈改革法院制度和审判方式时，提到“保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虽只一句话，却是很关键的一句话，有这句话比没这句话好；尽管看来是要付出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有这个目标总比没这个目标好。

1993年2月8日



读报一感

读
报
一
感

有些三资企业漠视有关规定，克扣员工应有的福利；这是从台湾《工商时报》一篇署名文章中读到的。

这篇题为《为什么没有年终奖金？》的文章，引用一个深圳合资企业的湖南打工妹小周的话：“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从这里说到大陆的外资企业中，“一些明文规定的劳保制度，如医疗保险、年终双份（两个月薪水）、年假及固定假日休假等都任由厂方自由裁量，因此出现许多奇怪且不合理现象”，例如放一个月年假时没有工资，也没有年终奖金，又借口年假长取消平日休假；吃住都扣薪水，厂方任意规定价目，劳方常吃暗亏；员工在特区工作的“暂住证费”、“特区身份证费”、“人头税”等，有些外商也转嫁给工人……这篇发表在台湾报纸的文章着重批评了台资企业：“由于特区劳力充沛，流动性甚大的外地劳工知识浅薄、劳保意识低落，乃予不肖厂家以可乘之机。据一般反应，台商是最不遵守有关规定，忽视劳工权益的。其次是港澳商人，日韩其次，以欧美外商较为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为什么在大陆的有些三资企业中，工人作



为廉价劳动力的基本权益，不但得不到有效保障，反而受到严重忽视呢？

这篇文章归结为“大陆上由于官僚主义盛行，上下官员贪污成风，与资方狼狈为奸，对外资企业的员工福利不很注意”，这似乎是逆耳之言；不过，依照三大光荣传统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精神，即使只有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一二三的合理的正确的意见，也是值得欢迎的。

我想，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三资企业，与保证三资企业中大陆雇员利益是并行不悖的。奇怪的是，像上述的情况，除了在某些纪实文学作品有所反映以外，大陆新闻传播媒介中很少正式报道，至少是我很少见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尽管我每天也浏览几份报纸。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记者也该关心一下各类企业包括三资企业中职工的生存境况吧？难道诸如三资企业损害职工利益的事，有什么违碍之处？境外的人可说，境内的人免开尊口吗？

台湾《工商时报》不知什么背景，但显然不是工会的报纸，竟在维护大陆三资企业中员工合法利益方面走在前面，仅这一点就该引起我们深思。

1993年2月16日



吃 货

吃

货

在大多数人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的年月，有些吃油了嘴的角色是被路人侧目的。有人引用普希金的打油诗：“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就吃光，吃光就飞走。”知道飞蝗成灾是怎么回事的人，也就看得出讥嘲之中含着怎样的厌憎：铺天盖地的蝗虫一过，庄稼枕藉，比下雹子还惨得多。蝗虫是吃光就飞走的，吃光不飞走的该有多可怕！

随着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的解决，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除非直接从人们口边夺食，极有耐性的中国老百姓也在无可奈何中采取宽容的态度：“只要能办点实事，吃出花样来也不管！”不是不管，是以好吃好喝相待，以求办点实事也。

可见在中国纳税人的心目中，他们养着的人大概有四种：又吃又办事的，不吃又不办事的，不吃而办事的，光吃不办事的。

不吃而办事的，自然办的是于社会有利的事，不吃则指不多占，按规矩“四菜一汤”之类，就是廉政模范了。

不吃又不办事的，多属已经退出舞台，或者所谓靠边站的，不一定不想办事，也不一定不想吃，存而不论。

又吃又办事的，据说吃是为了办事，有些事



要吃着办，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吃或陪吃就是办事，中国大多数人未必全是平均主义者，只要你以办事为主，所办堪称好事，也并不主张掀桌闹席。

至于光吃不办事的，用一个朴素的称谓，就叫“吃货”。文雅一点的有古语，曰“尸位素餐”，占着位子白吃饭，或占着茅坑不拉屎，此之谓也。

发达国家的罢工怠工，往往是因饭碗大小、饭食好坏而起；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多半是失掉饭碗的人愈来愈多闹起来的。革命和吃饭的关系密切如此。革命农民对地主说：“没有泥腿，谁养你油嘴！”革命工人对资本家喊：“不劳动者不得食！”有些子承父业的企业主不善经营以至破产，人称败家子；白手起家懂得经营的，也难免角逐失利，熄火关门，只得跳楼，所在多有。可在有的地方，办企业搞经济可以连年亏损，心安理得，享受补贴，如无底洞。一方面不断地掏国库里的民脂民膏，一方面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危及职工的饭碗。但据说这样的企业也有苦衷。例如上司“现管”的某厂长，新官上任，桑塔那要换奥迪，摊派不到中外合资的厂家，只能向所属企业摊派。这样的企业名为国有，原来是“国家”用国库供养着大大小小的“吃货”！

然而吃货又不独出在经济领域，其他部门不是也多少有一些“光吃不办事”，进而干扰别人干正经事，例如过去所谓“吃运动饭”的人么？

那好象又非“吃货”二字所能概括。吃货主要是无能，办不成实事，办不成好事，因而造成人民、社会、国家的损失甚至很大的损失，属于渎职；限“有心为恶”，从各方面干扰、冲击、破坏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以至文化事业的人有所不同。

我们还不能说没有办好事就等于干坏事；所谓“无功即有过”未免苛求，实际上行不通，反而把“有过”的人掩护了。

真正“有过”的是在上述四种人（包括“吃货”）之外的第五种人：吃饱了，吃好了，吃出花样来，还要把坏事干出花样来的人，社会进步的罪人，历史发展的罪人。

1993年3月6日

吃

货



预 言

中国不作兴预言。30年代东方杂志办征文，只是让人说梦，不算预言。也是30年代，何其芳写了一首诗名《预言》，比说梦还朦胧，是“画梦”。1949年以后，大家的建立一个新中国之梦实现了，说梦有点不合时宜。“一切交给党安排”，个人也无须预想什么，预言什么，直到1958年“安排”大家做种种“畅想”，并且预言共产主义即将来到，计日成功，已经不算预言了。

这些事已过去，我们都是愿意“向前看”的。不过“向前看”而前景模糊或者蓝图举棋不定的时候，有些人就去看《推背图》了——看《推背图》不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预见未来，只是也怕越看越朦胧罢了。

我还是相信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的几句话：“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许多发展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大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原则。从全人类的远期目标看，将会实现“英特纳雄耐尔”或称世界大同；中国在五十年至一百年内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大大改观——这样的预言谁不相信？而这种宏观的预言是由高瞻远瞩指点历史潮流的人来做，并尽可



能做得具体一点的。

轮到我们普通百姓，所见者小，只能在小范围就一些具体事态寻找有限度的预言。

我试图这么做过。1988年我在《半月谈·内部版》上发表过《一个悄悄的预言》，预言天安门广场不出多久将不再张挂斯大林像。这个预言在次年成为实事。因此当时虽刊于“内部版”，目下已可自然“解密”。

1988年我还在《中国建设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旧城·名胜·公园》的短文，做过另一个公开的预言。

话要从1978年说起。“文革”开始后，北京的北海公园向公众关闭，成为江青骑马，王洪文钓鱼的“御花园”。1978年3月1日重新开放，北京市民欢天喜地联袂来游，我还为此写诗纪其胜，有云：

此刻，无须到大会堂议事，
又一次民意测验在这里重开。
谁把春天的欢乐还给人民，
谁才能够受人民的拥戴！

彻底的民主派的朋友会轻而易举地指出我思想的局限。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把人民原来所有和应有的交给人民，在人民心目中就算你做了好事了。

“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秋波”，碑在中南海；中南海和北海的水域相连，过去统称“太液池”，至今是北京城区的园林之最。中南海的瀛台及毛泽东部分故居实行“内部开放”，不应该只是



有关管理部门创收以解决职工福利的门径；想想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重新开放曾经产生过多么好的政治心理效应。我相信，有关方面会考虑创造条件，尽早使中南海重新开放为公园的。这不仅是城市建设合理布局的需要，也是领导机关密切联系群众、从社会心理上消除封建影响的需要。

辛亥革命以后，“逊清”皇室仍居故宫，溥仪每每听到中南海里袁世凯吃饭的时候伴宴的乐声传来，这在《我的前半生》中有所记述。北伐成功后，社稷坛改称中山公园，中南海也一直开放。到了抗战胜利后，先有蒋介石行辕（主任为李宗仁）设在中南海，后有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挂出牌来，此时新华门才成为人民止步的地方。

中南海沿革如此，将来重新开放，任人游览，这不是“顺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事情么？自然，实际操作尚需假以时日。虽然机关精简势在必行，但迁出中南海则要从国库拨巨款另建办公大楼。在综合国力远不强大的今天，我想人民群众宁愿牺牲游览名园的权利于一时，也不愿看到兴建毫无经济效益的楼堂馆所的糜费。

以上云云，是读到原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对记者说“第三代领导人若连中南海也出不来，后果不堪设想”，偶然提起的话头。他说的是“走出去，请进来”的那个“出来”，并不增加经济开支的。我说的是迁出机关，恢复公园，暂时只能是“预言”了。

1993年3月24日



债 与 法

债
与
法

新闻对照故事，新旧时代真是大大不同。

在四十年代以前，欠债难还的穷人，年根底就要出门躲债，不敢回家，不敢露面。“年关年关”，很不好过。

在1993年初的春节，一个初欠债不还几于拖垮的小企业的职工，踏破铁鞋无觅处，却在中央台一个电视晚会上找到了逃债的人，正在荧屏上抢镜头，竟已摇身成为某合营公司的总经理，正在年关前大摇大摆呢。

这不是欧·亨利的小说，结局并非完全意想不到，也可以说于平淡中见新奇；感谢有关部门找到了这位总经理，令他还了债，还付了利息。

然而没有说到追究这个忽然长时期失踪的欠债者什么法律责任。如果他不是心血来潮、财大气粗、忘乎所以地去亮相，债权人还是找不到他，受害的企业和砸了饭碗的职工不是干吃哑吧亏吗？

也许是报社记者漏报了对这个逃债者依法处理的结局，但愿如此，则我们还多少有点在经济领域开始建立并健全法制的样子。

倘若并不是记者漏报，事实上就是这样了结了一笔巨款逃债的案件，那末漏洞怕就在立法或



执法方面了。

欠债要还，拖欠要付利息，而像上述的逃债者，如果没有使用别的手段至少也是钻了立法或执法的空子。

改革开放，生产建设，经济往来，纷纭万端，全都这么溜之乎也，易地为安，不找到头上就赖帐不还，还谈什么经济秩序、法治社会？

况且远远不限于经济领域。就以执法部门来说，如果欠债也是要还的。执法部门不是可以“负债经营”的企业，欠债云云从何说起？那就是指的执法不严以至执法不公，偏离了事实的根据和法律的准绳，罚不当罪或罪不当罚，有损法律的尊严，也有负人民的信任。

最大的欠债，也许就是辜负人民的信任了。我这样想，你呢？

1993年3月25日



说 依 附

说
依
附

广东出版的《作品》一九九三年第四期，刊出戴厚英为韩国读者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文学是我生命的呐喊》，有一段话我以为写得很透辟：

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被当作纤细的“毛”，不依附在一张皮上就不能生存，所以终日戚戚惶惶，唯恐被人从“皮”上剥掉或甩了出去。是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谓也。但是现在，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毛，他们和工农一样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阶层，不但有毛有皮，而且有血有肉有灵魂。无须到处飘飞，寻找依附。他们不愿意也不会再一次失去自己。他们将和全中国人民一起，把古老的中国推向现代世界。

我相信戴厚英在这篇文章前面对自己的解剖，这里不说了；在以上引文中她对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依附心理的期许和信心，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以为比我曾写过的有关“皮毛论”的一则随笔立论深刻。

她点出了“依附”二字。人身依附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人际关系，臣之于君，士大夫之于朝廷，都不过是奴之于主的最



原始的人身依附的变相或扩大而已。其间，还存在着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衙门里上峰和部下之间，乃至土匪中头目和喽罗之间，莫不如此，至今流传口头的所谓“卖身投靠”、“改换门庭”，像是描述黑社会里的用语，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官场和貌似清高的士林全都通用的。

说知识分子属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里的“毛”，这种皮毛论，要害是从根本上、整体上摧毁当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人格意识，使他们丧失对于自我价值的自觉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代之以“驯服工具论”，积极的成为把灵魂拱手交出的浮士德（？），消极的成为“端人碗，服人管”的苟活的庸人。辅之以计划经济基础上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力，直到对就业、户口、婚姻等涉及个人生活处境的全能控制，就完成了真正把人变成“毛”的过程——但这“毛”真的是附着在工人阶级或者降格以求是农民阶级的“皮”上了吗？没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称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的每一个作为个体的工人和农民，早已也都变作跟知识分子一样的“毛”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果一定要比喻的话，我愿意把中国公民，无论为工、为农、为兵、为学、为商，比喻作中国大地上、同时也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上的万木葱茏、千花百草，各各只“依附”于阳光、雨露、空气、泥土，而大树不抢小草的阳光，藤科不伤乔木的茁长，绿水青山，氤氲一气。不过，草木没有行动的自由，这是用来比喻人类社会尚嫌不足的。

以上所说，也许会被讥为理想主义了——现在



理想主义成了一个贬词。但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恰恰是一个人——不止限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精神支柱，否则只能以“依附”什么为自己的实际志愿了，实惠也许实惠矣，不是连不成其为理想的“空想”还不如吗？叫做什么好呢？

1993年4月27日

说
依
附



巩俐猜想

在北京地铁车上，一个卖报的吆喝着穿行：“巩俐出事儿了！巩俐出事儿了！”

考之北京话，“出事儿”之“事儿”，都不是好“事儿”。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丑闻，卷入了什么纠纷。一满车的人都并不动容，只有我身边和斜对面的两位三十岁左右人各买了一张不熟悉的《信息日报月中版》“明星大世界”。

我扫了一眼，这张对开大报第一版，右侧是很大一幅巩俐头像，面带愁容，左侧大字标题是：“巩俐好景不长”。

我心想：原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世事莫不如此。多少喧赫一时的所谓大人物，他们的“好景”又有多“长”，你算过吗？唐明皇的开元盛世，该算他的好景了，他坐皇位长达四十四年，安史之乱起，马嵬兵变，肃宗取而代之；蜀山蜀水，夜雨闻铃，西宫南内，落叶满阶，也会自叹“好景不长”吧？

历史上任何经历“好景”的人，都难免“好景不长”之叹。区别只在败于别人抑或自己之手。

巩俐在国内外接连获奖，为观众和专家所关注。她在荣誉上，而首先是在表演艺术的影响上



已经登上一个令同行艳羡的高度。以她的势头和潜力，还不到自叹“好景不长”的时候。看来她也不是耽于一时“好景”不再向往新的高度的人。

然则，是别人在说巩俐“好景不长”，借什么山头立论，不知道。是恳切的劝诫？是贬抑的婉言？没有看那张报纸，不得其详。

我的猜想，早已从巩俐身上转到卖报人和车上的各位乘客了。

“巩俐出事儿了！巩俐出事儿了！”声调是冷漠的，表情是木然的，看来他关心的只是把报纸推销出去的小小赚头。他没有切身利益的理由嫉恨巩俐，诅咒巩俐。他不无出入地把“好景不长”翻译成“出事儿了”，究竟是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幸灾乐祸，还是更多地属于他要投合他所推断的人们往往不约而同地具有的幸福心理？

设想如果不是由卖报人，而由这篇专文的作者或责任编辑来吆喝，一定会更投入，更能打动人们，以售其报，而不致落个“哗众”而不“取宠”的效果。

听到“巩俐出事儿了”的“哗众”之呼，但满车厢没有第三个人买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巩俐是谁？——可能有不知道的，但多数人不知道则不可能。

不知道巩俐是谁，但对“出事儿了”也安之若素？——人们经历的“事儿”太多了，不在乎了，要末就是“出事儿”云云太笼统，不够刺激。

知道巩俐是谁，但对“出事儿”仍然漠不关心？——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据



巩俐说过的她最崇拜的人毛泽东指出的“自由主义”的第三种表现。这真是名人或新闻人物的悲哀。

也许并不是漠不关心，只是对于一些篇幅虽不小的小报惯于故意耸人听闻的手段表示轻蔑，充耳不闻？——如同对一些假大空的不新的“新闻”一样，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中国的读者真的走向成熟了。

猜想着，猜想着，到站下车，走出地铁，朗朗乾坤，好像谁也没什么“事儿”。

1993年4月29日



希特勒焚书六十周年

1933年5月10日接近午夜的时候，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广场上火光冲天，大约两万册具有世界声誉的德国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付之一炬。

曾经沧海的今日读者，也许以为两万册书微不足道。把别座城市同样景象里烧的书加上，就不止两万册了。

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引用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焚书现场说的话：“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次焚书发生在希特勒当总理后约四个半月，它是一个象征，一个信号。

1933年2月27日发生了国会纵火案，第二天希特勒就利用此事，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规定为了预防“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可以“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等等。所谓“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是指希特勒捏造的共产党威



助，其实真也冤枉了共产党；当时德共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曾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主要政敌，形成对纳粹党的实际支持。

1933年3月23日，德国议会通过所谓授权法——《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拱手把立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这项法律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可以不同于宪法”。从这一天起，希特勒成为全国“合法的”大独裁者。

接着，在纳粹的大事记上，就是以焚书为标志的文化纳粹化，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德国文化纳入纳粹的控制之下，不得越雷池一步。1933年3月22日，设立由戈培尔掌管的统一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设美术、音乐、戏剧、文学、新闻、广播、电影七个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协会，服从管理。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开除出会或拒绝入会的人，生计也就被剥夺了。“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谁是“国家”呢？当然首先是希特勒、戈培尔，然后是他们的“文化”爪牙们。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戈培尔掌管的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是个名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曾公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原来是一批仇视文化的“文化”官员。

每天早晨，柏林各报编辑和地方报纸记者齐集宣传部，由戈培尔或他的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



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在1934年内有一个时期，戈培尔和阿曼（纳粹的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都要求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埃姆·韦尔克把这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干巴巴。他的《格鲁恩邮报》立即被勒令停刊三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了。

戈培尔亲自主持的焚书大典是得到过狂热的学生们的合作的。德国从小学到大学，很快就纳粹化了。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被奉为“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所有教师都得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

在科学方面，有个亚琛技术学院的威廉·缪勒教授在《犹太人和科学》文中把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当作“头号恶棍”。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皮勃贝克教授，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莱纳德教授则说“这个犹太人”的“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于是他们大搞其“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了。

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军队支持希特勒把总理、总统、三军统帅集于一身，第三帝国进入全盛时期。这时德国经济复苏，失业减少，在一次公民投票中有90%的人表示接受这个恐怖的独裁政权。

希特勒从1933年焚书到1945年焚尸——据《简明布列颠百科全书》，希特勒和情妇自杀前



“两人遗嘱死后均火焚”——不过十二年。从1945年至今，又是四个十二年过去了。虽于历史的长河只是一瞬，我们毕竟经历了很多，相隔六十年的时间和千万里的空间，回首希特勒焚书的前前后后，多少看得会清楚些。希特勒者，固一世之枭雄也，而今安在哉！

1993年5月3日

曹操·能臣·奸雄

曹操·能臣·奸雄

有人说，曹操这个人，不为治世之能臣，便为乱世之奸雄。

这是说曹操才高于众，至于为能臣，为奸雄，全看机遇，赶上什么时候。

“能臣”流芳百世，“奸雄”遗臭万年。后来桓温说，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是他自述其志。曹操可从没这么说，他是自命忠良的，尽管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毕生不沾篡弑的边。

但后人仍以奸雄目之，可见奸雄不一定非当王莽不可。总之，以“宁使我负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负我”之心，用种种权术手段，包括下求贤令，软硬兼施，剪除异己，夺取当时条件下可能有的最大权力。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奸雄曹操。其实，乱世的奸雄这样做，治世的能臣也未必不这样做。

能臣亦奸，奸雄多能，这怕才符合实际。不过在治世，社会政治秩序稳定，能臣往往是循序渐进，逐级擢升，身登高位也要受“祖宗家法”的制约，各方势力的掣肘，调和鼎鼐靠一定的政治智慧，少用非程序化的非常办法。乱世则不然，大半是王朝式微，面临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这时候从草莽中以至高堂上，按捺不住蹦出一些人物



来，打打拉拉，分分合合，史称群雄并起，只有其中的奸雄能站住脚跟，扩大地盘，直到窥伺神器了。

虽然能臣和奸雄并提，可像曹操这样兼聚于一身的全才也是几百年才见一个的吧。因为可为治世之能臣的才，生逢乱世，会成为奸雄；而可为乱世之奸雄的才，生逢治世，成不成得了能臣，就是个问题了。

能臣和奸雄，分别在治世和乱世活动，其第一个目标都是越大越好多多益善的权力，不管他们权力欲望的基础或谋取权力的内驱力多么不同。如能臣以为有了天子授权，方能治平天下，造福一方；奸雄以为权柄在手，方能号令天下，自作威福。权力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系，这一点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治世之所谓治，多少要重在建设，无论一仍旧制，或略倡新变，能臣在建设方面有所表现，才能有别于无能之臣。乱世的特色是破坏，乱世之奸雄，越能破坏越见出色。

所以治世之能臣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乱世之奸雄，而乱世之奸雄，若是只会破坏不懂建设的那一类，到了治世，仍可以为奸，却难称雄。即使收敛了，不想登九五之尊，而俯首称臣吧，也终究是无能之臣罢了。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建设总比破坏好，治世之能臣也比乱世之奸雄要高他一筹两筹。治世之能臣，想要致君尧舜之上，登斯民于衽席，宏图远志，哪怕实现不了几成，人们还是称赞其雄心；乱世之奸雄，失败的不必说了，即使成功，他的“雄心”也只能被称为野心。



至于曹操，虽于乱中取利，也还志在整合，这里面有雄心亦有野心，是个复杂人物。光作道德评价不顾其历史功绩是片面的，借口历史评价而无视其人在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面貌，也有失于偏颇。这些留给历史家去评判吧。好在他还留下一些诗歌，不乏真性情，千古以下，依然可读，他的胸襟又不是“能臣”“奸雄”所能范围。曹操其人，是一般的治世之能臣与一般的乱世之奸雄都很难相提并论的。

1993年5月17日



当局者，还是旁观者？

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有时候，几乎很难断定我们是当局者还是旁观者。

例如有些地方，拖欠教师工资达七个月。我们不是被拖欠工资的教师，也不是应该对拖欠教师工资负直接责任的人，不算“当局者”，对这件不该发生的事情的是与非，看得清清楚楚，要算“旁观者清”了。

“当局者”就一定都“迷”吗？被拖欠了工资的教师，不止一校两校、一地两地——不光是有名的朱德故乡四川仪陇，据报道涉及许多省份——，柴米油盐酱醋，一天不可缺，一分钱不能赊帐，拖欠一个月工资，就要挖微薄的积蓄支应三十天，三个月、五个月、七个月地挖下去，还有得挖么？这些切身利益被损害的“当局者”想“迷”也“迷”不起。而那些损害了广大教师利益的“当局者”真“迷”么？他们挪用教师工资以牟教育经费去干别的大事，例如小汽车换代、炒股票炒房地产等等，却是清清楚楚的，决不迷糊的。

这样的事情受到舆论批评以后，某些有关县市的上级主管部门纷纷表示惊异，好像不但毫不知情，而且从未听说，简直认为难以想象。看来这些主管都是“旁观者”了，可以侧身于“旁观



者清”了，但他们职责所在，不是不折不扣的“当局者”么？

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胸怀放宽一点，从教育关系到民族的命脉、民族的未来着眼，即使我们的近亲中没有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即使我们近亲的青少年所在的学校没有拖欠教师的工资，我们也该发现，我们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当局者”了，——不过我们没有落进“当局者迷”的窠臼罢了。

当局者有各种各样的，正如旁观者有各种各样。

执法难。我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写下这三个字。就以湖北黄石市下陆区去年7月28日发生的一起事件为例，由于下陆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原告人郭某起诉黄石市大冶县公安局罗桥派出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及扣押财产的行政诉讼案，第一次开庭被告没有出庭，第二次开庭时，大冶县公安局副局长、县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罗桥派出所所长等，与40余名便装警察到庭叫骂，大闹公堂，动手打人以至持刀伤人。与法院为邻的下陆区检察院检察长赶来制止，也被踢了一脚。整个事件中，共有12人受伤，其中法院干警6人，检察干警3人，无辜群众3人。

此事我是从报上看到的。今年2月15日《今晚报》摘录了《人民司法》披露的事件经过，谓事件发生后黄石市政法委组织了联合调查小组，两个月后仍无处理结果，“该案（按：想是指原来的那起行政诉讼案）审理工作也被迫停止”。现在



又过去半年多了，不知下文怎样，是不了了之呢，还是有了个是非曲直的“说法”。

我们仅凭报纸文摘，又未参与调查，只能得其大概，是不折不扣的“旁观者”。但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公安干警围攻法院”这一基本情节，法院干警、检察干警和无辜群众受伤的基本事实，已经足够说明问题。那些由大冶县公安局副局长和公安办公室副主任率领的便装警察40余名，冲上楼的对区法院院长副院长实行拳击，对一位合议庭成员刀伤头面部，并致胸腹部大面积挫伤；没冲上楼的则用砖头砸法院门窗；这不是一伙有组织有领导的暴徒吗？人们习惯于称公检法为一家，“自家人”尚且如此，他们对待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能够是文明执法的模范吗？

那位区检察院的检察长没有以“旁观者”自居，隔岸观火，而冒着被踢打的危险到场制止，使事态渐趋平息。这是使我们在报道中“楼上楼下一片混乱”里差堪告慰的。“月末圆桌”，无不可谈。时值“六·一”前夕，本想呼吁一下重视教育，首先要尊重教师，至少不要拖欠扣发教师工资吧；谁知说普说着又说到公检法，说到了法制问题。本报读者多“此中人”，恕我班门弄斧了。

1993年5月21日



迟于死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树森，1992年11月10日下午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当夜发病，4个月又12天以后逝世。他刚刚过了35周岁。

我和余树森并没有深交，但我读过他关于当代散文的评论，读过他编选的不止一部散文选本，知道他是个认认真真、敬业乐业的老实人。

事后我听说，他生病以前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是系里教学、科研的骨干之一。今年或明年原要安排出国讲学，然而来不及了。

他编的书，有的还没出版，他的著作，许多还没完成，然而来不及了。

他一家本该早就从简易的宿舍搬进较宽敞的“高知”楼，但据说他的年龄不够，等到排上队，三榜定案，8月份可以乔迁，然而来不及了（家属迁入新楼的资格也自然取消）。

早就说要等到下半年“工资到位”，然而来不及了，直到最后他每月基本工资是288元，他死后家属按规定拿到他十个月的基本工资2880元。

教授、研究员这类高级知识分子保健医疗的落实，从来要比行政系列迟缓和麻烦，余树森大出血以后才赶办这方面手续，昏迷前不久才领到证件，医疗条件略有改善，对垂危的病人和家属



总算是个聊胜于无的安慰吧。

然而，死神过早地叩门。一切都迟于死亡。

这是余树森的命运。也是许多在未老之年遽然去世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真的有这样一种所谓命运吗？真的有在冥冥中主宰人的生死的定数吗？为什么命运要如此苛待如余树森这样勤勤恳恳的园丁？难道同样的命运还将陆续重复在那些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人们身上？

如果痛呼天道不公，苍天会不会感到冤枉？

40年前有一首有名的歌，叫“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今天的我们，余树森的朋友和同辈，怕是要和死亡赛跑，来争取时间了。

余树森同志，记得你那年在岱顶，不顾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登上望海的巨石，你病弱之躯有多么顽强的意志。你操劳一辈子，受累一辈子，今天你可以安息了，留下世界让我们跋涉和攀登，让我们和死神赛跑吧。

1993年6月6日



黄河旧事

黄
河
旧
事

有时候由长江想到黄河，由三峡工程想到三门峡。50年代三门峡还在勘探地质情况的时候我去过，住在工棚里，写过不止一首诗。后来自己连人带诗都在一次风暴中沉没水底了，只风闻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却不知道这个失误的结局。早在50年代我还在天真热情地讴歌时就已注定不可避免了。

《绿叶》今年第2期上林风的一篇报告文学，重点记述了水利学家张光斗、黄万里、钱宁、温元璋等因三门峡工程而遭到的坎坷际遇。

以张光斗为例，他先是反对苏联专家在潼关建坝发电的方案：当时在潼关没人反对，如果张光斗不反对，也不会有人指责他。但那样一来，整个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将被淹掉。中国固然需要电，也不能以一个西瓜去换一个芝麻。再说潼关的土质根本不宜修坝，张光斗问苏联专家伯克夫（他是临来中国时破格提升的副教授、工程师）：“你知道潼关的土质吗？”伯克夫傲慢地反问：“这跟在潼关修坝有关系吗？”“当然有。大坝的安全关系到黄河中下游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你敢教训我——”“我是问你——”“我请你来问的吗？”张光斗哑然，他的人格受到了伤害，



但他最后坚定地说：“你是没有请我。我也不需要你请我，我们的部长请我干。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问？”“好，你问，你来干好了。”伯克夫暴跳如雷。张光斗闹恼了，跟苏联专家争吵耶还了得？

幸亏水利部长傅作义保护了张光斗。张光斗以科学论证推翻了伯克夫在潼关修坝的方案。

但是，第二次大争论的结局却不同了。

伯克夫设计的三门峡水库，单靠蓄洪而不排沙。张光斗不能眼看着这样后患无穷的设计付诸实施：“……这怎么成？这样要出大事的。”“这工程是你负责，还是我负责？”“当然，当然，是你负责。”“我负责，你就不要嘀嘀咕咕的。……我没请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好了。”“你没请我，是我们水利部请我来的。”

这时候，水利部的青年水利专家温元璋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陈述苏联专家的设计方案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几天以后，周恩来飞到三门峡，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时为1959年。结果水利电力部的领导、地方党政领导都是一边倒，紧紧地站在苏联专家周围。站在温元璋一边的只有五个人。

报告文学写道：

“周恩来只能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是原则。周恩来只能做到这里了。他是人，不可能什么都精通。”

“傅作义爱莫能助。他仅仅是一个部长，只一票的权利。”

“一场耗费民膏国财的错误行动开始动工。他



们无法阻止这行动。他们只有这几个人。他们是少数派。”

“周恩来走了。”

“张光斗满怀悲愤泪流涟涟回到了讲台。他能教学生知识，却无法教会学生阻止当时乃至以后可能发生的错误行动。”

“温元璋无处走，他得留下来接受批判，直到1978年平反昭雪。”

“三门峡水库修成两年后，上游河床抬高，西安、临潼危在旦夕。最后，炸开了坝底的导流洞。”

1960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两河壅高横向冲击，两岸农田淹没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搬迁。从那时起，黄河水位高出潼关两米，高出西安一米余——直到今天！

这就是为一项错误决策付出的代价。

当时那位苏联专家的方案为什么会得到多数参与论证的人的赞同呢？那些担任党政领导的与会者是随大流地投了票，还是深思熟虑地作出选择？选择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其余那些并非外行的水利专家在表态支持苏联专家的方案时是怎么想的？他们是由于业务水平所限而盲从，还是出于别的考虑？

论证只是一种形式，并非任何情况下的论证都是与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必然相联的吧，我想。听说拍摄关于黄河的大型系列电视片，不知对母亲黄河的这一创痛是怎样叙述的。



1993年7月4日

女沙皇和大学者

——夜 读 抄

《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法国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著，冯志军译，张志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1729—1796），特别指出“他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朋友，并且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通信”。

我没有读过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传记，这本《风流女皇……》告诉我，他们跟女皇的交谊。“勤政之余，叶卡特琳娜以同外国名流交往作为一种消遣。她很快懂得，如果她想使自己的声望超越俄罗斯国界，就必须在欧洲文坛中寻找一些宣传者。”

她是 1762 年 7 月一次政变中取代她的丈夫沙皇彼得三世的。她在文告中宣布她登基后第七天获悉彼得三世“痔疮宿疾发作，并苦于腹绞痛，抢救无效而死”。政变后第九天她就邀请狄德罗到圣彼得堡来继续印刷他的《百科全书》，狄德罗谢绝了，托词说在法国政府下达禁令后，第八卷以下的《百科全书》可望在瑞士的纳沙特尔出版。“实际上，他根本不想把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托付给



一个刚以相当可疑方式登基不久的任性的女皇。”那时，狄德罗还是相当清醒的。达兰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也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情况类似。叶卡特琳娜曾经答应给他两万卢布的薪俸、一座皇宫和大使头衔，让他继续编辑《百科全书》，并且给女皇的儿子保罗大公（后来的沙皇保罗一世）讲授科学、文学和哲学。达兰贝尔也婉言谢绝了。他在致伏尔泰的信里说：“我的痔疮经常发作，在那个国家（俄罗斯）里，这可是一种重病，我宁肯屁股有病痛，但安全有保障。”显然他牢牢记住前沙皇死于“痔疮”的教训，对叶卡特琳娜敬而远之。

这两个法国人有礼貌的拒绝伤害了叶卡特琳娜。幸好不久以后，居住在瑞士边城费尔尼的伏尔泰，托人送来一首献诗，医治了她的创伤。伏尔泰在刚刚出版的《俄国史》前两卷里，颂扬了彼得大帝的人才。据说他非常关注叶卡特琳娜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演出；他的献诗如下：

呵！上帝！还给我吧，/您何必夺我视听，/因为我也即刻同行！/呵！叶卡特琳娜！/能目睹您的丰功盛烈，/聆听您的谆谆教诲者，/他才是三生有幸！

受人爱戴，又为人君上，/唯您能擅此雄才！/尤其是前一个特点，/要使我衷心崇拜！/您的睿智，/使圣贤也惊诧感慨，/圣贤得识您后，/也把下风拜！

这位老哲学家是叶卡特琳娜“思想上的老



师”，也是圣贤一流了。三十四岁的女沙皇立即提笔给年长一倍的、六十九岁的颂扬者覆信：“郑重请求您今后不要在我还不值得颂扬时就颂扬我……因为这同时关系到我们两个人的声誉。”接着她倾诉了自己对老人的敬仰：“自从1746年我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以来，您的著作是我最好的师友。在那以前，我读的只是小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您的著作。从那以后，我不断地读您的著作，再不想看别人的了。”

从写于1763年秋天的这封信起，他们之间的通讯持续了十五年，直到1778年伏尔泰逝世为止。叶卡特琳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伏尔泰是她找到的一位理想的歌功颂德者。几个月之后，她竟成了他眼中“无与伦比的人”，“北方上空一颗最璀璨的星”、他“心中理想的君主”。他用一些夸饰的语句来恭维她一些并不高明的决策。他甚至说她的诗和散文是“后无来者的佳作”。他说，他生为叶卡特琳娜的人，死为叶卡特琳娜的鬼，他找到了“崇拜和敬慕”的偶像。叶卡特琳娜依靠他，在欧洲的心脏开办了一家广告社，那个广告社的某些宣传口号在沙龙之间到处流传。

“她真心实意地想使自己配得上他的颂词。”传记作者写道，“按照自由主义的思想，用严厉手段来治理国家。这行得通吗？”

狄德罗在1772年三十卷本的《百科全书》坚持二十一年终于出齐的时候，已经不名一文，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叶卡特琳娜赐给他一份终身年金。狄德罗这一年六十岁了，他决定到遥远的俄罗斯去面



谢，并且讨论撰写一部卷帙浩繁的新的百科全书的资助问题。带病颠簸，行程半年，1773年秋冬之际，他来到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女皇在友好和敬重的气氛中盛情接待他。他立刻被女皇的纯朴征服了。

叶卡特琳娜每天在工作室接待他，同他讨论“片刻”。这“片刻”常常要持续到晚餐时候。难得的是谈话时的平等。狄德罗不拘行迹的指手划脚，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女皇多半只是微笑着倾听；有时争论起来，他一把撕下自己的假发，扔到墙角去，女皇去拣起来递给他，宽容地一笑，他大声说“谢谢”，把假发随手塞进口袋，就又慷慨激昂地讲下去。最初，狄德罗喜欢陈述有关如何教育皇太子保罗大公的见解。如果仅限于此，叶卡特琳娜也许会非常高兴。但是他还想进而在牧民良策上开导女皇，向她传播自由主义哲学，竟向女皇陛下提出了八十八个问题，包括：每个州提供多少沥青、成立兽医学校、帝国内有多少犹太人、“主人和农奴”的关系，等等。叶卡特琳娜被激怒了，她回答说，在俄国没有“农奴”，只有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他们在受到一些人身的束缚，但精神是独立的。——其实，她早年在即位之前有过解放农奴的念头，但即位后她立刻意识到她的政权依靠农奴主的支持，农奴主失去农奴就会兴风作浪，她也就见风转舵了。——狄德罗引经据典地反驳她，以希腊和罗马为例，劝她在为时未晚之际改革制度，狄德罗承认有一些“好的专制君主”，但是，“如果连续有两三位好专制君主，



人民最后就会忘记反抗和言论自由的价值。”女皇听过耸了耸肩，她说：“狄德罗先生，我非常高兴地聆听了体现您伟大思想的高见；不过，您谈的这些大道理——我都非常理解，可以写一些好书，用来实践，却会把事情搞坏。在您的改良计划中，总忘掉了我们两人地位的差别：您只是在纸上工作，纸是逆来顺受、千篇一律、柔软灵活的，既不妨碍您的思路，也不抗拒您的笔锋。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要在一个怕痒怕疼、爱发火的人身上工作。”她委婉地批评了狄德罗对俄罗斯缺乏起码的现实感。她能够容忍亲爱的哲学家的空想、空谈、书呆子气，但一涉及她的实际施政就话不投机了。有一次，狄德罗在她面前大谈如何厌恶那些阿谀逢迎的廷臣，说这帮人该受地狱里最重的刑罚，这时候，女皇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打断了他的话：“你愿意向我谈谈在巴黎，人们怎样议论我丈夫的死因吗？”狄德罗哑口无言，想转换话题，但女皇又打断了他的话说：“我觉得您现在已经启程，如果不是去地狱，至少也是去炼狱。”

狄德罗本来想到这片荒地上来播良种，但他渐渐地察觉到，女皇并不想实行他对她讲的那些美好的理论。尽管如此，他仍然把向她提出的建议整理成一本书，题为《哲学和历史杂谈录》。女皇激动地收下这本书，放进一个匣子里，以便彻底忘却。严冬将尽，狄德罗又失望又高兴，想到不如归去，没有人挽留他。至于出版新的百科全书，叶卡特琳娜并没有明确承担任何义务。1774年3月，狄德罗在凄凉的气氛中同叶卡特琳娜告别了。



狄德罗作为女皇的客人旅居圣彼得堡，前后只有五个月。而有关狄德罗在涅瓦河畔长期逗留的一些传说和轶事却使伏尔泰焦灼不安。他冷眼注视着别人同他在女皇心目中争宠，甚至嫉妒得病倒了。那时候弗洛依德还没有诞生，无从问他性心理分析是否足以解释老伏尔泰的种种表现。由于几个月没收到叶卡特琳娜的来信，他在1774年8月9日给她写了一封信：

“夫人，在您的宫廷里，我肯定已经失宠了。女皇陛下把我抛在一边，转而喜欢狄德罗，或者格林，或者别的一个得宠者。您一点也不尊重我的高龄。如果陛下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倒也无可深论；但是，一位胜利的女皇和立法者怎么可以朝秦暮楚呢？……我反省能导致您对我冷淡的过错。我清楚地看到，任何热情都会消歇的。如果我不是已到行将就木之年，一想起这件事就会气死。”落款是：“您的崇拜者，被您遗弃的人、您的住在费尔尼的俄国老头。”

先后有几个日夜相伴、事业相倚的情夫，决不期求从伏尔泰得到肌肤之亲的叶卡特琳娜，读了这篇既倚老卖老又如怨如慕的“撒娇”的话，就也用开玩笑的口气写了回信，“先生，活下去吧，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值得闹别扭的……您是一位很老实的俄国人，不会成为叶卡特琳娜的敌人。”

伏尔泰心满意足了，他说，他在放下武器，“重新追随左右”。现在，他向往（自然不要当真）到涅瓦河畔去度余年：“我为什么不能以圣彼



得委一隅为埋骨之地呢？在那里，我可以亲眼目睹您头戴桂冠和橄榄枝出入于您的凯旋门下。”伏尔泰同狄德罗比赛谁唱的赞歌调门更高。伏尔泰想在俄罗斯埋骨，狄德罗则遗憾不能在俄罗斯生活；据说，只有在俄罗斯，而不是在别处，他才能运神思。他写道：“我记得曾对陛下说过：在人们称之为自由的国家里，我的灵魂是奴隶的灵魂；而在人们称之为奴隶的国家里，我倒有了一个自由人的灵魂。这并非我的恭维话，现实确是如此。我一回到敝国，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狄德罗不知道，他歌颂备至的女皇已经把他看成一个冒失鬼、空谈家、江湖骗子。1774年在归途中写了《评女皇陛下就立法问题写给代表的指导书》，这篇情辞恳切的言论使女皇无名火起，历久不忘。直到十年后的1784年狄德罗逝世以后，叶卡特琳娜还在致格林（1723—1807，德裔评论家，狄德罗的密友，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的信中写道：“这些东西（关于《指导书》的评论）真是一堆废话，看不出他对事物的认识，缺乏审慎的考虑，又缺乏远见卓识。如果我的《指导书》真合了狄德罗的口味，就会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1778年5月，伏尔泰与世长辞了。正同年轻的面首们打得火热的已入老境的女皇，听到这个从未谋面的精神上的忘年之交的恶耗，深感悲痛。她在给格林的信上说：“我觉得万念俱灰，对红尘中事不屑一顾，您为什么不以我的名义得到他的遗体？您本应该把他的遗体交给我，唉，真见鬼！……他本



来会有一个非常豪华的墓室……请设法买下他的藏书和现存一切文稿。包括我的书信。我愿意给他的继承人一笔可观的钱，我想，他们不懂得这些遗产的价值。”

她还写道：“自从他过世后，我总感到心头郁结，闷闷不乐。他就是神奇和快乐的化身。而且，他是我的导师，是他，或者说是他的著作，培养了我的才智和思想。”

据传记作者说，伏尔泰的大部分有亲笔批注的藏书，连同乌东雕塑的伏尔泰雕像一起运往俄国。同时，叶卡特琳娜粗暴地反对发表她同死者的往来书信，——一是怕自己的书信文笔俗鄙，二是怕伏尔泰的信对她的谰词过多，会惹得别国君王不满。

二百年后，人们得以了解和议论这一切。这可比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学者胡适见了一次逊清小皇帝溥仪的“质量”高多了。一切给各式“女皇”写过效忠信的人，都会因有大学者像伏尔泰、狄德罗笔下那些忠心耿耿，含情脉脉和肉麻兮兮而缓解自己的羞赧与惶愧。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叶卡特琳娜时无遗憾地指出：“她虽然号称‘启蒙运动的朋友’，但她绝对无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如果有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她还是权倾一世的女沙皇吗？

1993年7月5日



王国藩式的“名誉”

王国藩状告《穷棒子王国》小说作者古鉴兹侵害了他的名誉，古鉴兹则说，王国藩名誉的损坏，是他自己过去的行为早就造成的，与小说《穷棒子王国》的出版无关。

王国藩何许人也？他的“名誉”到底怎么样？

1955年，毛泽东在一则按语里表扬了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云云，于是王国藩成了全国劳动模范，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曾经担任省、地、县领导职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新闻传媒中一边倒地吹捧的典型。“名誉”该是很好的吧。

1980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公开严厉谴责了王国藩任河北遵化县委书记时制造了不少冤案错案，尽管没有点名，客气地称他为“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单是1975年5月到1977年9月的一个冤案中，就被迫自杀死亡2人，判刑4人，开除党籍公职戴坏分子帽子2人，开除党籍公职和给予其他处分的36人。而这大冤案的起因，只不过是王国藩在一次会上宣布自己将晋升地委工作，调离本县，县委机关有人议论说这是全县58万人民的喜事。王国藩认为这是“制造反革命夺



权舆论”，“出反革命了，要抓反革命”，在全县大搞逼供，株连一百四十多人受到人身摧残和折磨。

据报道，王国藩恶行累累，民愤很大，有大量历史资料和中组部、河北省委的调查材料可为证明；只是由于受到当时河北省委书记和唐山地委书记等人的庇护，他才得以免受法律追究，只在文革以后罢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回老家。这样就有了“前县委主要负责人”的称号。

一个“名誉”如此的人，怎么被古鉴兹“侵害了名誉权”呢？

小说《穷棒子王国》并不是王国藩的传记。主人公叫殷大龙，一个名噪一时的合作社社长，他在政治上玩权术整人，在经济上贪污，在生活上玩弄女性，受到揭发，并经核实，但依然故我，扶摇直上，只因他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旗帜。类似的题材，过去有人接触过，如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古鉴兹想必研究了当代一部分“劳模”、“旗帜”、“典型人物”蜕化变质的现象，概括出殷大龙这一艺术形象。

王国藩认为一看到这些“字眼”，“使人一看便知所指何人”的对号入座心理，姑且不论；奇怪的是北京法院在认定小说中的殷大龙“贪污腐化、强奸妇女、是一个蜕变的典型、丑恶的典型”之后，又认定这就是对王国藩“确有侮辱、诽谤的情节，贬低了王国藩的人格，给王国藩造成了不良影响。……侵害了王国藩的名誉权。”

请问：即使不是如古鉴兹的作品这样的小说，



而确有一部书如实记录了真名实姓的王国藩的经历,包括他风光的一面,也包括他阴暗的一面,难道能说后者就是对王国藩“名誉人格造成极大损害”吗?

看来,这里除了人们不能尽知的幕后干预以外,起作用的还有一条行之多年见惯不怪的公式,那就是:有些人做坏事可以网开一面的,而对任何坏人坏事的揭发却是需要加罪的,尤其是如果曾被权威人物如毛泽东肯定过的人。他们干的坏事也须受到保护,至少是眼开眼闭,息事宁人,谁犯了忌讳,就完全可以上纲到例如“这不是一般民事案件,而是一起‘砍旗’的政治案件”了。

但有谁可曾想过,这样做的结果,难免使人猜想:那许多有这样称号那样职务的人士们,在他们没被触动的名誉后面,是否也都象王国藩一样包藏着一堆受到相应保护的“不名誉”的事情?

1993年7月7日



转 让 题 材

果戈里的杰作《死魂灵》或《巡按使（钦差大臣）》，记不清是哪一部了，据说是听诗人普希金讲的一个故事素材，形成了基本构思。普希金写诗也写小说，题材多得写不过来了，就转让给朋友，大约是无偿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件事使我震惊。是个地方小官，为了把下乡插队的孩子弄出来，竟动用专政机关搞了一次假逮捕，然后作为错捕处理，给安排了工作。我心疼那个孩子，如果全不知情，突然镣铐加身不会吓着？如果串通作弊，合作演出，就得一下子坏到成年人的水平，往后还有救吗？

我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情节写进我的一部叙事作品，不成功，材料也糟蹋了，浪费了。

不过，在一个法制亟待健全的社会里，类似的题材，会是层出不穷的。你说这是阴暗面吧，如果有人抵制，有人斗争，或者有作者出面揭发，不也就可能显示出正面力量的光芒么？

即使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如《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也不是仅仅展示案例，而是表彰着秉公断案者的良心和智慧，也寄托了普通社会成员对于正义克服邪恶的理想或幻想。



我曾经劝立志写作的年轻朋友到法院去旁听，去翻阅案卷，我说这也是“体验生活”之一途，因为矛盾发展到刑事犯罪或民事诉讼，总是相当激烈的了，双方的指控和辩护都会充斥着激情，也渗透深思熟虑的心计。我举例来动员，说，托尔斯泰的《复活》虽然不是简单纪实性摹写，但阅读大量案卷必定有助于他构思的成熟和升华。

有一段日子大家常常谈到当代史上的冤假错案。那些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案件，有少量经过“公检法”，大量都是违反法律程序的。后来不但重新有了宪法，又有了刑法和民事诉讼法，大家的话题却除了涉讼的当事人以外，也常常围绕着执法部门和执法者们的表现了。

又有了些随手拾来，可供转让的素材，例如，一位基层执法部门的负责人，夜间“公出”，家里突然失火，“大哥大”呼叫不通，损失惨重。原来这一夜他去视察自己开设的赌场，为免暴露，把“大哥大”关闭了。这在浅层次上可以铺叙成一篇讲报应的小说，在深层次上能够发掘出什么主题的内核呢？

但是，听得多了，常常会跳出写作者的角色，无心再去斟酌哪些可写，如何加工，怎样入文。当你知道极其寻常的公文语言“以罚代法”四个字背后，有着权与钱的肮脏交易，对罪恶的纵容和对法律的褻渎，……甚至会使应生者死、应死者生，你能不感到发指么？

董良嗣是董必武最小的儿子。董必武不仅曾是共和国副主席，而且从建国之日起就长期任国家政



法方面最高领导人。如今董良嗣通过一起官司“看破”了他所置身的法律环境。董良嗣的儿子从政法大学毕业以后，却不愿意到法院上班，他的见闻所及，使他的“律师梦”破灭了。他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的律师在判案中只起一个作用，那就是沟通法官和被告、原告之间的关系。原告或被告把钱交给律师，律师再把钱交给法官，成了生意的中间人！法官得了钱，就可以公然地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哪里还谈得上公平！

以上云云，引自《董良嗣采访记》（《雨花》6月号，作者顾潇），从董良嗣一家的坦诚态度，可以推断他们说的是亲历和真话；当然，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习惯用“部分”、“某些”的限制词，轻易使用全称判断，从这或者可谓之偏颇中，不正也可见他嫉恶如仇的义愤和十分可贵的天真么？

面对着执法者犯法的现实，也许作家们来不及安下心来熔铸高度典型概括的宏篇巨帙，而纷纷急于以纪实之类体裁一吐为快，发出呼吁吧？

向谁发出呼吁才有效？向社会？向国家？

警察、法庭等等和军队一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汇中属于国家机器的范畴。公检法部门中某些人的腐败，对于国家机器来说，恐怕是致命的了。

曾有什么“五四三”机构旅行开会，然后很不“五四三”地满载大包小包赠品和便宜货而归，曾有纪检部门开了介绍信，从车站领回违章扣留的托运货物，这都是腐败现象，但这些机构不如



公检法部门介入社会生活之深，倘不事声张，也还容易掩人耳目，远不如公检法部门的腐败现象之易于激起民愤。

前苏联解体固然有极深远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看情绪激昂的群众第一个推倒的，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门前作为象征的捷尔任斯基雕像，终究是值得深思的。

1993年7月20日



钱与权与法

钱
与
权
与
法

我的朋友叶芝余在《瞭望》周刊的《瞭望论坛》上呼吁“跳出金钱拜物教”，我正在连连称是的时候，两篇报道告诉我，许多刑事犯已经花钱买刑，“跳出”监狱和劳改农场了。

7月23日《南方周末》龙文辉、胡杰采写的《法律，你的权威呢？》一文，报道一个经法院判刑5年6个月的罪犯被洪江市看守所收取5600元“保释金”后释放出狱。罪犯贺学文从1986年到1991年牵头或参与盗墓，先后在湖南、贵州作案4次，盗掘清代古墓3座，民国时期墓2座，盗得金银器13件，玉手镯等文物5件。1992年6月15日开庭公审，当庭宣告判处贺有期徒刑5年6个月，刑期到1997年5月29日止。而在宣判后的3个月，1992年9月14日，洪江市看守所就替他打报告给市公安局，用的是一派冠冕堂皇的时髦词语：“根据中央2号文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我们同意将该犯放回厂劳改，同时可以增加劳改收入，真正为企业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市公安局一个副局长当天作了批示，“经党委研究同意”，这样的效率大概也体现了贯彻执行“一个中心”和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雷厉风行。还是在同一天，罪犯家属将5600元交到看守所，得



到一张编号为“017819”的洪江市财政局统一收款收据，收入来源栏写的是“劳改收入（预交款）”。第二天，罪犯贺学文走出了看守所大门。

据报道，仅洪江市看守所以各种名目“卖放”的刑事犯就不止一人。一个刚刚判处有期徒刑5年的流氓犯，交了40000元就放回家；两个参与拐卖13名妇女的大骗子，也轻轻松松走出看守所。在看守所不断“创收”的同时，不知受害人如果知道了作何感想。当地群众不失对公检法的信任，围拢停靠路边的警车对记者说：“你们法院的判决在洪江不抵用！”

可怕的在于不止在洪江。7月10日《中国检察报》载文称：某省劳改监管人员一个月中集体从犯人亲属手里获取人民币、金银首饰和住房折价达10万余元，30余名罪犯“提‘钱’释放”了。

在这里看到了钱能通神，钱能通鬼，钱能通官。或者说钱就是神。古人鲁褒《钱神论》，说到钱之为用，“生可使杀”，“死者得生”。钱神今又通过执法的有权者的手大显神通了，钱权交易渗透到了执法部门，在某些有权而用以谋私的执法者眼里，法还有多大的立足之地呢？

我的朋友叶芝余在“论坛”上说，单有道德约束，对于拜金主义的信徒显得软弱无力；还要依靠法制的规范，以强制手段肃清贪污，查处贿赂，打击各种以金钱为支持的经济犯罪与刑事犯罪行为，使金钱拜物教不能肆意扩张它的影响。

我不知道金钱拜物教云云该怎么确认教徒身份。上述那个盗墓犯以金钱为目的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大约可算金钱拜物教徒了；但他终于用钱买到释放，这不是执法者帮助他巩固了拜金主义的信仰么？那末实行“以罚代法”进而滥权卖放算是什呢，倘不以贪污渎职论处，总有点拜金主义的嫌疑吧？而这种行径，拜金主义四个字够用吗？

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还是由有关部门去具体解决吧。从常识看，伪劣产品都可恶，最可恶的是假药，因为它延误甚至伤害人的生命；腐败现象为人们深恶痛绝，而最不可容忍的是执法犯法，以权换钱，与社会上各种犯罪行为沆瀣一气，就不止关系到个别人的身家性命。这才是最危险的！

在舆论上大轰大反拜金主义，即使不像“项庄舞剑”那样意在市场经济，但界限不清的概念游戏，只会形成“拜金主义是个筐，甚么都往里头装”，在无权也无钱的群众中打击一大片，反倒分散了对肃清贪污、惩治腐败的注意，甚至让贪官污吏和腐败分子，以及一朝权在手又钻进钱眼中，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的人，在“有一点拜金主义”的掩护下，逍遥过市了。

1993年7月31



“黑帮”小考

1966年8月的北京，红卫兵运动狂飙骤起。21日那个星期天以后，大规模地“走向社会”，几乎到处可以听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阴森歌曲，据说是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所作。

23日上午，我所在机关一些人，向红卫兵学习，按当时各部门“文革”领导小组提供的名单揪斗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也以社会流行方式罚跪、剃阴阳头，这时大家才知道各自除了走资派、右派一类名号外，还有个道称叫黑帮分子。随后，勒令集中一处隔离居住，就是所谓黑帮队了。

其时，关于“文革”的主要政策文件“十六条”已经颁布，里面并没有“黑帮”字样。不知道这一命名的首创权属于谁。既称之，则安之。记得《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章节中提到过黑帮云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经规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以这本书为中心的材料；因为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看看沙皇俄国的黑帮怎么个“黑”法，也许有助于中国当代“黑帮分子”认罪吧？

原来黑帮分子(Black Hundreds)是俄国1905



年革命期间和以后成立的反革命和反犹太组织的成员在1906至1914年间（大体上即所谓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特别活跃。

俄国1905年革命，要从1月9日“流血星期日”说起。据“联共党史”记载，那个早晨彼得堡街道上总共聚集了14万多人，手无寸铁的工人带着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抬着沙皇像片，举着教堂旗帜，唱着祷告歌曲，向沙皇所在的冬宫前进，他们要呈递陈述本身疾苦的请愿书，“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沙皇）尼古拉第二并没有和他们讲友爱。他下令枪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工人。这一天有一千多工人被沙皇军队击毙，有两千多工人受伤。彼得堡的街道上染遍工人的鲜血。”

沙皇的暴行激起了逐渐遍及全俄的政治抗议。十月总罢工有一百万产业工人卷入。沙皇被迫在1905年10月17日颁布宣言，许诺“保证公民自由的坚固不移的原则：切实保障个人身体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等。

但是，正如“联共党史”所说，这一宣言只是麻醉轻信者，以赢得时间实行反扑的骗局。“除了空口允诺之外，工农还没有从政府手里得到过丝毫东西。10月21日所实行的并不是预期中的政治大赦，而是很少一部分政治犯的赦免。”而沙皇政府“又成立了匪帮式的警察性的团体：俄罗斯人民同盟和米哈依尔·阿尔汉格尔同盟。在这些团体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反动地主、商人、牧师和迹近盗匪的流氓分子，所以人民称之为‘黑



帮’。黑帮分子在警察协助下，公开打杀先进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放火焚烧群众开会和公民集会的场所，枪杀集会群众。”

这就是对黑帮及其所作所为的经典阐释。

就在这个1905年12月，莫斯科的政治罢工发展为工人武装起义，许多街道上筑满街垒，但数倍于起义者的沙皇军队加上大炮，把坚持了9天的起义镇压下去。

“联共党史”在叙述俄国革命进入低潮，按照沙皇颁布的新选举法组成第三届杜马（国会）时，指出右派即黑帮派，他们“所代表的是最恶毒的工农敌人，即农奴制的黑帮地主，他们常用鞭打和枪杀大批农民的手段镇压农民运动，唆使凶徒蹂躏犹太人，殴打示威工人，放火焚烧群众在革命时日集会的场所。右派主张用最残暴的手段镇压劳动群众，拥护无限制的沙皇政权，反对1905年10月17日颁布的沙皇宣言。”

1966年当时，虽说赫鲁晓夫时代修撰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一书已取代了斯大林主持审定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但因为赫鲁晓夫在中苏论战中已被判定为现代修正主义头子，后者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仍然保持了圣经贤传的地位，一言一语无疑具有法律的意义。

据以对照，我在组织上没有参加过（也可说根本没听说过什么）俄罗斯人民同盟和米哈依尔·阿尔汉格爾同盟；在行动上从来不曾“放火焚烧群众开会和公民集会的场所，枪杀集会群众，‘公开打杀先进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学生’、‘镇



压农民运动”，“唆使凶徒蹂躏犹太人”，以及“主张用最残暴的手段镇压劳动群众”，更谈不到“拥护无限制的沙皇政权，反对1905年10月17日颁布的沙皇宣言”了。——那末，我怎么能称为“黑帮分子”呢？不但我不够格，当时我们“黑帮队”里的一百多人，我看都不够格。

若说是20世纪初俄国黑帮的标准，1965年的中国另有一套黑帮条件，但前者有典可考，后者却查无所据了。奈何。

回首往事，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外，一般都不以“黑”为荣。“黑帮”云云是个显例。据说口下国内的犯罪团伙“带黑社会性质”了，自然也是不祥的讯息。法国的《黑郁金香》，类似中国的《黑牡丹》之类，小说家言，别树异帜，以广招徕。秦人尚黑，情有独钟，始皇帝焚书坑儒，理直气壮，也就不足为怪了。

1993年8月2日



哑人深致

雅人深致是一个好词儿，褒扬一些文质彬彬的人做的事或说的话，像《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某些人那样。

时代不同了，连读一读《世说新语》本身也快够上雅人深致了，但那不过指的是文约约、酸溜溜，不合时宜罢了。

再要褒扬，应该改一个字：“哑”人深致。

哑人好：对己可免祸从口出，对人可免杂音干扰，不罗嗦，不唠叨，不聒噪，不吵闹，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说长道短，不说三道四，不夸夸其谈、不表白自辩，不呼呼，不抗议，不苟言笑，不嬉笑怒骂，不窃窃私语，不造谣传谣，不鸡一嘴鸭一嘴。

当然哑人也不无缺点，缺点总是和优点伴生的：不言不语，也就不能唯唯诺诺；不会登堂一呼，也就不会热烈响应；不喊反动口号，也就不会山呼万岁。

不过，总体看来，哑人优点毕竟多于缺点。唇不露齿远胜青面獠牙，祥和之相有利安定团结。

先聋后哑，哑人必聋，相应就地两耳不闻天下事，干人无碍，与事无争，不管多么受人挤兑，也从不破口大骂，反唇相稽。比起君子动口不动



手”更克制，比“非礼勿言”“非礼勿听”更彻底。

以上这些话，都是非哑人的心理和打算。

若通过残疾人联合会，找到聋哑人作调查，他们怕不会同意，多半要用哑语加以辩正。

哑语也是一种语言，虽然无声，可通心曲。

他们通过哑语，了解并思考世事人情，我想他们最反感的一句话大概是：“你怕把你当哑巴卖了！”而他们最欣赏的一句话可能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993年8月10日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这里说的不是“亡党亡国”之“亡”，而是“亡天下”之“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一个讲这句话的是明末学者顾炎武，他把“亡国”和“亡天下”加以区别，“亡国”不过是政权易帜，“亡天下”却是把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文化摧残断丧，毁于一旦，使文明社会复归于蒙昧以至野蛮，那才叫天昏地暗，万劫不复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有志于此，联手干了一气，他们势力所及之处，做到了“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幸亏他们被不甘于“亡天下”的世界各国人民打败了，想要继承他们衣钵的衣冠禽兽，能够驰骋的舞台有限，就人类全局来说，终于不成气候。

如我们所引以自豪的，中国拥有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国际社会中自有相当的影响，不说对人类做出贡献吧，至少也是在一片大陆上“担负着天下的兴亡”，不是么？

我们朝野上下毕竟都不乏明白人。在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起门来“亡天下”的尝试之后，人们津津乐道日本在战后极其重视教育，收



效不仅在经济的振兴，而且在精神的重建，谁不懂得，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社会的，如果承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不就是蒙昧的人民吗？蒙昧是产生什么的土壤呢？

然而，怎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靠暴力？靠阶级斗争？靠斗斗斗？都不行。有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要靠教育，学前的、初级的、中等的、高等的以至社会的教育，把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人文观念，像传薪一样，传授给我们一代一代各年龄段的人们，作为一定的规范，更作为进一步创造的出发点。在1949年前后，人们在旧政权下无从实现的教育理想，转而寄托于新政权所倡办的“人民教育”了。

四十年功过，如过眼云烟，但又不仅是云烟过眼，它留下了陷入怪圈的教育现状。正像年年宣扬完成植树造林指标，而实际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一样，全国文盲数字恐怕远远超过公布的统计，新的文盲又正在不断繁生，“文革”停课闹“革命”的后果不仅反映在今天40—50岁的人才断层，其实许多要用所谓“五讲四美”、“礼貌语言”补课的，本来应在正常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解决的例如遵守交通秩序、不打人不骂人以至一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问题，随处可见；“无教养”渗透到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等多方向，直到作为远因导致刑事犯罪案件的增加！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取消教育，打击教师，贬



低文化，贻害学生，自然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且不说50年代初诸如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等影响深远的举措的得失，单是1958年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实施，在教育领域“政治挂帅”的泛政治化，后果就是多方面的：在生源上加强了唯成份论（并涉及包括“海外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政审”，阻塞了相当数量优秀生的入学；限制教师开课以至组织学生批判教师，开“文革”中反“师道尊严”的先河；从语文变成政治课，发展到取消历史、地理课，而所谓政治成为德育的核心，德育则照搬成人社会违心表态的一套，无形中培养出“说假话”的风气。与此相应的，是政工人员及其他非教学人员在各级学校编制中的膨胀，教育经费中人头费比重增大，教师经济待遇相应降低，又影响教学质量和师资来源……时至今日，经过十几年的修修补补，反反覆覆，教师挨打的事情似乎不常听说了，但教师有时几个月、一年半载连菲薄的工资也领不到，“打白条”现象却遍及全国，与此同时，据说作为适应市场经济出现在教育界的“新生事物”，计有从校办工厂滥觞的、旨在“创收”的多种经营；学校补行政费不足并为发放教职员工福利以自救，而在教育行政部门许可下巧立各种收费名目；社会办学中出现的类似“高价学校”的所谓“贵族学校”等等，不一而足。义务教育已经不“义务”，而学校收费名目之多、之杂，已经办出了历来资本主义世界和原社会主义阵营都未曾有过的“中国特色”！

据悉，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居世界第98位；不但在众多发达国家之后，并且在若干综合国力远不如我们的第三世界国家之后！

这样看来，重视教育云云，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吗？1992年用于吃喝旅游的公款，听说达到一千多亿元，令人有独薄教育之叹，究竟该归咎于财政部门、教育部门，还是什么部门？抑或什么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都可不负责任呢？

说到教育经费问题，其实争的不只是教师工资、教师的待遇，而且甚至首先争的是教育的地位，青少年和学龄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中华民族的前途——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可以预见的明天！

这是普通公民、学生家长都看到的，都有切肤之痛的，真正的教育家，有远见的政治家，以及一切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都应该看到，都应该有切肤之痛。只有官僚、政客昧于私利，才看不到，良知丧尽，才漠不关心。

然而，果然增加一些教育经费就行了么？拯救教育亦即拯救孩子、拯救民族未来的这样一件系天下之兴亡的大事，只须一笔或数笔财政拨款，就能起死回生，功德圆满了么？

恐怕又未必。我们说就整体而言民族文化素质的日渐降低，固然突出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钱交易，也已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钱交易，也已表现在文化领域，固然大量表现在基层，也已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上层。当社会上以至有关主管部门为中小学师资的流失、教学水平的下降而



惊呼、而嗟叹的同时，我们可否问问：我们还有多少堪称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学家——即懂得文化、懂得教育，并且因关怀民族未来而爱护青年、热爱教育事业，从而献身教育事业的专家，而不是既可以来管管学校，也可以去管管计划生育的“通才”在关键岗位上？以高等院校的负责人来说，我们还有蔡元培、马寅初乃至吴玉章吗？

从党政机关到社会各界，腐败之风，不能不侵入各级校园，包括最高学府。“清水衙门”虽非重点，但也并不真“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的增加一些经费，究竟用于恢复发展教育，还是喂饱侧身教育界或凌驾于教育界之上的蛀虫，也很难说。义务教育靠募捐维持，已如欠发教师工资打白条一样是“国耻”，而用于教育的专款也有挪用舞弊，也有中饱肥私，则是耻中之耻了。

何况教育的危机不仅是教育经费的拮据一端。毛泽东有志于教育革命，壮志未成，教育已苦；并不等于毛泽东当年指出的现行教育制度中的弊端都不存在或全看错了。老毛病加上新问题，整个的中国教育确实面临着全面改革的艰巨任务。这个系统工程似乎既不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远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它确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翼，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再事拖延，将积重难返，不但贻害千秋万代，甚至祸在眼前。说来又是关系到“天下的兴亡”，谁来承担？还是谁也不承担？

我们的教育就是因处在这样的怪圈里。教育问题既不是孤立的，它的解决也离不开全局。然而全



局中教育以外的问题已经足够恼人，教育部门似乎只要学生不闹事就可松心了。然乎？不然乎？至少我们教育界外的旁观者有这样一种印象。

“亡党亡国（政权）”的话，近来不断听到有人说起，而“亡天下”的危险似乎久无人说。受重视的“当作大事来抓”的事，尚且难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不用说实际上位居次要的教育了。

那末，我们真的将亡于教育吗——我们将由于教育事业的混乱、衰敝，不成其为事业，以致整个民族将堕落为世人不齿的蒙昧之民、庸懦之民、说谎之民、腐败之民，文明废墟上的历史弃儿么？

那末！——我们将成为子孙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也是人类的罪人。

1993年10月13日



说 自 律

许多年来，我们常常听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教诲；跟这个道德规范相对的，自然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了。

在这不同的道德观和道德实践的较量中，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败在“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人之手的时候居多。

往往是“宽以待人”的人宽容了甚至姑息了“宽以待己”的人所干的坏事，“严以律己”的人挨了“严以律人”的人的无情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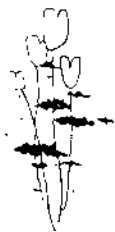
不幸的是，“严以律己”的人多半“宽以待人”，而“严以律人”的人很少不是“宽以待己”的。渐渐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人也悟出一点什么，他们把“严以律人，宽以待己”者叫作“手电筒——光照别人”、“马列主义口朝外”云云。

请君自律。

请谁自律？清廉者早已以清廉自律了，无须敦请；贪污腐败者能如所请吗？

怎样自律？从严自律还是从宽自律——倘严以自律，就要开诚布公，交代清楚，洗手不干，自请处分；倘宽以自律，还是既往不咎，下不为例那一套，网开一面，又何须自律？

道德自律，基于自觉，对于什么人全都适用。



涉及腐败，无论贪污还是渎职，需要绳之以国家法律，党纪政纪，而法纪是有强制性的，代之以自律，便是以道德取代法律（和纪律），既践踏了法律，也褻渎了道德有罪不罚的后果，奖惩不清，是非不明，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

澄清吏治，实行廉政，从自上而下的行政角度看自然有许多事要做。首要一环是严格依法惩治贪污。在这方面一有出入，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权威受到干扰和侵害，则吏不畏法，贪污和其他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行为就会受到无形的鼓励。

如同党和政府也要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一样，一切公职人员的社会行为都首先要受有关法律的约束。守法是自律的基础，而一个公职人员是否做到守法，有没有包括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违法行为，应置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之下，不是自律两个字就可轻轻带过的。

从理论上说应该如此，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尽管实际与理应做到的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但如果连这样的原则都不坚持，还怎么指望一步一步接近这原则的实现呢？

谈论这些远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实在够沉重的。甩开话题，说一点宫帙秘事。中国历代皇帝没有不想延年益寿的，但不幸短命的多，能活到五六十岁就算高寿了。除了死于非命以外，贪恋女色是个致命的原因。不但事关圣躬，而且事关国祚，当时的爱国即爱朝廷的大臣内宠们也



都是用了心的，不希望万岁爷生活腐化，败身祸国。从清朝中叶以后，侍夜的妃嫔都由太监剥光衣服，用锦被裹了背进寝宫，塞到皇帝被窝里去。这就避免了怀揣利刃伤害皇帝的危险，此乃安全措施之一。其二，据说太监跪在龙床外边，听到大动便叩首连声“万岁爷龙体保重”，这该算是不折不扣的请君自律了。无奈此时此刻，快活得紧，自家的性命连同政治的影响都不在考虑之内了。“自律！”“自律！”所谓自律之论的软弱无力原来如此。

1993年10月15日



官 场 心 态

小时候就听说有所谓“势利眼”，稍稍长大，粗识人情，知道是指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对有钱有势的人恭谨有加，逢迎备至，而对无权也无钱的平民，因为捞不着什么好处，自然施以冷遇。被称为“势利眼”的人和被“势利眼”青睐看中的人，是不会指责“势利眼”的，申斥“势利眼”的多是后一种人，他们亲身经受了多了。

现在我才知，社会生活复杂万端，冷遇并不限于当面的白眼，不冷不热也是一种精心策划又不易察觉的冷遇；不但是平民，有时连高官也不能免。

我读到《邓小平到韶山》一文，是从湖南文艺出版社《韶山的昨天与今天》摘录的。时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邓小平刚被毛泽东“解放”不久，重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因公路过长沙，想到韶山看看。“邓小平的要求湖南方面自然不敢反对，同时也无权阻挠。”因为他虽然会被打倒，毕竟又被拉起来，还是“钦定”的。“湖南某些领导人马上召开会议，安排邓小平访韶事宜。会议开得很长、意见分歧很大。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这位副总理发生了争议。”最后“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究竟“冷”到什么程



度，“热”到那种境界，这些人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但长沙方面首先做了个示范，让邓小平坐过了时的“占姆”轿车访韶，“在派车方面为韶山做了暗示。”

真可谓用心良苦。会议很长，分歧很大。何以致此？“规格”而已。中国政坛，变化起落，升降生死，系于一人，天心难测，于是人人自危，战战兢兢了。当时的邓小平称得上“敏感人物”，接待他的规格，关系到政治态度；在两派政治势力间，向哪边稍作倾斜。所以著述者说，“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种风险。中国人惯于‘中庸’之道，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方针。”不冷不热者，便于左右逢源也；冷热界限模糊者，便于下卸责任也。“路线斗争”喊得山响，意识形态捧到天上，而那么冗长的会上的争议其实与此无关，关注的核心无非是不因接待邓小平的“规格”见责，慎保各自的千金乌纱而已。

更有趣或说更无趣的是“长沙方面派了一位重要领导陪邓小平来韶”，每逢韶山接待人员有所请示，他都答以“你们看着办吧，不要问我”；韶山人希望邓小平参观毛泽东故居以后照张相留念，这位省领导人都不肯表态，只让直接问邓本人有没有照相的兴致。著述者形容这位领导“十分谨慎”，“谨慎小心”，“话说得十分的巧妙，模棱两可”。这真是一位熟谙中国“国情”的官场老手，他领着一大群诚惶诚恐的陪同人员，完成了这次“不冷不热”的接待任务。从他在陪同过程中的表现，可以想见其人在事前开会时一定有精彩的表态或不表态，比起其



其他那些会上争议者们，该是又棋高一着的。

看了这些记述，我感到种种官场心态，用“势利眼”三个字还不足以概括，“势利眼”是以功利实用的尺度量人，一般在市井、基层的日常生活中，“以衣帽取人”、以车型取人之类，偏重于比较浅薄的表现；至于官场中人，从战略和战术相统一来考虑、斟酌、推敲，“看人下菜碟”，至少也要在“势利眼”前面加上“高级”两字吧。这是古已有之，早自等级分明富贵与贫贱殊途的年代留传下来的，也算得一笔文化遗产。

中国多年没有市场，耳目所及，我们对官场心态比市场心态更习见。不知市场上的“势利眼”现象，比起官场又如何？

1993年11月24日



入 党 动 机

一个有三分“油”、二分“痞”的年轻人忽然说：“咱也要闹个党员当当！”

他见我疑惑不解，重复说：“当个党员有好处！”

我问：“有什么好处？”

“有‘优惠’！”

说着递给我一张报纸，指给我看一条消息，原来是某市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由于对B超管理不严，操作人员接受贿赂就大量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结果许多女婴被人工流产引产。这个市的市委书记下了一道死命令：“凡是利用B超为他人作胎儿性别鉴定者以及被鉴定人，是共产党员的坚决开除党籍！是干部的一撸到底！是国家职工的开除公职！”

我先还以为这个年轻人要跟我讨论这个规定是否妥当，执行起来会出现什么问题，不，他进一步加以诠释：“这就是说，犯了一样的事，若是普通职工就开除公职，若是干部，就可以保留公职，只是免去官职；若是共产党员呢，虽说坚决开除党籍，可不但保留公职，还可以照样当干部！”

他的这个“入党动机”使我略略吃惊，不过我感到无话可说。很久以来我们就发现，注意，仅



论过这种现象：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和一般职工，因同样的违纪犯法而受到处分时，干部职务和党籍甚至可以抵销法律责任的追究。这个青年看出这点“便宜”，产生半真半假的“入党动机”不是没有缘由的。

也许他只是一句讽刺话，当然是辛辣的讽刺，出于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幽默，而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认真的“入党动机”。如果他出于同样的考虑，认真地想要入党，为的是党籍可以在违法乱纪行为受到追究与处分时给予保护和从宽，那末他的“入党动机”首先就是志在违法乱纪了。

以党籍抵罚（行政的、党内的以至刑事的处分），与以罚（款）代法，都是不公正的，也是法纪废弛的表现。那些在同一案件或同类案件中，由于是党员领导干部或有其他庇护，而在别人锒铛入狱的同时得以逍遥法外的，他们原先的入党动机或有各种各样，倒未必想过一旦犯案可以有恃无恐，而多半是一心奔向自己的“目标”，并且自认为不会犯案的吧。但像那个青年所说的“入党动机”，无疑是来自这一类样板。

这个问题如不从认识和实践解决，我担心这个开玩笑式的“入党动机”真的会普遍化，成为相当多的一类人的入党动机的。

1993年12月4日



画 蓄 小 集

遮 羞 布

过去的文章常常致力于撕掉论敌的遮羞布。
现在的文章往往有意无意撕掉自己的遮羞布。

论 伪 善

伪善好不好？

伪善者，真恶也。当然不好。

恶是其实，善是其表。伪装为善，惑世欺人。

然而伪善也不无可取。

伪善之言，无用；伪善之行，可嘉。

伪善之行，胜过赤裸裸的为恶。

只要不惑于它的伪善，清醒地知道伪善下掩盖着什么，提防着继伪而来的赤裸裸的恶行。

请 君 入 瓮

谈唐代故事，至“请君入瓮”而大快。

那就是把施于人者施之于施于人之人。

什 么 作 用

据调查，14所中学近千名学生中，有1.7%



迷信求神问卜。一个女生算卦说几日内有灭顶之灾，吓得请假在家，不敢出门。考试前两周女生就不再换洗衣服，男生就不再理发，怕犯了禁忌考试失利。

某报报道时标题是：迷信书籍增多带来副作用。

那末，迷信书籍增多带来的正作用呢？

学习与遗传

列宁在共青团十大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号召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

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这也是经典的论断。

要掌握任何知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靠学习，不靠遗传。

何况母体中并无带有马克思主义的M-3染色体。

敏 感

诗人敏感于春风秋雨，春愁秋思，风花雪月，草木虫鱼，山色有无，城郭今昔。

小说家敏感于人情世态，兴衰炎凉，宫帏秘事，市井繁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音乐家敏感于黄钟大吕，宫商暗换，曲终人杳，绕梁三日，如泣如诉，如絮如慕。

政治家敏感于战略战术，纵横捭阖，笼络人心，自塑形象。



金融家敏感于出盘收盘，行情变幻，银根头寸，市场风云。

官僚政客敏感于靠山后台，枕头裙带，实力消长，羽翼丰薄，耳目心腹，密折敌情。

奴才皂隶敏感于主子眼色，一瞥一咳，门包轻重，关系亲疏，盛时门庭，衰时后路。

妓女敏感于嫖客的笑谑，扒手敏感于行人的荷包。

古往今来，富贵贫贱，盖无往而非敏感人物矣。敏感是正常的，过敏是异常的，由神经过敏而神经衰弱，则属病态，或流于痴，或濒于狂，渐失清醒，幻象环生，就非一般心理咨询所能解决，须即刻就医彻底诊治了。

忧 与 扰

一个低年级小学生朗读一篇文章，进出“忧国忧民”四个字。

“忧国忧民”值得称诵吗？

然则是把“忧国忧民”认作“扰国扰民”了？

老师怎样纠正误读？——用心是“忧”，动手为“扰”？“忧”与“扰”只有一笔之差么？

不 须 求 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稍涉文史的人都知道，这是屈原骚赋中的名句。

即使只读现代文学作品的人，也都记得这曾作为鲁迅小说集《彷徨》扉页的题词。



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在80年代初期建院时，就把这句高悬门庭，这既是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也是对民族文化遗产中优秀精神的继承。

星移物换，人事变迁，这个题词也被撤掉了。据说撤掉之前还有争论，争论之后还是撤掉。

“路漫漫其修远兮”，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不是今人也说要进行“新的长征”吗？可见所争在“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索云云，屈原则可，吾辈则不可。

屈原时代，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才需要求索啊。

如是我闻。

夹塞现象

在车站，抢上占座，在邮局柜台，蜂拥钻挤，在菜市场，排除夹塞……可以统名之为夹塞现象。

不守秩序，不按步就班，不讲先来后到，是对“论资排辈”论的反驳，还是有你无我的争夺？

这种现象，在强调竞争，强调个人奋斗的资本主义社会倒是少见的，大约不姓“资”，那末，难道就姓“社”么？

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的三四十年间，并不是一贯普遍如此的。

我想，成为社会风气的道德文明面貌，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姓资姓社；它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素质的一般，而归根结底，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也是由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关系决定，并通过人们的心理表现于行为的。

从签名到不落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老解放区和进城初期，有一个传统：给一个同志作民主鉴定，开会写成定稿，大家是一一签名的。

也许当时大家都天真单纯，容易取得一致，也许当时大家习惯于不持异议，容易放弃个人的意见。总之，签名表示负责。

后来不同了，只有笼统的“全体一致通过”或只是“通过”，却不见落下姓名，即使付诸表决，也不写明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时间久了，档案虽存，已成无头公案。嗣后，到处可见的集体负责——集体不负责，便是这样逐渐演化出来的。至于划圈，则是以含糊的态度表示明确的无态度，干脆不负责任。

主义和主意

一个好主义，也许敌不过几个坏主意。

为了打倒一个坏主义，需要多少好主意？

智 与 愚

大智若愚，有没有大愚若智？

语言和面目

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常常并提。

加西非多面目丑陋，心地善良使他并不可憎。



可见面目的可憎不决定于五官的搭配。

语言乏味则可使面目减色。

语言比面目更具影响力，比面目更直接地表现人的气质、智力、思想、感情。

语言虚假使面目失真，甚至可恶。

禁 与 不 禁

客：人一吸毒，就什么羞耻心都没有了，什么人格都不顾了。

主：有人不吸毒，也没了羞耻心，也不顾人格的。

客：那是另一种吸毒的结果吧。

主：但那好像不在必禁必戒之列。

婊子与牌坊

石头比肉体更为永久。于是有人“又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殊不知肉体化作泥、化作灰、化作干尸以后，假如没有牌坊，也许人们会渐渐忘记其生前“当婊子”的行状；而有牌坊在，时时提醒人们，曾有过“又要……又想……”的那样的人；人们不会只诵读牌坊上的“贞洁”字样。

中国式的贞洁牌坊，于是变成西洋式的耻辱柱。自以为得计者其实大失算——如意算盘往往是不如意的。

暴 发 户

在一篇什么文章里，柏杨说台湾是充满了经济暴发户、政治暴发户、文化暴发户的地方。



暴发户之说，若干年前就有了，多指忽发横财的人家，固然是为贫苦的或仅能维持生计乃至处在破落中的人们所侧目，也为原先殷实的富户所歧视的。

政治暴发户，是引申而来，应是指夤缘时会忽上青云的新贵，大约海峡两岸取义相同；我们这边在“文革”中不是有所谓“乘直升机”的说法么？

至于文化暴发户，则不甚了了。一是因为台湾的文化情况多年隔膜，再就是不好拿我们这边的情况去比附、去坐实。利用“文化”而发财的，如大卖黄书的书商，现在不少，似应归入经济暴发户；利用“文化”而升官的，如大家熟悉的姚文元，似应归入政治暴发户。然则，文化暴发户是指在短期内突然从“没文化”进入“有文化”状态的人吗？有这种“文化速成”吗？

志以存疑，待向高明请教。

余音绕梁，令人低回久之。然而余音也在这“最后”之内。余音之后再无余音：最后的余音。

这是最后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则是最后的胜利。

没有最后

最后：这是很诗意的。

戛然而止，惊心动魄。水落石出，一切大白于天下。这就是结论，更无下文了。囊括世界。结束历史。

余音绕梁，令人低回久之。然而余音也在这“最后”之内。余音之后再无余音：最后的余音。



这是最后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则是最后的胜利。

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最后的笑是无可更改的，永远的笑。

然而，事实打破了这诗意。

没有最后。

无始无终。

如有永远，便是永远的未竟之业，永远的未完成的杰作

“最后一幕”，并不是最后一幕。

“最后的笑”，并不是最后的笑。

“最后的斗争”，并不是最后的斗争。

“最后的胜利”，并不是最后的胜利。

正如同没有终极真理，没有最后的结论。

说什么“最后的贵族”，之后又出来新的贵族。

然而，但丁被称为旧时代最后一个歌者，同时又成为新时代第一个歌者。

时间没有最后。历史没有最后。

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渡，一切都只是一瞬。

无数的一瞬，无止无休，即是永恒。

1991—1992 年

